

我們的春天

愛倫堡著



3 0406 2540 6

北京書店印行

作者傳

依里亞·愛倫堡一八九一年生於一個莫斯科製造商的家庭。十五歲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革命運動，因為散發布爾塞維克的傳單，在大學預科裏被開除，並被逮捕，住了一年多監獄。自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七年他卜居巴黎，並遍遊歐洲。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寫詩發表於俄國及其他國家。一九一七年他回到祖國。一九二一年他再往法國，住在巴黎，但不斷訪問蘇聯。不久他的鉅著『朱麗歐·朱爾尼多』問世，轟動一時。此小說已翻譯成幾國文字。自此以後他又發表了五十多種著作。一九四〇年他永久地定居莫斯科。

愛倫堡的寫作表現了主旨與格調的多樣性，無論是純文學作品或幻想小說，冒險故事或精心結構的短篇小說，詩歌集或政治論述，無論他發揮幽默或新聞記者的評論，他運用他的筆都具備着同樣的熟練與光輝。他的小說如『D. E. 托拉斯』、『珍妮·諾義之愛』和短篇小說集『烟袋』都備受廣大讀者的歡迎。

他最近的小說，描寫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戰敗的『巴黎的陷落』，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愛倫堡在戰爭中的文學作品特別得到極高的評價。當他充任紅星報的戰時記者和專欄作家時，他成為蘇聯軍隊所敬愛的作家，和全世界最孚盛望的記者之一。

愛倫堡現在從新開始了他和平時期的文學追求。在他生花的筆下寫出了新小說。他到各處旅行，把所見所聞發表為遊記。他最近完成了他的新小說『暴風雨』。這位天才的作家兼記者已經把他卓越的能力轉而用之於鞏固和平的事業了。

（之平譯自蘇聯三十年日曆）

目 錄

作者小傳	(一)
依里亞·愛倫堡	(一)
吃人的生番，希特勒的臉譜	(九)
莫索里尼的本領	(一四)
劊子手和他的走卒們	(一五)
希特勒匪徒的獸性	(一八)
劊子手的工廠	(二四)
六月	(三〇)
庫爾斯克的「新秩序」	(三七)
他們將被迫償還	(四三)
頓河在召喚	(四六)

要繼續反攻下去.....	(五三)
我們的春天.....	(五六)
歐洲的遭遇.....	(五八)
法蘭西人民的血.....	(六六)
巴黎.....	(七一)
他們眼望着東方.....	(七七)
新的巴別城.....	(八一)
綢子和虱子.....	(八五)
當我想到勝利.....	(八八)
墨水和鮮血.....	(九一)
黑人在『自由美國』.....	(一〇二)
自然的法則.....	(一〇九)
在波蘭.....	(一一〇)
和平之星.....	(一一三)

依里亞·愛倫堡

依里亞·愛倫堡在兩方面佔有現代蘇聯文學中的特殊地位。

第一，做為一個作家，愛倫堡不僅以蘇聯，也以西歐為其背景。他生長在莫斯科，但他曉得俄國歷史最有價值的部份是在西歐，尤其是在法國過了的。愛倫堡深情地愛着並理解着蘇聯，而且他把同樣的愛與理解給予法國和捷克；這引起許多批評家相信：愛倫堡比起算做一位蘇聯作家，更應當算一個西歐作家。偉大的愛國戰爭是真正的考驗。當蘇聯遭遇到嚴重的磨難時，這就對誰都清楚明白了：愛倫堡原是名符其實的蘇聯作家。愈危難愈堅強，這種蘇聯人的特質顯著地體現在愛倫堡身上。沒有別人，唯獨愛倫堡成了穿上軍人大衣的戰時蘇聯底象徵。他變成蘇聯的號筒，向全世界通報蘇聯的思想 and 意志。但是，在這同時，愛倫堡仍繼續理解着並愛着歐洲。這與我們必須說清楚：愛倫堡很難算地，在目前他是不能愛整個的歐洲了，他愛着除掉德國的那個歐洲。在進行理解這位作家的品德，這是一點。

第二，愛倫堡是一位山裏的勇武之士，他屬於那海涅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曾描寫過的「精神底騎士」階級。

他區某些讀者，甚至關於愛倫堡是一位藝術家，還是一位政論家，還沒有最後確定。這是何等奇



怪的問題！愛倫堡自然是位藝術家，我們主張此說的理由，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小說家，是「巴黎階落」的作者。請讀一讀他的任何作品，他能用少許的語言，簡明的筆觸，描畫出一幅在你面前清楚可見的圖像，他能描寫一種令人難忘的性格，這便是這位藝術家的奧秘。

但是愛倫堡不止是藝術家，他是一名戰士。他是他底時代的孝子，對於這時代的一切苦痛與快樂他是敏感的。他有偉大濶厚的心和至為深穩的信念——一種明確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信念。他底信念是行動的，向前進的；他準備為這信念戰到最後一滴血。這就是為什麼愛倫堡不願避開我們時代底大風浪，不願使自己退避在自我中心的世界裏，而以一種藝術家極度完美的品德勤苦工作的緣故。愛倫堡在鬪爭中是非常專心致志，非常熱烈與急切的。他沒有時間去想到那純藝術工作底花邊和漂亮的羽毛，他奮不顧身的投身於激烈的鬪爭中。今日的劇烈的現實正闖進他底精神的實驗室裏，並要求立即的回答，這就使得愛倫堡又逐漸成爲一個政治的新聞記者。

但是，藝術家的呼聲尚未靜止，初看起來，所有這些合成一個異常相反的結果，但在愛倫堡，這種因素却能諧和於最優美的文學效果之中。他報紙上的一些短文，讀起來常像散文詩一樣，這種結合是新穎的，且出乎尋常。在進行理解這位作家，這也是重要的一部份。

自然，愛倫堡作品的特質一向就是清楚明白的，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早幾年。但是只有當這大大戰中，愛倫堡的作品才達到了完美的極度。愛倫堡已使他底作品與世界進歩力量現在所進行的反對世界反動的黑暗勢力的偉大鬪爭之間建立了不可分的聯繫，特別是與蘇聯二萬萬人民已經進行的並繼續到最後勝利的偉大的英雄的鬪爭之間建立了不可分的聯繫。

愛倫堡最近三、四年所寫的一切作品，在其意義上，直接的效果上，以及歷史的重要性上是遠勝於他過去所寫的一些東西，這無須多說。而且，把愛倫堡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數年間的作品，與在我們時代的他底作品加以比較，這位作者所成就的，政治和藝術上的重大進步是頗為顯著的。他底發展的基本根由我們必然能在蘇維埃國家最近的二十年到二十五年間所成就的巨大的全面進步中找到。

愛倫堡底那支諷刺的筆目前是為兩種情感所引動，即非常的憎恨與偉大的愛。非常的憎恨便是對於一切反動勢力結合的今天的德國納粹主義；偉大的愛便是對於那些在每一個國家中進行反帝轉動與幫暴行國爭的進步力量；然而這種國爭沒有比在愛倫堡的祖國中這樣激烈的了。這我引證愛倫堡最近在京斯科出版的『戰爭』一書中的文句加以說明，這本書是他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雜文集。

『我們戰鬥着』，愛倫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寫道：『不是反對全人類，而是反對引起暴戾人，而實際上毫無人性的機械人，我們強烈的憎恨他們，因為他們表面看起來像人，因為他們高笑，因為他們能用手撫摸一匹馬，或一條狗，因為他們還要在自己的日記簿中做自我分析，尤其是因為他們假裝人、假裝有教養的。』他繼續寫道：

『一個人如何能與一羣匪徒談論理想呢？他們的理想是一塊豬油，一個帶着血肉撕下的耳環，一件從殺害的孩子身上剝下的短外衣。他們沒有文化遺產，他們一直就僅備得一種專用於毀滅人民的技能。他們就一直僅備得那旁門左道，各種各樣的刑具，以及瘟疫年代的黑暗。他們的靈魂已經變硬了嗎？那是扯謊，他們就沒有靈魂。他們是單細胞的廢物，微菌，用自動槍械與擲彈筒裝備的無人性。

的畜牲之類。」

愛倫堡讀着一個死了的德國學生的日記，這個學生爲德國在蘇聯所製造的恐怖罪惡找種種哲學的解釋，愛倫堡叫道：

「一個人曾被這些科學蠻人底精神墮落所驚駭，爲證明他們暴行的無罪，他們需要哲學的引證。他們站在絞首架的暗影中，還要做精神分析。這簡直要使人用兩顆子彈射穿一個弗里茨哲學家：一顆是爲了他們折磨一個蘇聯孩子，而另一顆是因爲他在伯拉圖的名義下殺死這個孩子。」

像這樣的文句，能够不盡地引證出來，但這無十分必要。愛倫堡對希特勒匪幫，德國的情感是再清楚沒有了。而且他對於歐洲那爲數不少的希特勒底走狗們的情感也完全是同樣清楚的，例如這裏便是論到貝當與賴伐爾的一些文句：

愛倫堡寫道：「大仲馬有一次說到一個七十歲的風騷女人：『他決不會成爲羅馬尼亞貴婦人或一個馬賽賭子的情婦，清白有它的庇護物——年紀。』但是貝當已經證明了：一個人在他九十歲的年紀還能做一個媳婦，爲世間的財富所引誘，一隻腳插在墳墓裏，在死前一點鐘還出賣他底靈魂……」

這是關於賴伐爾的：

「自從法國看到有絞首架一百五十年已經過去了。但我總想比埃爾·賴伐爾會被這種特殊的榮譽所歡迎，爲了他的原故，某些漸漸被忘的事情將會記起。槍斃他都將是困難的。他看起來甚至不像是一名奸細。他就是賴伐爾，是我們這世紀的猶大。但白楊得在和平中生長。賴伐爾不是一個傻子，他決不願意把自己吊起。他將被從最後的德國床下拉出來，那最後一枚德國普分尼（德國小銅幣名）！」

譯著)也要從他那裏拿走，然後，他由巴黎人用一條雪白的領帶(賴伐爾常扎白領帶)像繩套一樣纏在他的脖子上，在路燈柱子上把他吊死。

「巴黎的孩子們唱着：『賴伐爾吊在路燈柱子上！』就是把他吊起來，他當然也不會發亮，但整個法國和歐洲將會因為吊起他更光明一些。」

這種非常的憎恨並非輕易就生於愛倫堡，而且那不是為憎恨而憎恨，這種憎恨生於愛倫堡，正如它生於全體蘇聯人民，是經過了無限苦難的。

他寫道：「我們已為這種憎恨付出了代價，許多城市，許多地方，以及千百萬人的生命……我們明白：我們決不能與法西斯蒂們分居在這個地球上。我們明白：毫無和解或談判的餘地；我們明白這是生死問題……我們對希特勒匪幫的憎恨生於愛，愛我們祖國，我們同胞，以及愛人類，其中存在着我們憎恨的力量，其中存在着憎恨之公正合理。」

這種非常的憎恨在愛倫堡的心胸中，是與那種偉大的愛佔有同等分量的。而首先，是對他底祖國對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愛。

「你看見過繁茂直立的大樹嗎？」一九四二年八月愛倫堡在德寇瘋狂地猛攻斯大林格勒時寫道，「牠原是一棵極小的樹，現在老了。比你還老。牠的中心為圓輪所環繞，每一圓是一年，而牠的年輪是數不清的。這棵大樹就是我們俄羅斯。她的歷史是分散的各個部落開始，是以第一次的軍事功績和最早的建設草樣開始，她已變成一個巨大的力量，在和平時期中，每一個人有他底森林，他底槍，他底鑿子，他底犁和他底吉。當偉大的苦難時刻已到來，它不再成為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蘇聯命運的

問題、一

在那些殘酷的日子中，愛倫堡關於他的祖國寫道：『這次戰爭是爲了光輝的蘇聯文化，爲了普式庚底詩，爲了烏克蘭的歌，爲了我們底典籍寶卷，爲了我們底博物館以及爲了我們的學校進行的。森林與草舍的俄羅斯曾費了多少世紀的力氣才創造了花崗岩的列寧格勒！唯有偉大的人民方能產生出一個萊昂·托爾斯泰。唯有偉大的人民才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這個日子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俄國革命，原註）開始一個新紀元。』

當這個爭愛着的祖國被嚴重威脅的時候，當德國隊伍遠遠的深入頓河草原，和高加索山麓的時候，愛倫堡寫出生動不朽的語言，這些語言深深打動了在前後每一個戰士的心靈：

『南綫的戰士，站穩，你將把德國人打回去！』愛倫堡在一九四二年寫道，『站穩，死神就會從你面前退走！告訴你的同志：『站穩！』告訴你的朋友：『我們決不動搖！』回答你的祖國：『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殺死德國人！在頓河右岸殺死的德國人就不會過到左岸來，淹死在頓河裏的德國人就不會向庫班進攻了。無論怎樣，無論何地你要能殺！站穩去殺！殺了再站穩！』

發表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裏的另外一篇文章『時機已到！』中，愛倫堡對紅軍說道：

『戰士，不僅你的伙伴跟你一起參加戰鬥，和你前進的是全體紅軍，全體人民，和你前進的是那些樹下的英雄，是那些去年夏天阻擋敵人前進的，去年冬天打退敵人的紅軍戰士，和你一齊進入戰鬥的是那二十八名騎衛戰士，和你前進的是那個瘦弱的少女丹孃，以及勇敢的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和你前進的是那偉大的死者。你絕沒有辱沒他們，和你前進的是那些創造俄羅斯的祖先，和你前進的是

且是不可戰勝的拿破崙的一八二二年的軍士。和你前進的是你的孩子們，你的母親，以及你的妻子。他們爲你祝福，你將爲你的母親獲得太平的晚年，爲你的妻子獲得團聚的快樂，爲你的孩子們獲得幸福。戰士，和你前進的是蘇聯全體，她就在你身旁，你聽到她的飛速的脚步，當你在進攻時，她用鼓舞的話振奮你的精神；假如你要倒下去，她支持你；假如你得勝歸來，她擁抱你。」

在那些嚴肅的日子裏，這些話的意義，應給以高度的估計。這些話鼓舞了無數的鬪爭，去忍受苦痛，以及自我犧牲，而最重要的是鼓舞了戰士爲打敗敵人取得勝利去戰鬥。當斯大林元帥異常堅定與卓越地佈置了的偉大的日子最後到達斯大林格勒，這日子成爲戰爭的轉折點，愛倫堡寫道：

「每天夜晚，當無線電廣播『最後新聞』時，我們似乎聽到許多輕微的脚步聲，那是紅軍在前進。那是歷史在前進。戰士們一再高呼『前進』！我們國家以有她的紅軍而驕傲，她正計算那些勝利品，但戰士們沒有時間計算，戰士們正在進攻。」

愛倫堡是以全身心愛他的祖國，但這並沒有從他的眼界中遮去世界底其餘部份。相反的，愛倫堡寫道：

「正像每一種偉大的愛，愛國主義使一個人的眼界擴大，真正的愛國者愛全世界。」

愛倫堡是真心愛世界的，或者更準確的說，愛世界的進步力量。一九四四年新年發行的『紅星報』，那上面有愛倫堡『在門檻上』爲題目的大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這位作家特異的品質是異常顯著的。

『在古代的一個宗教劇中』，愛倫堡說，『惡魔們想在黎明前悶死那些雄雞。他們希望太陽不爲

那些頗難的啼叫所喚醒，太陽就會睡過去。德國人正在這種怪誕的迷信中尋找最後的光明的竅空者：在這種魔鬼中什麼是更可怕的呢——是他們的殘酷，還是他們的愚蠢？他們能殺盡地上所有的雄雞，但這却一分鐘也不能攔住太陽的上升。我們終於度過了一九四三年，歐洲也同樣過來了。黎明以前的時刻常常是最黑暗的。這些魔鬼得意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而現在呢？……現在天正破曉……在一九四三年歐洲從她底臨終之床上起來。她起來不是爲了赴宴會，也不是爲了去開爭。」

爲更加生動地描寫那被征服的法蘭西的重生，那南斯拉夫的英雄的鬪爭，挪威與希臘的游擊隊活動，和在丹麥的那些德寇佔領者底被刺殺，愛倫堡寫道：

『歐洲爲什麼找到了他的道路？爲什麼在深夜的極暗處，那雖不可見但必然到來的黎明露出光亮了？什麼使雄雞高叫？什麼使詩人歌唱？誰鼓舞了那些游擊隊？我們無須自誇，也無須虛偽的說：那是蘇聯，是她的犧牲，她的流血，和她的勝利。一九四三年開始於斯大林格勒，而收尾於委特布斯克與別吉車夫的攻擊戰。我願意把從烏拉剎卡甫卡斯到黑爾松，從弗隆涅茲到丹羅斯坦的距離，留給那些軍事評論家去衡量。我要講到一些別的事情。從死到光榮，從光榮到死，這之間有數百公里，但這之間也可以只有一步。蘇聯在一九四三年就過了這光榮的一步，並預定了戰爭的結果。』

愛倫堡如下地結束此文：

『一九四四年，我們尚不熟悉於那些形體面貌。但我能看見「勝利之年」已刻在花崗岩和大理石上了。那是我們的誓言，全人類的誓言。土地渴望穀粒，人心渴望快樂。在巴黎羅佛爾宮有一座特別美麗的影像——賽莫斯瑞斯奈奇的勝利（賽莫斯瑞斯係希臘愛琴海小島，奈奇爲希臘神話中的勝利女

神（譯者）。牠的頭已被打掉，但勝利有一雙翅膀，牠飛翔而且飛翔得那麼美麗，致使那些到過豎立這座雕像的大廳中的觀眾都不願離開，而對此人類精神的創造長久地讚嘆。我們還不能看到勝利的面貌，但是當我們守候在新年的前夜，我們將為偉大的面貌所震驚。你聽見那翅膀的飛翔之聲沒有？現在勝利不遠了……」

這些話幾乎是在盟軍進攻法蘭西西北部以前半年寫的，現在，當英美軍隊在法國作戰，而紅軍正配合他們予東歐敵人以加重打擊時，這些話就更有其特別意義。自然還有許多鬭爭，困難，犧牲和流血擺在我們面前，但我們仍舊可以重復愛倫堡的話：『現在勝利不遠了。』

而最後，當勝利冠在盟軍的旗幟上時，人民即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他們將會注意到藝術家和政治家的愛倫堡在最危急之時，為其祖國，為全人類，會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貢獻了其全部力量，心靈，智力，以及才能去毀滅法西斯野獸，這種認識將是最好的報答，這是愛倫堡現在和將來所要求的。

（高陽譯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號英文版『國際文學』）

吃人的生番，希特勒的臉譜

挪威和希臘的寡婦們為什麼正號啕痛哭着呢？虛昂為什麼被燒成一片焦土了，貝爾格萊德為什麼毀滅了，鹿特丹為什麼淪為廢墟了呢？有一個阿道夫·希特勒，年青的時候，對於繪畫異常有興趣，

並且想做一個第二拉斐爾。但是他沒有這能力，他的工作被拋棄掉了。心裏氣憤得很：他叫了起來：『你們瞧罷，我還是要變成大名鼎鼎的人！』他已證明了他的話是不錯的：所有歐洲一切毀滅國，都簽有他那遺吳萬年的名字。

爲了辯護他們對外國領土的掠奪，德國納粹特調製出一種『種族學說』。按照這種學說，日耳曼種族因爲頭顱骨的形狀特別，而貌又長得怪高貴的樣子，所以在人類中是出類拔粹的，正因爲這個原因，日耳曼人就理當統治全世界。

一個人就會這樣想，那麼希特勒本人就該是這種『高貴的日耳曼種族』的典型；我們在這裏請一位著名的德國人類學家瑪克斯魯格盧格教授起立發言罷。在希特勒秉政以前，這位教授在慕尼黑法庭開庭時，曾以一位鑑定人的資格，出面發言。下面就是他所描述的希特勒的外貌：『前額生得很低，而且凹入，鼻子很難看，額骨很高大，眼睛很小，面容不是像一個能夠完全控制自己的人的樣子，而是像一個一受刺激就狂暴起來的傢伙的樣子。』

海登在他的著作裏說起希特勒初入社會時的一副樣子：

『他穿着一套縫得很合身的藍衣服來了，捧着一束大得太過火的玫瑰花，他親吻他的女房東的手的時候，就把它送給了她。人家介紹他的時候，他就現出活像在執行死刑的時候的一個總查官的一副神氣。當他開始說話的時候，隔壁房間裏一個孩子醒了，而且開始哭起來了，那是被希特勒的聲音吵醒的，希特勒的聲音呱哩呱啦地嘈雜得很，老遠就聽見了。』

希特勒的聲音是使人難堪的；——那是一種嗓子啞的狂吠，那變成了一種尖銳的叫喊了；當他說話的

時候，他裝出一副怪樣子，而且到處蹦來蹦去，常常陷於神志昏迷的狀態，叫出語無倫次的話來，活像非洲的一個走江湖的術士。他在慕尼黑那煙霧騰騰的酒館裏，開始他那籠絡羣衆的演說。那些市民看官周圍的廢墟和通貨膨脹而越發激昂了，玩味着這位乞丐似的瘋子的叫喊。現在希特勒極力想打扮成一個人的樣子，在狂亂中企圖燃起庶民的熱情。但是他早年所表現的獨特的錯誤的精神狀態，使他的一切計劃都突然混亂了，而這位國家元首就開始叫噥，像一個患歇斯的里病的婦人了。

希特勒的過去本是湮沒無聞的。他是一個奧大利事務員的兒子，做着令人懷疑的圖書明信片的買賣。最後，就成了一個奸細，出席工人集會，把『搗亂份子』報告給他的上司。去年夏天，這位從前的好細，得意洋洋地進了被丟棄的巴黎，還在哀佛爾塔前照了一張像呢。

希特勒以德國重工業主人的保鏢的資格，開始他政治上的飛黃騰達的生涯。在埃森召開的實業大會席上，福格勒，基爾多夫，台森都異口同聲地承認他是一個『救世主』。希特勒需要錢而且要不少的錢，他對實業家們搖尾乞憐的說：『救救你們的救世主罷！』

對着工人們，希特勒就說：『我要毀滅財閥寡頭政治。』而他對財閥們說話的時候，就又是一番不同的話了：『讓我們把我們的勢力範圍劃分開來——經濟將留給你們管，而我自己就把政治担負起來罷。』這個斯塔哈佛頓思的工頭，百萬富翁福格勒的走狗，變成了主人的台柱子了。希特勒担保福格勒一定有大錢好賺——就要發生真正的大戰啦！而對着德國人民，希特勒就發出大言壯語說：『和平不是人的滅亡，只有經過戰爭，人才會繁榮昌盛起來。』

希特勒把德國所發展的輝煌的技術，把勤勉而有組織的人民，都引導到盜匪的路上來了。他極力

誘惑德國青年，使他們跟其餘的世界斷絕來往，不准他們享受人類的一切文化，迫使他們懷抱『德國必須擁有全世界』之願狂。他使誇大狂成爲一種全國普及的強迫的病。他用威脅、欺騙和奸詐的種種手段，打破許多鄰國的抵抗。希特勒本人始終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他研究星相圖解，但是八千萬德國人，以及被德國納粹奴役的他國領土上的一萬萬人，却都被踐踏在他的鐵蹄底下啦。

希特勒是一個可鄙的小丑。他在岩石間替自家建築了一個宮室，他是一個吃素的人。是的，這個吃人的人，已經毀滅了不下五百萬人的生命啦，聽見一餘牛或一隻羊的痛苦的聲音，却受不住！

他是一個殘忍到異常的人。他說過：『在我們能够產生秩序以前，必須把人從各處路燈桿上吊起來。』他崇拜虐待人民。各處紛紛向他報告關於一切新的死刑和新的慘殺的消息，而這些消息會使他的那對小眼睛閃閃發光。

他是一個剛愎的迷信的人，一個妖怪，一九三七年到慕尼黑參觀『德國繪畫展覽會』的人，他都有限幅目擊到那種舉世少見的情景，這位德國國家元首，竟把他不中意的圖畫，通通親手撕得粉碎了。

他已把歐洲淪爲廢墟，而曾經夢想做一個營造師的也是他。奉了他的命令納粹航空員毀滅成百成千的著名的建築學上的紀念碑。希特勒曾經說過：『我將毀滅全世界。』

他厭惡全世界所有各族人民。他積習難除，沾染很深，一心只想幹迫害和毀滅的勾當。他曾對他的夥伴齊什尼格說：『如果沒有猶太人，也一定要把他們捏造出來——只有獸性才能使人比較近於活動。』他在著作裏講到法國人的地方說：『他們都是黑奴。他們理應被人壓制。』希特勒正對捷克人

報仇，他的繼母原來就是一個捷克人。他說過：『他們是斯拉夫豬羅』，他特別恨俄國人。這個沾沾自喜的癡子，曾經喊利翁·托爾斯泰叫『雜種』。

希特勒也瞧不起德國人民。他對斯特拉瑟說：『我國的工人，除了麵包和馬戲以外，什麼也不需要——他們沒有思想。』他的確給德國人看了不少的馬戲。他們看見了焚書的烈火，他們看見了德國越過越貧困而野蠻。他們看見了千千萬萬的士兵們的寡婦。他們看見了柏林的中央大街——翁特頓——林頓——的廢墟，那是倫敦狂炸的應得的報應啊。關於馬戲，希特勒的確是最慷慨的了。說起麵包，他却不給人民啦。他命令士兵們用砲火去搶麵包。他蹂躪了西歐和巴爾幹。麵包都被貪婪地吞光了。於是，他就把他的一批飢餓的流氓羣驅趕到東方來。

最近，跟希特勒談過話的一個瑞典新聞記者說：這個吃人的生番，已經消瘦了，脾氣却大得很，害着失眠症，他很暴躁地在他的官室裏踱來踱去。他意識到他的滅亡已近在目前了。無論服什麼安眠藥粉都一點也不見效。在萬籟具寂的深夜，他聽到被慘殺的人的聲音，他聽到了報仇的聲音。

往日，當他沿着德國各市鎮的街道策馬而過的時候，人民會投以鮮花；他崇拜相思草和三色堇，有一次，在一束相思草中間，忽然發現一塊看了使人陰鬱的墓碑：原來有些崇拜的人早已就很明白地認定：花兒雖然動人，卻實在不足以做傳達他的感情的工具。……現在，不准獻花了；『花兒過早啦。』柏林的人民，都在背後裏就這一件事說笑話；『他在夢想他的墓上能放着花圈呢……』

恐怕連塊石碑也不見得會有人去放在他的墓上罷！

莫索里尼的本領

希特勒現在可以舒舒服服睡一覺了吧！因為莫索里尼已決定派遣師團去助他一臂之力。爲了需要比『無畏』羅馬尼亞隊更強的軍隊來保衛普盧特河，『所向無敵』的意大利軍隊也被召來了。法國有一句諺語：『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莫索里尼能作善戰的講演，能唱窗下情歌，能搖旗吶喊，可是，這對希特勒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希特勒所需要的是兵士——能够作戰的兵士；而莫索里尼恰好沒有這種兵士。意大利人開玩笑說：莫索里尼想仿照古來的凱旋門，爲他勝利的部隊建立一個新的凱旋門，門原是可以建築的，可是，誰將在下面經過呢？莫索里尼所派遣出去的軍隊，通常是不會再回國的——他們不是投降便是被俘。在西班牙戰爭中，西班牙空軍曾在瓜達拉哈拉附近投下小冊子，寫着：要拿着這『通行證』的人，將被作爲俘虜送到後方，一直被養活到戰爭結束爲止。我曾看到過許多『勇敢』的黑衫團員拿着這種『通行證』到西班牙共和軍陣地去。當巴黎陷落四天之前，莫索里尼才最後決定了進攻爲僑國賊所出賣的法國，可是他的虛張聲勢，還沒有來得及達到邊界上。黑衫團員在里比亞表現了有耐心的奇蹟，他們每天走一百公里——逃開英軍。當然，意大利人不是怯懦的民族，他們是能作戰的；不過，他們不願爲希特勒或其隨童莫索里尼犧牲而已。意大利人曾有過一個受日耳曼人壓迫的時期，將近一百年前米蘭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他們大聲疾呼：『逐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由

此獲得獨立。可是現在意大利法西斯將他們的國家賣給了希特勒，意大利人民又在準備發動新的解放戰爭了。意大利城市的牆壁上滿寫着這個句子『趕出德國人！』同時莫索里尼又發表講演了，他是一個老壯。他將高叫着『前進吧！』一直到臨死前的一分鐘，他派遣了『無敵』意大利師團去對蘇聯作戰，而他自己則將一面向後奔逃一面狂叫：『前進吧！』黑衫團團員在離開羅馬時，對他們啼哭着的妻子傲然自得的大叫：『給我們寫信到伊爾庫斯克去。……』當然意大利軍是決不會到伊爾庫斯克。他們不贊成在托木斯克停下，因為太近了，可是，不幸的是去年我們曾看到意大利報紙上講，去年莫索里尼赴埃及的軍隊會高叫：『給我們寫信到印度去。』幾個月後他們可就到印度去了，原來那兒正是英軍送俘虜去的地方。好，就是伊爾庫斯克吧，同志們，這是沒辦法的事，你們得毫不延遲的替這些勇敢的誇口者準備看守所。至於住址，他們已經指出了。他們是不喜歡拖延的。我得知他們，他們的戰鬥性的口號是：『假設要投降，就投降吧』。……天幸莫索里尼只派了一師團來，要不然，黑衫團員會把我們連屋子都擠破了，通心粉也不够他們吃了。

劊子手和他的走卒們

老元帥只當在八月十二日的一次講演裏說：『一股黑風吹過了法國底某些地方』。這位法國的投降魁首所說的『惡風』究竟是指的甚麼呢？或許他是指希特勒已經決定要殺死被吸乾了血的法蘭西

吧？

不是的，貝當元帥是不關心法蘭西的。他所想的只是他自己。他已經把他的命運和德國法西斯主義底命運聯結在一起了。這股『惡風』便是覺醒的法蘭西底憤怒的精神，愛國者底呼聲和戴高樂的軍隊。

在凡爾登的日子裏，貝當元帥會謙虛地稱他自己爲一個『共和國底士兵』。今天，在把法蘭西投降給敵人的宰割之後，這位元帥却稱他自己爲『我，菲力浦，貝當元帥』了。但全世界都知道法蘭西是被流氓阿貝寇所統治的，他在這次大戰前會是一個希特勒底間諜，並曾被警察從巴黎驅逐出去。

維希政府儘力要把被征服的法蘭西變成德國的一塊殖民地。一年以前在維希附近的軍火部中，貝當的將軍們會忙於草擬那些要讓給希特勒的軍事裝備底清單。他們熱心的工作着，並且親自察看，不准放錯了一顆手榴彈。他們把新的飛機和坦克交給了敵人。當戰爭還在繼續着，他們却在漠不關心地工作着，在他們的心不在焉中，他們完全忘記了軍火列車、裝甲車和坦克。在投降後，他們變成了委順的僕人。他們把他們的私人命運與法蘭西底敵人的命運聯結在一起。他們忘記了光榮，忘記了法軍的旗幟，他們忘記了他們曾是法國人。

海軍上將達爾朗想要取貝當而代之。他仇恨英國。他憎惡英國具有強大海軍這一事實。他企圖把法國海軍投降給希特勒，傀儡貝當在他最近的一次演說中說，他要和希特勒『合作』。這位老元帥在莫索里尼面前尤爲卑躬屈節，讓這位幫兇享受尼西城（法國南部海岸一個城市）。

貝當的對內政策建築在對德的屈膝上，而他底綱領可以歸納於這樣的公式中：『把警察的力量擴

大一倍。』

希特勒企圖染指阿爾及爾，拉巴特，達卡爾並把法蘭西拖入戰爭。這位元帥嘖嘖着說：『把警察的力量擴大一倍。』法國人民正在嗷嗷待哺，而這位元帥所做的却是在希望和以衰老的聲調一再地說：『把警察的力量擴大一倍。』

這位元帥和投降者並非要從希特勒匪徒們的手中把法蘭西拯救出來。絕不！他要把國家從法國人民手中拯救出來；不是從投降者們的手中，而是從愛國者們底手中把法國拯救出來。

貝當底一個警察總督夏波·得·黎利最近在加隆納地方徵發了居民所有的牲畜和穀物。這些法國人在飢餓中，糧食究竟怎樣了呢？這位警察總督把它們送到佔領區——送到希特勒匪徒們那裏去。這位總督對他的同僚們說：『與德國人合作乃是一樁有利的生意。』

海軍上將達爾朗具有同樣的意見！法蘭西底被出賣對於貝當底繼承者乃是一樁『有利的生意』。這位元帥把希特勒匪徒們對蘇維埃領土之強盜進攻稱為『保衛文化』，但法國人充分知道希特勒是如何『保衛文化』的。

爲什麼亞眠和奧勒安，盧昂和阿拉被毀壞了？爲什麼一萬婦女和兒童在巴黎近郊被槍殺了？爲什麼法蘭西處在飢饉中？爲什麼德國暴徒們在巴黎侮辱法國人？因爲希特勒在『保衛着文化』。

這位元帥是欺騙不了法國人的，每輛德國的坦克被毀在烏克蘭的戰場上，每架在莫斯科上空被擊落的希特勒的飛機，在被俘虜的法蘭西底心中種下了希望。

貝當知道法國人和誰站在一起。他會企圖招募『志願軍』，進行反對蘇聯的戰爭。成百的敗類和

盜賊，唯一無二的賴伐爾底精神信徒們響應了這一招募。

禁止自由言論的法蘭西已經發出了它底戰鬪的嘆息。工人們在被壞着機器，拒絕給希特勒生產砲彈。農民們在宰殺着他們的牲畜——他們拒絕以法國的牛排供給貧食者的阿貝茲。巴黎的街道變成激烈的遊行示威底場所。全國反覆高呼：大不列顛萬歲！蘇維埃俄羅斯萬歲！自由法國萬歲！法蘭西在等待着它底時機。法國人民將拯救它。

他們在準備着戰爭。遊行示威，塞那河中德國軍官們底屍體，在工場中的怠工——這不過是一些先聲。暴躁的人們迫切地要躍入行動。人民在約束着他們。復仇必須用冷靜的頭腦去計劃，準備和估計。而法國人民的復仇將是可怕的——為這次戰爭中的色當和岡比涅，為巴黎和維希復仇。在與這位劊子手算清賬之後，法蘭西將不會忘記這位劊子手底走卒們。

（紀堅博譯自一九四二年一月莫斯科航訊）

希特勒匪徒的獸性

德國是被圍在一座風絲不透的牆裏面了。它那集中營裏的呻吟很難傳到世界上來。油光光的里茲特洛甫曾僕僕於歐洲各首都。很少有人看透這位遛節整潔的旅行老闆的黑心。德國人也間而在國際展覽會上出現過：很有禮貌的店員們陳列出裝訂精美的書籍，但觀客們並不看它裏面印些什麼。店員們

讚美着他們的自來水筆和安全剃刀，可是誰都不曉得德國人將用這些筆來記載：他們強姦了多少個少女和燒燬了多少房屋。誰都不曉得德國人會丟開這些安全剃刀，而用普通剃刀來割傷兵的鼻子和耳朵。人們總是按着古代的畫像來描繪時人的面孔。回想哥德就忘掉希特勒，憶起席勒就忽視了戈培爾。質樸的人們認為德國還是個國家，可是他已經變成了龐大的盜賊組織；德國人還是人民，可是他們已變成無數的匪盜了。

這座牆是倒塌了。全世界的人種學者可以在許多被燒光了的俄羅斯城市底廢墟上，研究出希特勒族類的生活形態和習慣。

我首先從外觀說起，每個見過俘虜的人都會承認：在我們許多城市中駐紮的不是兵士，而是帶有卍字烙印的畜生。德國人把淪陷區弄成了牲口圈。一看見俘虜，他們竟懾得使人欲嘔。在剩下來的這些完整的房舍裏，女集體莊員們都要用開水來刷牆，刮光地板，敞開屋門：『放出他們底氣味』。德國人把他們住過和睡過的房間都弄成了茅廁。『俘虜們談些什麼？』——住在古比舍夫或斯得洛夫斯基的公民們會這樣問。這問題很難回答：俘虜們不談話，他們在搔癢，喧嚷着好像生癩的狗一樣。他們底手上沾滿了泥垢的厚皮，胸脯上佈滿了珠串似的小生物。從巴黎弄來的碧藍色短褲和玫瑰色的襯衫，都變成灰褐色了。

女集體莊員們常談論着這些可憎的寄宿人底生活形態：一個人擦完了腳又用那條手巾擦臉；另外一個就在房子裏女人們面前便溺；第三個在他同伴們吃飯的桌子上抓虱子；第四個用鑊水桶煮咖啡；第五個把砂糖裝在臭襪子裏。不值得再說下去了。一個俄國人很公正地告訴我說：『他們把我們都弄

髒了。」

這是十年前的事情。在德國有一個商人很驕傲地對我說：『您瞧見嗎？連我們底豬都非常乾淨……』當然，這是吹牛，實際上這個商人不過是想抬高威士特佛里火腿底市價而已，但結果以整潔自傲的德國人，反比豬還髒。

那個在房子裏女人們面前便溺的德國人，還尋找烟灰碟來投烟頭。一九四二年的柏林人和野蠻人底區別，只是在他們底成套的約束，規矩以及成套的機械的手勢而已。現代德國底文化，只是原始野蠻之渾噩上面的一層薄膜罷了。在俄羅斯冬季底條件下，德國人都不洗澡了，他們不願在嚴寒裏洗澡。他們寧願讓虱子爬得發癢，也不肯挨凍。假若沒有溫暖的廁所，就把房間當作廁所用。這樣，冒牌的文明人在兩星期中就變成了畜生。

外麥的清潔是和內部的清潔聯繫着的。霍亨族倫王朝時代（譯註一）德國的兵士，決不是安琪兒。他們也搶掠過，淫蕩過。但比起一九四二年出現的德國人，他們還算是純潔的女學生呢。他們腦子裏還存在某些道德觀念。比方說，他們還知道什麼是母親。他們還儘可能地不在房間裏吐痰。他們搶掠過東西，但知道是在搶掠，並不把賊贓叫做『戰利品』。希特勒施行了手術，他切實地把德國人意識中底廉恥心消除了。在這個截去（譯註二）之後，使德國士兵同時變得既強又弱。他們之所以強，是因為失掉了道德底止動器（譯註三）；他們之所以弱，是因為喪失了人類底品質。

，我知道，虱子是繁殖在人底身體上，而不是在人底意識裏。我曉得這些小生物是和德國人兩三個月不換的絲襪衣有直接關係的。可是我總還認為虱子同樣也和法西斯主義有關聯。因為缺乏道德標

準表現到德國人底外觀上來，以致變成現在的面貌。我曾經看見過幾個洒着香水的大尉帶着肥大的鼻子。他們並不願意保持人類底體面。至於說到香水，只不過是機械式地重複過去的和現在的死板的生括習慣而已。英國的水兵們在砲火下每天還要用冰水刮臉。這不僅是一種習慣，而且也是某種文明的象徵。但是這種燦爛的文明，很快地從德國人身上消失了。就同一層薄薄的鍍金底消失一樣。

要不要談一談他們底內部污穢呢？他們不僅僅剝去了俄國人或法國人底衣服，他們還相互偷竊一塊麵包，一捏菸草或一雙襪子。軍官們雖然宣稱淋病是『妨礙兵士爲元首服務』的，但是寫的消滅淋病的命令却不生效力。在德國內部，希特勒黨徒們總是不離開妓院的。他們把猥褻的圖畫貼在俄國人家的牆壁上。我們看見過一個德國上等兵，居着重要的職位——妓院老闆。在他們底背包裹猥褻的畫片夾雜着家庭像片。他們對妓女們談論着自己的老婆或未婚妻，這真是污穢底本質。希特勒體制把他們底基督教道德底殘餘，崇拜家庭觀念和固有的質樸全部消除了。所有這些都被賭博的宿命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代替了。人們有時稱他們爲異教徒這是不正確的。因爲在任何異教裏，都存在善與惡的觀念。但這些觀念在希特勒黨徒底意識中已蕩然無存，只要對他們有利，什麼都肯做。

一個壞蛋在他自己底日記裏這樣寫着：『幾時我才可以告訴艾爾茲說：我已經把一個女布爾塞維克吊起來。她大概會依從我。』另外一個在筆記上強調着說：『女人們最愛殘忍的人。』就連尼采恐怕也未肯承認這些貪婪的羊是自己底信徒。現在德國底野蠻，與其說接近哲學體系，倒不如說接近牲口圈更確切些。

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歐洲中心建立起一個具有現代技術，而又極端類似一個遊牧時代的強盜集

團的國家，這真是出乎歷史範疇之外的。男人們外邊搶掠東西，妻子們在家中等待着給她們帶來荷蘭的乳酪、巴黎的絲襪和烏克蘭的豬油。關於日耳曼人種優秀底談論，以及長至四十頁的論述戈培爾頭顱骨優點底論文之類——全是違反時代底謬言，德國底舊習慣甚至每個噴嚏都用『科學原理』來證明。

一切的文明屬性都從德國人身上脫落了。他們輕率的依照褐衫黨首領底指定任務實行生殖，根據瘋人希特勒底妄想『修正』聖經，承認屠殺是人類底自然形態，返回到穴居時代的習慣去。機器文明底膨脹，助長了這個大國的這種犧牲。每個德國人都已習慣去機械式的生活。他們不思考；因為思考可以破壞國家機構，破壞腓特里底桶。他們蒙昧地服從。這不單單是些羊，不是的，而是些愚昧的羊，假如可以這樣說話，這是愛羊者或汎羊論者。他們把所有的熱情都用到機械的服從上邊去了。許多次和俘虜們談話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來：『那麼你自己對這個怎樣想法呢？』每次都聽到同樣的回答：『我不思想，我只是服從。』

他們把自己固有的歇斯的里都放到機械的思想和行動中去。分寸底感覺對於他們是茫無所知的。他們採取了所謂『中庸』之道，而竟把他弄成妄誕不經。精確性和穩健性在他們底瞭解中都變成帶有精神缺欠而又拘泥於一種夢想的玄學了。雖然他們生活在不吹法螺之中，但仍然還是香腸匠（譯註四）或獄卒。他們以激情的普調談論着贏來的幾個芬特（譯註五）或是被打的兒子。擺着拿破崙架子的希特勒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是害了誇大狂的探子，結夥行劫的罪犯，是一個巨大的痛腫上底一大粒。我們看見了這些人，他們沾污了我們的城市。他們在巴黎折毀了愛菲爾塔，拿削戕門竟竟趕走交

首台。他們以淋瀝橫行的妓院來紀念自己的『十字軍』。他們說：在德國機器文明底後面，任何人類底常規都不能存在。到我們這裏來的是帶着自動火器的原始人。一看見他們底『哲學』就想立刻到溼塘去，但是看見他們頑強抵抗時，不但不覺得可敬，倒反而感到深切的憎惡：總是機械而又機械。很想到每個德國人屍體上喊出：『偉大的東西，是人類底自由。』

想消滅他們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們並不是靠思想結合起來的（在這裏不能談到什麼思想），而是靠機械的服從和連坐法的感情來結合的。他們不以流血為恥，但他們並不是瞎子，他們也看到血。他們懂得不能把一切都歸咎於希特勒，而把戈林或是勃魯賓區都宣稱為復活節的羔羊。畜生底臉上沒有不長血手的。思想團結英雄，『壞事』聚集匪徒。這個匪幫非常大，就像在故事裏講的一樣，要把他們拖出來都拖不盡。當然，我們要把他們『全拖出來』，但這是一件極嚴肅的事業。

可是，這次發生在莫斯科附近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一幕，而是帶有深刻的教訓意義的和崇高正義的歷史的：人類精神底力量，理性底光明，善良定能戰勝野蠻底黑暗，戰勝傀儡們底沒靈魂的機械與寄生蟲底誇大性的。我們通過今秋的黑霧帶來了光明，帶來了我們文化底光明以及我們公正地稱為全人類文化底光明。這是古希臘底光明，文藝復興底光明，十八世紀啓蒙運動學者們底光明，這是人類用以反對恭順，頑固和古舊傳統底一切東西。太陽般的明朗已開始確定了我們反德的鬭爭：理性，精神純潔，自由，高尚品格。『你知道什麼是正義？』——我問被俘的德國人。他用手遮住了臉來代替回答，就好像我要打他似的。我看出德國現在是這樣的——它害怕向前展望。它現在還在呼吸，還在活動，還在射擊，它還有能力屠殺和破壞，它還能給全世界以巨大的災殃，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已經不是

活的生命了，而是像老鼠在臨死之前的短促的反覆顫動一樣。

〔譯註一〕 霍亨廉倫王頭就是普魯士王室。由十八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威廉二世被廢時為止。

〔譯註二〕 醫生割頸病人腰四肢或其他部份等叫做截肢。

〔譯註三〕 使機器齒輪轉動停止的機件，叫做止動器。

〔譯註四〕 俄國將俄國人爲骨體匠，含有輕侮之意。

〔譯註五〕 芬特，德國貨幣單位名，一百芬特爲一馬克。

（邵天任譯）

劊子手的工廠

當你同被俘擄來的希特勒匪徒們交談的時候，當你閱讀他們的日記和信件的時候，你會這樣自問：這些粗野而殘酷的東西是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爲了了解劊子手們怎麼演出了一套一套的殺人把戲，那就應當來看一看希特勒的勾當。

希特勒毀滅了愛情，婚姻和家庭。他把人類社會變成了牲畜交媾的場所。

萊布齊區的教授愛爾恩斯脫·比爾格曼在『認識和母性』一書中這樣寫道：『一夫一妻制，是一種曲解，它只能破壞種族！幸而我們有着很多富有善良意志和優秀品質的青年，每個青年都能授胎給二十個少女』——這句話不是隨便寫出來的，而是希特勒黨徒中號稱爲『學者』的愛爾恩斯脫·比爾

格曼所說出來的。

德國農業部長達爾萊把婦女當作製造人類的工具，而將其劃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是品質最優秀的婦女，她們的婚姻應當獲得補助金的獎勵。第二等婦女是中等婦女。該部長提議將不生子的作為第三等婦女。第四等婦女，便是被禁止結婚的。

希特勒爲了『改良日耳曼種族』起見，想以組織合法的同居關係來代替戀愛和婚姻。希特勒的衛隊，所謂黨衛隊有權利和那些她們的祖先曾被『種族部』檢查過的女子結婚。

在經過希姆列爾簽字後所頒佈出來的，藍衫黨徒的繁殖的命令中，這樣寫着：『黨衛隊本身是按照一定標準選拔出來的具有北方性格之德國男子的一種組織。』

在該命令中指明黨衛隊婚姻的規則以後，希姆列爾還繼續說：『我之目的是以此來保持德國人傳統的健康和未來的高尚血統。』

德國報紙『P·標巴特爾』曾這樣登載着：『我們的農民們懂得什麼是純潔的種族，如果我們以普魯士的母牛比飛揚和格來佛爾的母牛優良得多而自豪，那麼我們將再無人以馬克思，海涅，和武布留克，艾什登而自豪了。想到種族承嗣的問題時，我們就應當接受我們農民的經驗。』

換句話說：希特勒黨徒的繁殖應如普魯士的母牛。

應當說，除了黨衛隊（一個青年可結配二十個少女）之外，德國人是不喜歡希特勒的寓言獸語。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時候，德國陸軍參謀本部軍事處，曾經對連一級的指揮員頒發了一個標題爲『孩子太少』的訓令，在該訓令中我們找到這樣的訴述：『如果有這樣一天——我們連自己的國家也無

法保持與維護，那麼行將到來的勝利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沒有兒童還要什麼大房屋呢？」

該訓令繼續引證着數目字：『在一九一〇年，六百四十萬健康青年的家庭中生育了一百八十萬人；但在一九三九年，八百六十萬家庭中僅生育了八十六萬五千人。』頒佈訓令的人最感焦慮的是斯拉夫人繁殖率的增長。他們指出：在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有百分之三十二是日耳曼人，百分之三十五是斯拉夫人。可是現在呢，日耳曼人只佔百分之三十，而斯拉夫人，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了。

最後，該訓令確切指明德國人之所以應當繼續增加與繁殖的原因是：『每一個在一九四一年誕生的健兒，到一九六一年就可變成勤儉的精兵。每一個在一九四一年誕生的少女，經過二十年後可以成爲家庭中勤儉的主婦和母親。』

劊子手工廠的主人們，並不隱瞞自己的企圖——他們所焦慮的是關於一九六一年誰去進行屠殺和掠奪的計劃。很顯然的，德國的人民並不願意叫自己的親生的兒女去進行屠殺和掠奪。甚至在那些青年中間——一個人能結配二十個少女的人中間，也有着『懶惰蟲』。

限制婚姻，以畜類的態度對待人類的感情，這完全歪曲了德國人民的整個心理！希特勒把寡廉鮮恥和淫蕩荒亂，造成了社會的必然現象！我的面前就有在德國印發給士兵作消遣的許多『接吻畫片』，另有一種『接吻證』准許士兵們接五次吻。接五次吻等於吃五克爾姆（公分）牛油一樣……這種滑稽的畫片，已經說明着在法西斯禽獸影響之下，德國人的心理已墮落到了什麼地步。

德國所有的兒童都是屬於希特勒的。十歲的男女兒童就受宣誓：『在上帝面前宣誓，堅決的無條件地遵從希特勒元首』。

希特勒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曾說：『在我們中間還有一些毫無半點用處的過時的人們，他們如同貓狗一樣在我們的脚下亂絆。但這並不攪擾我們。我們可以攫取他們的兒童，這些兒童們將受到適當的訓練，我們再不允許他們走上舊的思想道路。十歲時我們就把他們收取過來，十八歲時就可以把我們的精神貫輸給他們。他們不會躲開我們，他們並將加入黨，加入衝鋒隊或黨衛隊。』

到十歲時，父母們就要把自己的親生子女交付給吃人的野獸。如果藏匿兒童，便要遭受罰款或監禁的處分。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德國教育部長里斯脫和『希特勒青年團』領袖阿克思曼曾訂立了一個『協定』。按照協定的規定，兒童們從上午八點鐘到下午兩點鐘應在學校裏邊，所有其餘的時間便屬於『希特勒青年團』。協定條文中指出『屬於希特勒的時間是神聖的』！教員們如果由於參觀或由於所給家庭課業而侵犯了『希特勒的時間』的話，是要負責的。每個星期六的時間，是完全屬於希特勒的。每個月中有兩個星期日歸孩子們的父母，其餘的兩個星期日歸希特勒所私有。這樣一來，兒童們都變成了小奴隸，他們只會工作，操練，漸漸習慣於不會思索了。

此外，甚至在學校中也都由『希特勒的時間』所支配着，在派教員的履歷表中規定着四點。

一、遺傳品質和種族概念；

二、政治信仰；

三、體力；

四、學識。

至於數學教員是否懂得數學，這倒是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却是『種族概念』和『體力』。

列納爾教授給『德國物理學』教科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這是純粹阿利安人的物理學。這一科學是由種族所創造。而且取決於血統底純粹性。』

埃爾維·格克教授在『國社主義教育雜誌』上這樣說：『數學，是北部阿利安人精神的表現，它對於統治方面的慾望是駕乎全世界之上的。』

對兒童們，自幼年起就這樣說：『戰爭是最快樂的事情』『你一長大，就應殺死一百個仇敵』『希特勒元首愛你和戰爭』。

最下等的話，越來越怪；預先訓練充當砲火的人去意識到吃人者是嗜好人肉的。

戰爭爆發前兩年，德國教育部介紹各學校將用羅克特坡底『軍事書籍』一書，這書是作為準備着走向未來事變的。在該書中是在這樣的假設着戰爭的情況：『對準我們射擊，是會很少的。我們蹲在掩壕中，這裏是很舒服的。我們有烟抽，有很多東西吃，還可以尋開心。』

極小的孩子們都在歌唱着，其歌詞逐字逐句翻譯如下：

『如果全世界處在一個廢墟上，

是他的鬼，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而我們仍然會向前挺進，

因為今天屬於我們的還僅是德國。

而明天呢，就會是全世界！——這就是小納粹黨徒所學大人說話的稚氣。

在一九三六年時所頒佈的法令，在『希特勒青年團』中還有着自己的貴族，這就是『希特勒其幹

青年團」——這就是挑選出來的份子，將來的藍衫黨。這些小孩子有權處罰其他兒童，他們應把自己的父母和教師的行動報告上級。這些『基幹青年』現都被誘惑去充當間諜和劊子手。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道：『應當這樣來訓練每一個人，使他們感覺自己比任何人都高超。』

人類的團結，同志間的感情和謙遜，都已從希特勒主義中驅除乾淨。

『希特勒青年團』的道德原則，就表現在希特勒吃人野獸的格言上：

『我們應當安心於殘酷——高尚的感情底時代早已過去了。』

『我們要將人從下流的妄想——所謂良心裏解放出來！』

『我們培養尖刻的，嚴格的，殘酷的青年。我要這樣，我要他們像青年的兇猛野獸一樣，使世界在他們的面前都要發抖！』

希特勒以種族交媾的方式代替了愛情，他給予德國婦女的是以『一個青年交配二十個少女』來代替婚姻制度。他奪取了兒童，毀滅了家庭，他破壞了學校，他以愚笨的吸血兇手代替了學校的教員。希特勒把自己描寫為一個隱士，同時他提倡『新道德』——崇拜掠奪，鞭打和屠殺。這些人是難以侮辱的——他們自稱為殘暴與無良心的。

於是乎在一九四一年，黨衛隊就開始來侵犯我們，他們總還記得在學校裏上課時對他們說的話：『對準我們射擊的是會很少的』。在聽到俄國的炸彈和手榴彈的爆炸聲之後，他們是驚慌失措了。

當他們帶着『接吻畫片』和貪得無厭的慾望，向我們走來，而迎接他們却是子彈。於是他們便馬

上目臉口呆了。

當他們被俘的時候，他們哭哭啼啼地說：『我們並不願意這樣啊！』

當我們的坦克向他們衝的時候，他們便拋棄了自己的長官，和一切祕密的文件，逃之夭夭了。

青年野獸也有着各種不同的類型：有的兇如猛虎，有的胆怯如鼠。希特勒黨徒之胆小儼如老鼠一樣。將他們訓練成嚴格而不胆大，殘酷而不英勇。

希特勒所焦慮的——到一九六一年時，他是否有足夠的兵員？他對自己的軍官們並不隱諱自己的幻想——二十年後還要戰爭，將永遠戰爭。

但是對於一個兇猛狂人，都可找到對付的辦法。現在，我們的戰士們正在準備着收服這些吃人野獸好的和馴服的辦法，到一九六一年時，人們讀到我們這一時代時，是會很驚訝的。他們將會發問：為什麼人類能夠對這個法西斯罪魁希特勒忍耐這樣多年呢？當我們的兒童讀到敘述希特勒結局的一頁時，他們將帶着很虔誠的心情想到我們紅軍戰士在結束寡廉鮮恥的法西斯主義時所表現的英勇。

（高中一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真理報』）

六月

——紀念蘇德戰爭一週年

一年前的這個禮拜六的夜，對於莫斯科的居民們，是個平常的、短促的六月的夜（註一）。人們

的思想，都集中在如何消磨這個夏季假日的問題上。這是個禮拜六的夜，莫斯科的各俱樂部裏面，都擠滿了在消磨假日的青年人們。

第二天早晨，莫斯科很晚地才醒過來。當無綫電廣播員的充滿了生氣的聲音，劃破了那夏日的恬靜時，人們才坐下來吃早餐。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是度過了怎樣的一個夜了！

『戰爭』這個字，正像空襲警報最初的悲鳴一樣，響聲是有些異常。一年已經過去了，現在『戰爭』這個字，已變成生活本身的一部份了。

人民貢獻出他們所能貢獻的一切，從沒有猶疑和想過第二次。偉大的人民，是從不估量他們的犧牲的。蘇聯在這次爲了爭取她的自由的戰爭中，已貢獻出她的一切，誰將來會去告訴世界：在炸毀得尼泊的水閘——這蘇維埃國家的誇耀時，這是件多麼艱難和苦痛的事！全世界的報紙，都講起得尼泊的水閘，但是我們還知道好幾千的類似的犧牲。在一個遙遠的烏克蘭的鄉村裏，集體農場的女場員瓦里亞·格魯先科焚燬了她的茅屋，而不願把它留給德國人。這是開平常的和簡陋的茅屋，但對於住在裏面的這個家庭，却是一個家，是他們自己的小天地。至於那些習慣於過富庶生活的人，他們是很少知道物件的價值的。在帝俄時代，財富只是少數人的東西。一雙白樺皮的鞋子，這不僅僅是雙鞋子，它還代表更多的東西，它們是人民的象徵。當時成百萬成百萬的俄國人，只能卑謙地畫一個不成形的十字，來代替他們的簽名。我們所犧牲的，並不是我們的遺產，並不是一些易於流傳下來的財富，而是我們英勇的一代人的血汗所得來的財產，我們的人民們，已犧牲了他們的一切！

去年的夏天和秋天，蘇聯是生活在車輪上。誰要是看見過那些難民們的無盡的行列，誰就不會忘

記了他們。人們靜默無聲地走向東方。許多工廠的全部，也是這個大運動的一部份；許多城市也正像大船一樣，移向了東方的地區，在這廣大的蓋了白雪和荒漠的草原上，卡爾科夫遷來的工廠開始在裝配他們的機器。在遙遠的沙漠的地區裏，莫斯科遷來的卡美尼劇院已開始了冬季的演劇，科學家們在運輸車裏面寫成他們的著作，基輔的居民散住在中央亞細亞的鄉村裏，巴希吉西亞收容了烏克蘭的最高學府（註二）。

但是在這個簡短描寫後面，是存在着怎樣一種痛苦，和隱藏着多少拆散了的家庭。這些話又表現出多少充滿了艱苦和獻身工作的可怕的日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了之後很久，凡爾登四周的田野裏，還是一片荒蕪。砲彈已經穿毀了地層，甚至連青草都不再生長了。有許多蘇聯的家庭，也正像這些田地一樣，他們的丈夫，兒子和兄弟們都失散了，並且永不再回來了。這種悲哀是深沉而又無法補償的。沒有人講出這種悲哀，但是我們的婦女，在她們的工作中是太堅強了，她們從不放鬆她們的眼睛在注視着戰爭。

在聯合國日這一天（註三），美洲的許多國家和英倫三島上，都懸掛着各國的國旗。蘇聯的城、市，從摩爾曼斯克一直到海參崴，也裝飾着旗子。但是我的心，只想起一面旗，那就是高傲地飄揚在塞巴斯托波爾上空自由的旗幟。在那兒，在激戰的地獄似的轟聲之下，在小小的堡壘裏面，男人們和婦女們抵阻住十個德國的師團和五百架飛機。塞巴斯托波爾不過是這次偉大戰爭歷史中的一個插曲，是它的史詩的一頁。但是在今日，沒有任何其他的名字，能比塞巴斯托波爾這個名字講出更多時關於蘇維埃人民的勇敢和自我犧牲精神，犧牲和艱苦試練的一年，是已經過去了。我參加了最近所舉

行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常會。我看見了斯大林，他的面孔是充滿了果決的表情，對於勝利的信心，以及爲了人們而感受到的痛苦。代表們是從各地來的。其中有許多，是我從前所知道的人。但這是多麼驚人的變化呀！好幾個十年，都壓縮到這短短的一年裏來。戰爭把蘇聯鍛鍊得堅強了，它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有力過。現在這一次戰爭，是由那些很少夢想到戰爭的一代人來進行的。這一代的人是相信各民族的爱愛的，他們帶着潑潑的生氣在讀着巴比塞和雷馬克的著作（註四）；這一代人是同情那些在艱苦中生活的德國人民的。這在我們的青年人們，是不很容易了解那迎在他們前面的敵人的。

一年前，在迅速掠過的夜裏面，穿着灰綠色服裝的兵士，正像青蛙一樣地匍匐着，穿過了我們田野裏面還沒有割掉的高高的草地。最初，我們的兵士們還在想：他們是在對付這些迷了路的人們，並且能使他們重新回復理智，但是這些鼯鼠還是在向前竄，強姦我們的女孩子，吊死我們的老百姓。在今天，憤怒和憤恨正像熾燃着的煤塊一樣，在吞噬着蘇聯人民的心。有一天，我看見了一個紅軍士兵走過，我的鄰人向我耳語道：『他打死了七十個德國兵』。這時間，有一個頭髮已經灰白和滿面皺紋的老太婆，走向這個紅軍，親切的說道：『謝謝你』。

在我們面前的生活，是既艱苦而又容易的。它之所以艱苦，是因為我們必須克服我們在帝俄時代的舊有的和技術上的落後；它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每一條路和每一個機會都開向着我們的青年。是的，我們的青年們走過了生活之路，正像走過廣闊大道一樣。一年過去了，我們的孩子們已變成堅毅的兵士，他們帶着裝火油的瓶子前進，去擊毀敵人的坦克車，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撞擊敵人的飛機。一年前，在戰爭的前夜，紅軍還只是國家的一部份，和它並排着的，還有那些製造坦克車的工

廠，訓練哲學家 and 藝術家的學校；……但在今天，整個的蘇聯都是紅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稱斯大林是我們的軍事領袖，因為整個的人民，都再在行進着。

一年前，德國兵在計算着日子，看他們什麼時候能到莫斯科。但是他們遭遇到一個有力的打擊；在一個七月的清晨，斯大林的警音響遍了全國，他向我們提出了嚴正的警告。他警告我們的人民，要防止那種致命的輕率的態度。德國兵在向東方前進了。在許多友邦的報紙上，已透露出了悲觀的預言。在我們之間也有些動搖的人，但是斯大林並沒有動搖，人民也沒有動搖。紅軍在堅持着，希特勒是夢想十一月七日（註五），能在莫斯科的紅場上舉行閱兵典禮的，但相反的，他却從維斯杜拉到奧德河，從尼曼河到伏爾加河的戰場上，檢閱了德國兵的屍首。而同時，在紅場上，莫斯科的保衛者在向斯大林和我們的國旗致敬。在這一年中，我們已經失掉了很多的東西——我們失掉了許多和平而安靜的城市和朋友，但是我們也得到了很多的東西——我們得到了澄澈的觀察力，有力的憎恨，狂熱的愛國主義，和蘇聯的每一個男女的生長成熟。

一年前，我們這個愛和平的國家，為職業的侵略者所進攻了，在這個侵略者的國家裏面，坦克車蓋滿了田野，就正像其他國家田野裏的綿羊一樣；在這個侵略者的國家裏面，婦女們所懷孕的不是孩子，而是兵士。

一年前，當敵人向前推進時，我們是度過了多少苦難的週！德國兵還很記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但是他們的好運道不會再來了，希特勒曾經允諾過德國兵，說在今年的春天可以解決戰爭，結果也只落了一場空。德國兵只用三個禮拜的工夫，就吞下了法國，但在塞巴斯托波爾，他們却被我們趕走了七

個月，只有最近兩週來才又進襲這個蘇聯土地上小小的支柱，這個在灰綠色軍隊的大海中的表現了蘇聯人民英勇的島嶼。

有一個駐紮在格若支克的德國軍官，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當有人告訴我，說在我們和莫斯科之間，只剩了還不到兩百公里的旅程，我就想說：對於冬天的回憶，把我們從莫斯科分隔開來了。』在德國兵和勝利之間，是橫着這整整的一年，這不可超越的深淵。他們能想起一九四一年的六月是他們第一次的致命傷。他們當時為飢餓和野心所驅使，踏着實在的腳步向前進。但他們很少知道，他們是走進了死神的爪牙之下去。他們開始了這次戰爭，而我們就要把它結束。

一年已經過去了，希特勒想孤注一擲地來摧毀紅軍，然後再轉向英國。我們堅持下去了。我們使得英國能建立起強大的軍隊，我們使得美國能動員她的工業，建造船隻和裝運美國的軍隊到歐洲來。在這整整的一年中，我們是孤獨作戰的。但不久戈培爾會在他關於『東戰場』的公報中寫起這些事：許多曾經一度威脅過英國的德國師團，現在已成了一堆堆插着木十字架的墳墓。而其他的則在摩爾曼斯克和塞巴斯托波爾計算着末日的來臨。德國的軍艦則已從莫倫海峽移到了亞速海和黑海。我們不僅攻陷了德國的東戰場，我們也削弱了他的未來的西戰場。

在我們許多村子和公園裏面的長長的青草中間，我們看見我們英雄們的裝飾着紅星記號的墳墓在戰爭的日子，我們的思念是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是繼續活在我們中間，並在每一隊和每一團中間繼續作戰。這些人在艱苦退却的日子裏，曾貢獻出他們的生命，但他們的精神還和那些後死的人在一齊作戰，奪回了耶來支，羅斯多夫，卡魯加，摩亞斯克。

勝利是不會從天上降下來的。這必須從大地的深處和從心的底層扭奪過來。當希特勒在噁舌不休地空談他的勝利的時候，我們則在講着這次長期的和艱苦的鬭爭。我們已度過戰爭的一年，我們已到了最大困難和作堅決鬭鬥的日子了，我們的訓練還沒有結束。在最後結果來臨之前的一小時，更是艱難的一小時。德國兵正用着全副的力量，在死抓住他們賽跑得勝的那個罪的夢想。他們還想向前推進。而我們要把他們抵住和把他們打回去，也是更加雙倍的困難。他們在這次抵抗中是會不顧死活的，因為他們對於那數不盡的罪行的恐懼心，給了他們以力量，我們並不忽視這一件事情。我們知道，走向最後勝利的道路，是條充滿了荆棘的道路；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條路是屬於我們的。

一年前，我們聽見這樣的話：『勝利是屬於我們的！』那時候，勝利還遙遠得很。那只是歷史上的一頁，只是對於未來的預言。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勝利是怎樣的，我們知道這條泥濘的道路，火藥和踐踏了的草地的芬香。勝利已不像從前那麼遙遠了。它就在這兒，在你們的防空壕裏，在你們的戰壕裏，在你們的砲台裏，並且就在今天我們能說：

『勝利是和我們在一起！』

〔註一〕預六月二十一日而講，羅斯科地處北國，一入夏季後，只有兩三小時是晝夜。

〔註二〕巴希吉里亞，是烏拉爾山旁的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註三〕預六月十四日美國國旗日而言。

〔註四〕巴比塞是法國作家，著有「火線下」；雷馬克是德國作家，著有「西線無戰事」，現亡命在美國。

〔註五〕即十月革命紀念日。

〔戈賓權譯自一九四二年紅星報〕

庫爾斯克的『新秩序』

德國人在庫爾斯克過了十五個月，現在他們可以在這個城市裏面來研究他們的『新秩序』的成就了。

在德國人侵入之前，庫爾斯克一共有十四萬居民。其中有二千多被德國人殺死，五千多人被運送到德國去。此外還有一萬多人則死於傳染病。十五個月來，庫爾斯克的人過着穴居人的生活。在晚鐘敲過之後——冬天是下午五時，夏天是下午七時，就禁止再有人在街道上出現。

外科醫院院長科羅文娜醫生的房間的牆壁，都被子彈穿通了。這是德國人的一種娛樂的方法。在喝了幾瓶法國的香檳酒之後，他們就向着科羅文娜和她的女兒所睡的那個房間開槍射擊。

到處我們都可以看見這樣的字樣：『專供德國人之用。』郵政局是只供德國人用的，電報局只是供德國人用的。

庫爾斯克的居民，多半是在城外的謝處卡村被執行槍決的。他們的衣服都被剝光，打死了之後就被丟到水溝裏去。德國人殺死了許多的共產黨員，指揮官的妻子，教育院的女學生，被俘的紅軍，猶太人，婦女和集體農場的場員。有二十五個人質，就是在醫學院的門前被槍決的。他們的屍體都丟在人行道上，並禁止他們的親屬來收屍。希契格里雖然是一個小城，但是德國的劊子手們也還在這兒做了

許多卑劣的事情。在一座橋樑被炸毀之後，德國人立即槍決了五十個人質。春天時候，有六個女孩子被綁在中央廣場上吊死。在尼爾斯克埃村裏，我遇見了女教員普羅瓦洛娃，她的兒子被德國人打死了。在同一個村子裏面，德國人殺死了集體農場的女場員伏羅比娃，小孩子華西里，老頭兒彼特，伏明，理由就是因為德國人要建立『新秩序』。

德國人想強姦瑪利亞·托爾瑪乞娃。這個女孩子反抗着，他們就把她吊在一株大樹上，然後把她殺死了。他們也殺死了十三歲的尼古拉·托爾瑪乞夫，因為他來搶救他的姊姊。

在庫爾斯克本來有四百個猶太人，德國人把他們都殺光了。他們把嬰孩的頭顱擱在石頭上，這樣可以節省子彈。在殉難的人裏面，就有希爾曼和沈德爾兩位著名的醫生。當德國人從城裏面退却的時候，他們想起在醫院的傷寒症的病房裏面，還有一個猶太籍的女學生。這批劊子手撞進病房，病人已經沒有力量起床了，就被當場殺死。在庫爾斯克，只有一個猶太人逃了命，這就是工程師吉塞爾曼。他當時正在傷寒醫院裏，一個看護救了他的命，這個看護告訴德國人，說他早已就死掉了。

德國人在庫爾斯克過了十五個月，這個時期中庫爾斯克總是向外輸出的。他們從沒有輸進過一根針或一個筆尖到庫爾斯克來。這兒也有市場。德國人向農民們購買洋山芋和蔬菜。他們的袋子裏都塞滿了淪陷區使用的馬克。這種紙幣在德國是不通行的。他們的目的，是想讓這批掠奪者好裝出一副做買賣的樣子。庫爾斯克的司令長官還發明了一種新的剝削老百姓的方法：德國人出租許多土地，每一個公頃的土地，他們要求一百四十個盧布和十公畝的洋山芋。佛拉格少校冷笑道：『你們有用地，我們有洋山芋。』這樣一來，庫爾斯克的居民就只有挨餓了。

德國人又宣稱道：『新秩序可造成私人企業和大工業的勃興。』『庫爾斯克記事報』寫道：『騎士們的工廠業已復工，來拯救庫爾斯克居民們的生活情況。』這所工廠是用從俄國農民那兒弄來的羊毛，爲德國的兵士們織縫衫，做工的都是俄國婦女，而縫衫則是德國兵穿的。至於講到私人企業呢？在庫爾斯克僅開辦了很好幾種企業。舉如其中就有柏林『阿多爾夫·菲利普斯』公司的庫爾斯克分店，老闆是德國人阿得萊爾。他僱了二十五個俄國工人。阿得萊爾從當地的屠宰場中弄了皮子來。德國人在吃着肉圓。而由俄國工人們硝好了的皮子，則全送到柏林的『阿多爾夫·菲利普斯』總公司去。

在巴比巧村裏面，德國人拆毀了學校和醫院。他們強迫當地農民用這些建築材料來爲德國人造房子。在最初的幾個月裏面，德國人亂搶鄉村，他們拖走了牛、豬和雞雛。等到德國統帥部採用了『新秩序』的時候，搶掠就變成有組織的了。德國人從每一頭母牛要七百二十公升的牛奶，從每一隻雞要一百九十個雞蛋。在庫爾斯克，還有一種搶掠農民的特別制度。農民們又再度體驗到農奴制的痛苦。德國人說：『新秩序』是農民們的天堂。他們宣佈某一個村莊是『支持游擊隊的』，就把這個村莊的母牛完全沒收，取出五頭母牛來『贈送』給鄰近的一個村莊，並在他們的報紙上寫道：『我們把牲畜供給俄國的鄉村。』在米辛諾村，有一個集體農場的場員，拿了一片麵包給一個俄國的俘虜，當局立即下令放火燒掉五所房子，以資懲罰。這就是所謂『新秩序！』

瑪塞爾少將宣佈道：『我們爲你們帶來了文化的火炬，』在一年之間，所有的學校都被關閉了。最後德國允許開了幾處代用的初級小學。他們關閉了學校，他們關閉了戲院，他們關閉了圖書館。他

們開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尼夫斯基街上開了一所病院，他們帶來了花柳病。在戰前的庫爾斯克，梅毒是完全消滅了。德國人現在傳染了庫爾斯克。根據德國人的統計，每十天中所登記的疾病，其中有七十至八十件都是花柳病。病人們被送進城市監獄裏面去。一百多個人已被德國人殺死了。除了花柳病之外，德國人還帶來了傳染病，白喉病。由於沒有種牛痘的組織，嬰孩的死亡率已達到百分之六十。飢餓、充血和污垢，更準備好一片滋長傷寒病的肥沃的田地。生病的人得不到醫治的，在許多人家的大門上寫着這樣的德文字：『傳染病！軍人禁止入內！』德國人想傳染人家，但他們自己不想被傳染。

許多的俘虜都在老百姓的面前死掉了。德國人到處都貼起爲俄國俘虜徵募衣物的通告。而德國的司令官則把這些東西分給德國兵。俘虜集中營的情景更是可怕：這是一處寒冷而污穢的營房，到處是用各種招牌分開的：這是『供俄國人的』、『供烏克蘭人的』，那是『供各小民族的』，『供傷寒病者』。食物是煮爛了的洋山芋皮。俘虜們都被拷打強迫了去掘戰壕。大家都懷着苦惱的心情，無能爲力地看着其他的人，這是一種心曠神怡的磨難。

兩萬個青年男女被迫從庫爾斯克區運送到德國去，只是庫爾斯克城有九千人。『新秩序』究竟對於這些不幸的人做了些什麼事呢？在過去，我們從德國寄來的信中可以知道一些事實。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見活生生的例子了。

五金工人伊里亞·烏魯托夫，在去年春天被運到德國的介倫希威格去。他們和其他八百個俄國人被關在一個集中營裏面，他們像奴隸一樣地在工廠裏工作和在集中營裏生活着。他們每天的食料，是

兩百格爾姆麵包和一公升完全像水一樣的湯。集中營是由黑衫隊的兵士守衛着的。營裏面的人，只爲了一些最輕微的『罪』，就會被鞭打，很多人都殘廢了。在五個月裏面，八百個人中間有兩百五十個人死於飢餓、疾病和虐待。烏魯托夫患了顯癩症——這真是幸運得很，他們把他送回老家，可是這個青年人，現在已變成一個衰弱的老年人了。

十五個月來，庫爾斯克的人民勇敢地、頑強地、期待着解放的日子來臨。德國人出版了兩種報紙，他們想說服庫爾斯克的人民，德國人一定會勝利的。但是時常有許多傳單，從天空掉下來，孩子們把它們拾起來帶回家，喜訊馬上就像野火似地，傳遍了全城：『我們的人還在抵抗着』，『德國人被從莫斯科打退了』，『烏拉爾的工廠還在工作』……。

但是庫爾斯克的人民不只是在等待着，他們還在打擊侵略者，鐵路工人破壞了德國的火車頭，女孩們在運送軍火，游擊隊殺死了德國人。這兒有一個名字叫做巴布金的工人，他有着一副善良的俄國人的面孔，他是一個游擊隊的首領，他組織了爆炸火車頭的工作，把武裝運到法台茲去，幫助俘虜過前綫。牧師保羅·哥伏羅夫，是個六十七歲的人了：他愛他的祖國。他和游擊隊有着聯繫，他曾經隱藏了幾個蘇聯的飛行師，幫助他們化裝逃過了前綫。女青年團員左雅·葉美梁諾娃，從前是教育學院的學生，她是一個嚴肅的勇敢的青年女性。她的丈夫是紅軍的軍官，當德國人進了庫爾斯克的時候，葉美梁諾娃生了一個女孩子，但這並不能阻止她參加游擊隊，她運輸軍火給游擊隊的戰士們。科羅文娜醫生已不是一個年青人了，並且她也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她是在外科醫院裏面工作的，在這所醫院裏面有着很多受了傷的俄國兵士和軍官，她時常和他們談話，探詢他們的心境，並且問他們：

『你們想逃走嗎？』她幫助他們逃過了守衛的眼睛，她每天都拿她自己的生命在冒險着。現在她是鬆了：『我們的人又回到了庫爾斯克。』她並沒有等空了，她和游擊隊建立起聯繫，這也不是白費心的。

從庫爾斯克退却的德國兵，把所有的大建築物都放火燒掉或是炸毀了，其中就有醫學院，教育院，大教堂，新建的馬戲場——這是全城的誇耀，州執行委員會的總部，當年的貴族俱樂部，所有的學校，所有的高大的建築物及戲院等。甚至像在希契格里這樣一個小地方，都沒留下一所房子，德國人在退却的時候把什麼東西都燒掉了。在齊米略柴卡夫村子裏面，有一所新建的學校。德國人把他改了一個醫院。裏面有十八個受了傷的德國兵。退却的德國兵，把這所學校連人都炸毀了。

庫爾斯克這個俄國的古城，在十一世紀時曾經繁榮過的。當拔都所率領的韃靼人入侵時，庫爾斯克被火和劍毀為平地。兩百年後，這個城市又再建起來。它成了俄國人抵禦南方游牧民族一個堅強的堡壘。後來庫爾斯克又變成了一個平靜的城市，有着多蔭的花園和公園，青年人就在這種美麗的環繞中學習，夢想和成長起來。但是庫爾斯克現在又再度被野蠻人所侵略了。城市裏的灰燼，廢墟，斷磚殘瓦和骨架——這就是『新秩序』所帶給庫爾斯克人民的東西。

但是生命又已經開始在新生了。戰地印刷所印的小型的『庫爾斯克真理報』已經出版了。電燈已經恢復了，麵包房又在出麵包了。在英雄們的墳墓上的白雪中間，堆着無數的鮮花……。

紅軍的部隊，經過這兒到西方去了。但是人民是永遠忘記不了庫爾斯克的悲劇的。德國人曾經有過相當的時間，在此地建立他們的『新秩序』。我們現在也可以知道哥美爾、布利安斯克和基輔的陷

形。我們已知道一切。我們要去審判這些罪犯，我們要提醒他們每個人：這就是你們爲了『新秩序』所應得的懲罰。

(戈寶權譯)

他們將被迫償還

希特勒軍隊底機關報『軍事通訊』裏寫着，說蘇聯不遵守日內瓦俘虜條約。劊子手冒充人道主義者。野獸吃着人類仁慈底乳液亂說。

我們現在曉得希特勒匪徒對待他們底俘虜和被略奪地區底平民是怎樣的。我們不提犧牲底證據，不提目睹的事實；不，我們只把謀殺者自己底口供擺在全世界面前，不是在他们俘囚中所作的口供，而是在自由時的口供：德國指揮官所下的命令和德國軍官和士兵底日記。

德國人殺他們底俘虜。這裏是德國第三步兵師團司令官發出的一个命令。它標記着 A 2 2 的字樣，和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的日子。

『那常常被發現，俄國投降了的士兵，在他們被俘之後，或用船載運到後方的時候，已經被我們底部隊射死了。』

在第四十步兵聯隊，第四大隊底上尉伍長雷契特所保存的日記，戰地郵袋〇一七九七裏，我們發

現七月一日有如下的記載：

『在司令部我們槍斃了六十個俘虜。』

第三七五團（雷齊諾所指揮的第三軍團）下士韓斯·傑根·西門，在他八月七號的日記裏寫道：

『郝福告訴我，一個在頭部負傷的俄國兵曾被命令槍斃。那個被命令結果他的兵士，帶着那個俄國人到他底同志們那裏，並以他底手槍壞了爲辭，把命令轉達給了他們。郝福想，那個兵一定是自己不忍射死一個解除了武裝的傷兵。』

德國人虐待他們底俘虜。伍長佐柴爾，在從維斯巴頤來的戰地郵件二二四〇八B，他底日記裏寫道：

『七月二十五日。夜是黑的，沒有星，我們在夜裏折磨俄國人。』

德國人絞死俄國人。這裏是一道德國第一二三步兵師團司令官發的命令，日子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

『茲頒佈最緊急治罪法，即：在廣場當衆舉行絞殺。曉示當地居民。並釘以俄語標牌：「某某因某故被絞」。以警效尤。』

這不是我們說德國人。這是德國人說他們自己。他們自己描寫了他們底罪行——精密地，迂曲地。還要更多嗎？這些都不是個人底虐待狂底行爲。不，這是一種國家制度。他們射擊俘虜，不是在戰壕裏，而是在司令部。他們依照訓令絞人。一個德國兵士，我們知道，自己是不願意射死一個負傷的紅軍的。在那個德國兵士心裏還剩有一粒天良，他怕執行他獸性司令官的命令，同時又怕不執行他

底命令。但在希特勒底軍官們底心裏却是沒有人性的：他們是畜類。然而他們竟敢說『俄羅斯人虐待俘虜！』兒童底謀殺者，暴行者，絞刑吏，竟無恥地冒充高尚的武士！

我們知道希特勒已在我們國家撤落下了劊子手希姆萊所訓練的兵士底無恥的，可鄙的東西了。一千個德國兵士當中，只有一個當他被命令去殺死一個傷兵的時候會感到羞恥。我們呈獻在文明世界之前的這些可怕的文件——是殘害和虐待至死的人民底血狀。這謀殺者隊伍中間有很多人已經遇到他們底死亡了：在戰爭中被殺了。伍長雷契特底日記上面有子彈孔。福煦斯——他殺死了五十個婦女和兒童——底日記沾有着血污——福煦斯是在一次攻擊中被射死的。

但是這種殘忍的教唆者却藏在後方。絞刑命令的作者，第一二三師團底司令官，仍舊橫行在世上啊。像德元首希特勒，劊子手希姆萊和希特勒底將軍們一樣。他們不怕子彈，因為他們相信一句老話：『將軍是死在床上的。』有爵位的暗殺者坐囚犯板凳的日子快來了。檢查官將只去翻閱希特勒匪軍底罪行表了。我們那時將不說：『他們違犯日內瓦盟約』——因為和畜生打交道怎麼還能有什麼盟約好談呢？我們將只說一件事：『他們餵養了千百萬人樣的畜生，用坦克和自動武器將他們武裝起來，強趕了他們來反對我們人民。』那時希特勒和他底將軍們就要償還一切了——那些被害的兒童和被折磨至死的囚犯，那一切的血和一切的淚。

(山屋譯自『莫斯科新聞』)

頓河在召喚

一個被俘虜過來的名字叫做胡拜爾特·浩爾茲的土士，曾這樣說道：『除了攻勢之外，還有些什麼事情留給我們做呢？我們是沒有選擇的。……』

爲什麼德國人要堅持他們越過頓河的進步呢？這正因爲他們是沒有選擇的。

春天是早已過去了，第二戰場快要出現了，當夏天已經來臨的時候，冬天還會很遠嗎？再過一些時，德國就要紀念第三週年了。希特勒那時候會這樣狂吠着：

『我們已經毀滅了幾百個敵人的城市。』

但這個狂吠，是很難以安慰科隆，布來梅和盧卑克等城市的人民的。希特勒在前一些時，曾經這樣講起德國的人民：

『我們，是沒有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人民。』

但在今天，德國的人口是稀少了，外國的奴隸，飢餓着的德國婦女們，和希特勒手下的官吏們，都在廢墟中間徘徊着。德國是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人民的『生存空間』。

在去年的時候，希特勒是在一片廣大的戰場上向前推進的。在今天，他只能在一塊有限的戰場上進攻了。他調來了很多的飛機和師團。爲了要佔領那個由很少數的英雄們所保衛的塞巴斯托波爾，他

就只得停止轟炸馬爾他島。希特勒已經宣言過，說他快要進入亞歷山大城了，但實際上看起來，似乎是沃羅涅茲的戰事推翻了隆美爾的一切打算。

在去年的夏天，希特勒氣勢凌人地越過了尼曼河。他當時這樣狂叫道：『勝利即在對岸！』越過得尼泊河是比較有些困難了。『和平即在彼岸！』他又用這樣的諾言來鼓勵自己的兵士。他現在又在狂叫起來了：『解救即在彼岸！』他是拚命的想衝向頓河的左岸，但在頓河左岸等待着德國人的，却是死亡。

德國人是被訓練得絕對盲從的。德國兵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架機器；他只做那些命令他去做的
事情。

『前進吧，渡過頓河！』

希特勒向德國兵發出了這樣的命令。他們就這樣向前開步走了，甚至到要淹死了的時候還是在向前開步走。

德國的軍隊是被貪慾所驅使而在前進着。在德國兵士們看起來，戰爭是高於一切利得的，——他們不僅會裝滿了他們自己的肚子，他們還可以送許多『戰利品』回家去，德國人從來沒有用過他們自己的血汗來獲取麵包的願望。他們寧願去吸乾別人的血汗。在冬季的時候，德國兵是喪魂落魄了，他們被約束在戰場裏面，並且開始互相偷竊自家人的東西。

『你們知道，在坦波夫所儲藏的貨物是多麼豐富？』

『還有在沃羅涅茲，我們也有很多的事要去組織組織！』

德國的軍官們就是這樣在懲戇士兵們，而他們涎涎嘴唇就去進攻了。這些乳臭未乾的胆小鬼又活躍起來了。這批俄國皮大衣的新的愛好者，是準備來代替去年那些在俄國墳墓裏面已經腐爛了的人的。

德國兵正在強渡頓河，他們以為在那兒有着市場或者是飯店，他們的口水都流出來了。恐懼格外增加了他們的勇氣，被俘虜過來的德國兵在被審問的時候，他一定是這樣回答的：

「Nicht! (詎!) 我什麼都沒有做，是SS焚毀了那個村莊的。」

在各國的語言中，都有這樣一句諺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布勒斯特，馬上就會聽見有人用波蘭文講這句話，在塞爾是那威話，在慕尼黑是塞爾維亞話。希特勒的統治是被一個憎恨的環所包圍着。在巴黎流行這樣一句口頭語：「吊在路燈桿上」。德國人在巴黎的飯館，電影院和咖啡館的門上都貼着這樣的字條：「專供德國兵士使用」。但是有一天的早晨，這批佔領者看到在巴黎所有的路燈桿上都有着這樣的字樣：「專供德國兵士使用」。也許這些專供德國人用的路燈桿還不够呢。……德國的一家報紙寫道：「我們的犖頭，已經耕過了從前那處犯罪的捷克城市裏底所有的地方」。將來終有這一天，那時候捷克人會回想起這句話的。也許那時候供復仇的犖頭還不够呢！德國人感覺到他們惡報的日子是已經臨近了。他們想遲延它來臨的日子。現在這批發了狂的軍隊想拚命地渡過頓河，來逃避全歐洲的憤怒。可是同時偵察機常在萊茵河的上空盤旋着。萊茵河的兩岸，不久就會嚐到砲彈的滋味。

德國人在瘋狂之下衝向了我們的田野，城市，和俄羅斯的內地，梯姆，斯他尼奧科爾和瓦路易基

等地的婦女們在哭泣着。成幾十個俄國鄉村正在被焚燒着。該詛咒的德國人，帶給了德國更多的災害，受了傷的毒蟲，是更加狂暴的亂咬人。在沒有將全世界都變成火燼之前，它是不想死亡的。

一條長而美麗的俄羅斯大河——頓河在流淌着。在它發源的地方，佈滿在那些爲風所吹掃過去的田野裏面的小溪流，都匯集到這條洪流裏面來。「頓河」這個名字，使人想起頓河哥薩克人在戰爭偉蹟和征伐中的聲譽。「頓河」這個名字，使人想起了德米特里·頓斯科伊這位擊退侵略者的俄國英雄（註二）。使人想起了它多年來的光榮。

現在污穢的德國上士們，想在頓河中游泳了，紅軍是不允許他們來沾污這條大河的。他們爲勇敢所召喚着，他們要把德國兵趕回去。

希特勒意識到他所要吞嚥的東西是多過他所能咀嚼的東西。爲了預防任何的意外，他已經在應用氣象的預測了。他發出了一個報告，說他在埃及的進展，是被「頓河」所阻撓。在沃羅涅茲區，他則主張德國軍隊，「應不願壞的天氣」繼續向前推進。假如德國軍隊這次失敗了，他們會責備俄國的夏季，正像去年他們怨恨俄國的冬天一樣。他們一定要失敗的。讓他們那時候再去講天氣吧，我們還是首先儘快地把他們打败了再說。……

我們必須不讓這批掠奪者前進。我們必須使他們停住。一九四一年不會再來了。紅軍在各戰場上正給了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他們必須幫助沃羅涅茲的守衛者和頓河的兵士，有些戰士們的鬪殺，另一些戰士們的壓力，再加上大家的勇敢！這就是勝利的保證。我們所要的，是在人烟稠密的土地上的勝利，而不是在沙漠中的勝利。爲了生活的原故，朋友們，前進吧！爲了我們的朋友，爲了我們的孩

子們，前進去作戰吧！

（註一）德文意爲「不」！

（註二）德米特里是俄國十四世紀初莫斯科的王子（一二五九——一三八九），曾於一三八〇年在頓河西岸庫里科夫原野上，擊退入侵之鞏斯人，後即取頓河之名，稱爲德米特里·頓斯科伊。

（戈寶權譯）

我們的箴言：『前進！』

德國第六百七十步兵團的兵士維廉·許斯勒，在十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寫給他的父母們道：

『斯大林格勒這個大城，已變成一堆廢墟了，幾乎沒有一處房屋的磚頭能避免不遭損害的。婦女和孩子們都生活在廢墟中間，擁擠在避彈室裏面，他們是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來躲避砲彈和炸彈。現在這場戰爭快要接近勝利的結束了。不久就會有特別公報，通知你關於這個城堡陷落的消息。』

中尉哈恩奈斯寫給他的父母們道：

『自清晨起，我們就向斯大林格勒猛烈的攻擊。元首說道：斯大林格勒必須攻陷，我們也這樣說：這個城市一定會陷落的。』

但是前面所提到的那個特別公報，並不是德國統帥部所發表的，而是蘇聯情報局所發表的；內容

也不是宣佈斯大林格勒的陷落，而是說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已經開始。蘇聯的軍隊，正從北方，南方和西方，一齊向前推進。

柏林無綫電廣播道：

『我們可以拿一件事情來描寫斯大林格勒的戰況——冬天是來臨了。』事實上斯大林格勒正充滿了暖流，城裏面到處都是雨水和泥濘，冬天還沒有來臨。德國人想用『冬天』這個字，來躲避開『災難』這個字樣；但是我們也可以拿一件事情來描寫斯大林格勒的軍事情形——就是跟德國人算賬的時候已經來臨了。

德國現在正是非常狼狽。這一切都是從隆美爾將軍的馬拉松（註一）賽跑開始的。跟着是美國軍隊突然在北非出現；跟着德國人在報紙上所讀到的，不是斯大林格勒陷落報告，而是『頓河曲蘇軍在激烈反攻中』的消息。法國又暴動起來了。德國人本想攫奪土倫的法國海軍，但他們所得到的却是爆炸後的一陣黑烟和猛烈的憎恨。當德國人現在打開報紙來的時候，他們會帶着一種恐懼的心情：『也許又發生了什麼新的驚人的事情吧？』『驚人的事情』馬上就來臨了，它是以大弓（註二）的形象來出現的。此外，彎着脚的那個國家（註三），能帶給德國人一些什麼慰藉呢？四噸重的炸彈不是正炸毀這個『盟友』的許多城市嗎？我們知道，這還僅只是開始。這還不是審判，只不過是把他們提到法庭上來罷了。

在塞夫區，到處都散佈德國人的死屍。他們大半是伍長，衣袋裏面塞滿了許多信。這兒舉出一封阿塞·伏爾夫的信。在他們被打死不久之前，他接到封萊比錫德國民用公司寄來的一封長信，允許

用按期付款的方法爲他建一所房子。這所房子是在萊比錫的什麼地方呢？當然不是的，『是在克里米亞或者是在肥沃的庫爾斯克區。』伍長亨和赫·藍杜接到他的格羅爾寫來的一封信，他的這位格羅爾已經在基輔區了。她這樣寫道：『我正像一個貴婦人似的，住在一處土地很多的莊園上……』我們要肅清塞夫附近的地帶，我們同樣的也要肅清基輔區。

世界的心正溢滿了憎恨。這是一片被蹂躪的充滿了災難的大地！

德國法西斯在他們自己的腳下面踐踏着半個歐洲。在這些千天的日子裏面，他們泰然自若的吃着其他民族的糧食。在這些千天和成千夜裏，他們殺死許多人，吊死許多人和磨死許多人。現在他們偷偷的向四周看了一眼，他們被死人的陰影所震駭着。他們被絞刑架所震駭着。他們並不是因爲冬天的來臨而顫慄的，他們是因爲那行將來臨的復仇而顫慄着。捷克人會想起里地奇城，他們會這樣說：『把他們從地面向上肅清掉吧。』土倫的人們會說：『把他們送到海底下去吧。』烏克蘭的人們只說一個字：『基輔』。紅軍帶着耐不住的心情凝視着遠方。紅軍咬緊牙齒，準備向德國的進攻者猛撲過去，他們爲那許多淪陷了的城市，爲那些浪費了的歲月，爲血，爲懷鄉病，爲每一聲嘆息付出一切的代價。

在戰爭之前，我們就有許多最通俗的字，它們的聲音是響亮而親切的。在勝利之後，我們還會有更多的這類的字，因爲生活是更加豐富和更加多樣化了。我們用字是很謹慎的，我們有一個字是最值得珍愛和誇獎的。這是一個簡單的字：

『前進！』

(註一) 馬拉松賽跑出自希臘與波斯之馬拉松戰役，當時有一個名叫菲地波特的希臘人，帶着馬拉松一役的標旗奔赴雅典，及至走進雅典城後即倒斃在市場上。現在名詞又作長距離賽跑語，此處則有「菲勞德」與「馬速」之意。

(註二) 大丹係「維里基——威奇」一名之意譯，此處含有變調之意。

(註三) 指意大利，因意大利像一隻發伸在地中海裏面的腳子。

(葆荃譯)

要繼續反攻下去

每天夜晚，當『最後新聞廣播』的節目從無線電裏面傳出來的時候，就好像我們能辨別出那邊方的脚步聲。這是紅軍在行進着，這是歷史的行進。

一個月之前，希特勒曾經這樣宣佈過：『斯大林格勒即將克復。』德國的士兵們都因為這位瘋狂的元首的謙遜態度而表示驚訝了，他既不允諾他們和平，而只允諾了斯大林格勒。現在他們在想着什麼呢？據柏林的消息：『德國統帥部現正保持完全鎮定的態度。』我們是很容易了解弗里茨們(註)的窘迫的，他們會這樣想着：爲什麼元首突然變得『溫和』起來了呢？

我們知道，我們決不會放棄斯大林格勒的。我們也不會把她投降給敵人。羅齊姆來夫少將的一師人正活着和看見了至高無上的快樂：就是和敵人算賬的時候已經開始了。斯大林格勒堅持下去了，並且正取回他們所付的代價。但在不久之前，那個接着景慕同時又用困惑的心情的全世界還問着：這種

勇敢的犧牲最後還不是無意義嗎？但是斯大林格勒這個城市的保衛者們的頑強，正是他們勝利的第一個基石。

爲什麼德國軍隊現在正被驅出頓河盆地和克爾米克草原呢？爲什麼我們正在前進着的軍隊會收復了一百五十公里的土地呢？這是因爲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拚命在保衛着每一寸的土地。

德國軍隊說過，他們是把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們包圍起來了。這個城市的英雄們當情勢看起來似乎是無望的時候，他們還是要堅持下去。他們是爲了勝利而堅持下去，現在是誰被包圍着呢？去年秋天，德國軍隊從望遠鏡裏面看見了莫斯科。但後來他們丟棄了他們的望遠鏡和坦克車逃掉了。今年他們是用不着望遠鏡；他們可以親眼看見斯大林格勒的工廠的廢墟。德國軍隊『差不多佔領了』斯大林格勒，但是他們沒有並且也不能完成這『差不多』，因爲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山人的胸膛所拼成的牆壁，是一座活的牆壁，並且這所牆壁是從不動搖的。

我們知道，德國人深深地侵入了我們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堅持得住這樣的試鍊的。但是蘇聯是支持下去了。德國人快迎接勝利了，看起來這個勝利好像是臨近的，但事實上還是遙遠的；橫隔在德國軍隊和勝利之間的，是俄羅斯人民的勇敢。德國人要比去年冬天還要付出更重大的代價。遠方的脚步聲響的意思就是說：反攻正在繼續進行着。

去年，希特勒在打近莫斯科的時候這樣叫道：『紅軍已被毀滅。』今年，這個固執的精神病患者又發狂地叫道：『蘇軍的實力已被粉碎。』但他在十一月裏才覺醒過來了。誰也不能懷疑：就是在柏林和卡拉契之間是有着不小的距離。德國的軍隊是化了很長時間才到達當地的。但是這些人現在到了

什麼地方去了呢？有些是被送到俘虜營去，有些則進了墳墓。德國的無線電廣播企圖安靜下弗里茨們的心：『蘇軍僅楔入一個很小的地區；是部份的滲入。』但是這種企圖是無用的。德國人也想誇耀他們所奪獲的勝利品。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德國國會公報』中這樣講起德國軍隊的勝利品：『在斯大林格勒之南，我軍俘獲駱駝四十四。』弗里茨們現在可以作一比較了：我們俘虜了成千萬名的法西斯蒂，而法西斯蒂俘獲了我們四十四駱駝。

蘇聯軍隊的反攻，使得德國軍隊喪胆了。他們說到『冬天是來臨了。』某一個弗里茨寫道：『當嚴寒一來臨的時候，俄國人就要出擊了。』這個弗里茨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嚴寒還沒有來得及打擊他們的時候，而蘇軍已經開始打擊他們了。

今天的柏林廣播說道：『今年德國軍隊已習慣於在俄國冬季作戰，並且早已準備好了。當冬天過去的時候，百鳥又會齊鳴，青草又會蓋滿田野，那時候德國人就會猛烈地再度進攻。』但是柏林的燕子今年開始叫得太早了，現還只是十一月的末梢呢。沒有誰會懷疑，就是草在春天會長得又長又青，但這是長在德國兵士墳墓上的草地。

紅軍是光榮的，全國正在為他們計算着戰勝品。但是兵士們沒有功夫來做這件事情；他們正在向前推進。

（註）原為「德國的兵士們」，因為很多的德國人都用弗里茨這個名字。

（葆荃譯）

我們的春天

全世界關於春天的談論還從未像今年這樣的熱鬧過。春天像一個初入社會的女伶那麼忸怩不安，它怯生生的在台上出現。這些天還有薄霜好像突然會喚起你對於俄羅斯正月的回憶似的，這些天薄薄的雪氈還會在大地上鋪蓋幾小時。但是，無論如何春天是終於來了。是的，春天已經來了，但是春天不是希特勒的。爲什麼野戰元帥倫斯德特將軍甘心捨棄了烏克蘭草原而匆匆跑到颶着風的諾曼第海灘上去了？爲什麼希特勒的『征服巴爾幹的得意部屬』李斯特將軍會放棄充滿陽光的克里米亞而到冷冰冰的挪威去了呢？也許德國的將軍們都像候鳥一樣要在春天遷居的吧……春天帶來暴風雨。這裏是四月的最後幾天的一個簡略的鳥瞰：在挪威德倫的英，德軍一個少校被殺死了。在希臘，飛機炸彈庫爆炸了。在法國，有兩列德軍用車出軌了。反對希特勒的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共產黨員和牧師。在摩拉維亞，德軍槍斃了一個叫瑪麗亞布洛克斯的老農婦，就因爲她縱火焚燒了三處德國堆棧。在巴黎，有兩個孩子在塞巴斯托波爾大馬路上被捕了——她們打了侮辱她們的一個德軍官的耳光。在警察審問時，爲這條街名所激動了的，以及認爲這條街名和她們是這樣休戚相關的這兩個女孩子公然宣謔：『我們要像塞巴斯托波爾的英雄們那樣堅強。』在列日，德軍逮捕了牧師卡特拉斯，因爲他拒絕給波倫軍團的士兵——比利時人民的賣國者——做安靈彌撒。克洛格，歐洲最偉大藝術家之一，在奧斯陸被

捕了。歐洲絕不願死，我們知道美國在生產多少的坦克和飛機。我們知道有什麼軍隊已經集中在擁擠的英倫三島上了。對歐洲來說，一九四三年的勝利將意味着這勝利要在悲慘的耗費中去獲取。可是一九四二年的勝利却將意味着生命的勝利，意味着整個世代的獲救，就是說這樣可以希望還有城市和葡萄園給我們留下來。風從大西洋的西岸吹着。倫斯德特難於堵住所有的漏洞。李斯特也不能阻止洶湧而來的整個洪流。隨着春天的到來，歐洲邁步前進的意志正在變得更加堅強。但這將決不是希特勒的前進。德國西部的轟炸，人們必須把它認做只是一種準備。而且他們還是一些優良的準備。希特勒爲了春天已經準備了不少數目的坦克，飛機和大砲。但是戰爭是要用人來進行的，人會想到他們是要犧牲生命的，而且戰爭全靠人，也只有靠他們才能够帶來勝利。但希特勒的徒子徒孫無非是一些機器的奴隸而已。並不是德國人在駕御坦克，而是坦克在駕御德國人。希特勒可能好好兒想企圖進攻——對於春天他已經說得太多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春季攻勢就會變成春季防禦的。春天在這兒，而且春天將是我們的。全世界用着希望的目光注視着紅軍。在冬天，我們並不是在睡覺的，每一天我們的紅軍都打擊了成千的希特勒匪徒。我們的婦女們從沒有離開機器，她們將對於她們丈夫，兄弟和情人的一切全部愛情都放到工作中去了。五一是一我們神聖的節日，這是勞動兄弟友愛和春天的節日，我們中間，誰能不同憶到每逢節日便裝飾得燦爛輝煌的馬路上，在各個城市裏，在旗幟、陽光的嘹亮的歌聲中的快樂人民的和平羣衆呢？在那一天，我們慶祝着勞動的光榮。德國侵略者踐踏我們成百的城鎮變成荒野。我們年青的果園已經被侵略者糟蹋殆盡了。我們華美的學校，新的城鎮，俱樂部，博物館，工廠，幼稚園都已被摧毀。曾經貫注着多少勞動的成果，都已遭受破壞。人民的憤怒是可怕的，

在「五一」節，那勞動的節日，我們對希特勒的憎恨是比過去更加大了。「五一」是各民族人民兄弟友愛的日子。我們懷念着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民的命運。我們懷念着歐洲各民族的命運。「不是友愛團結便是毀滅死亡」，這是法蘭西大革命愛國志士的戰號。我們要求兄弟般友愛團結，但是希特勒使數百萬的婦女變成寡婦，使數百萬兒童變成孤兒。我們的回答是：消滅法西斯主義者！五月一日，春天的日子。不久，櫻桃花就要在烏克蘭開放了，白俄羅斯的森林也就會變成綠的，諾伏哥洛特的古代的城牆將再一次為陽光所溫暖。前進吧，朋友們！這將是一個暴風雨的春天，艱苦的春天。但是這春天將一定是我們的。

（孫蔚祥譯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紅星報」）

歐洲的遭遇

最近我訪問了從德國人手裏解放出來的格日斯克一帶。當你的脚一踏上被德國人所統治了十七個月的地方，在你眼前堆滿了大災難的情景，拿「破壞」這個字來形容顯然是無力了。

格日斯克一帶曾經是富饒而快樂的。這是它，從它那強壯的瑞士種的乳牛，供給了莫斯科牛乳。京城裏熟練的男女裁縫是從那地方來的。在我們的國度裏，古舊特別的和現代結合起來。在卡桑的聖母院教堂旁邊，和那些小木屋旁邊，在格日斯克可以看到滿溢了亮光的大建築物：學校，俱樂部，醫

院。格日斯克具有泥濘的小路，而他的青年們夢想飛到同溫層裏去。

今天，那從前是城市的地方，只剩了大堆空架着的鐵片，燒成了灰的磚瓦，和小石堆。格日斯克在地圖上有他的位置，在我們心裏也同樣有它的位置。但是它不再存在了。我們這世紀的藝術與科學的破壞者，用了一個最現代化的技術毀壞了這個城市。他們用炸藥炸掉了托兒所和教堂。他們衝進住宅，把煤油澆滿牆壁，快樂地看『彭加爾的火』：他們在格日斯克放了火。

這個區域的半數村莊被燒毀了；只有那幾個村莊因為紅軍迅速推進，德國人倉促遁逃而還算完整無恙。很少人能免於難。六千蘇聯人從格日斯克被載到德國。好像一個黑暗的古代的景象，在我們眼睛裏忽然出現了人類歷史的最初時期。母親們徒然想法把她們的孩子在德國的人販子面前掩藏。她們把男孩子隱匿在雪裏，他們凍死了。她們把女孩子藏在乾草堆裏，但是德國人用刺刀來搜索草堆。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被槍托驅着穿過城中街道：他們是被德國人帶去做奴役的。有時候，全家或整個村莊的人都被帶去做奴役。這地方完全變成荒涼了。飢饉、疹性瘡、白喉，還有蓋斯塔波的獄卒，也做了他們的工作。

但並不次於形體上的可怕的毀滅，當然是人類尊嚴的精神上的受到侮辱。當你穿過德國人被趕走了一個城市，特別打動你的，不單單是一堆堆殘物和屍體，你却要被人們的眼睛表情所打動，那眼睛是暗淡無光的。人們低着聲音說話，聽到一點脚步的聲音就戰慄，望到一個影子就迅速地往旁邊躲起來。

這就是三月裏我在格日斯克所看見的。二月裏，我在庫爾斯克看到同樣的情景。戰爭開始，報紙

會對我們說到法西斯主義會帶給世界的種種。今天我們是法西斯主義給侵入區域帶來了什麼樣的東西的見證人。『死亡』這個字還太能喚起生命的回憶；在這裏却是不恰當的；更確切的說：是缺乏生命，虛無。而這個老農婦憂愁地和我談到德國人的時候，她是很對的：『這比死更惡劣。』

當你轉過眼睛來向着西方，可以看到那邊可怕的畫景：在遠處，存在着一個完全和庫爾斯克一樣，格日斯克一樣的情景。最初給予一些爲我們所寶貴的名字：明斯克，或車爾尼果夫。接着，名字變更了。這些屍灰堆，那是從前法蘭西的阿那城。這些被槍斃的人是從捷克的遠撲城抓來的。布列塔尼的盡頭，轉向新大陸的海峽，曾被法蘭西人給了一個拉丁名字『菲尼斯戴爾』，意思是地面的盡頭。然而從格日斯克到布萊斯特一直到『菲尼斯戴爾』，是同樣的黑暗，同樣的破壞，同樣的虐待，死亡，野蠻的慘景。地面的盡頭標誌着歐洲一個大黑夜的界限。

我們熱愛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來歷，我們的歷史。我們爲我們斯拉夫的『愛拉特』(希臘的古稱——譯者)，俄羅斯基輔的聖索菲教堂的純潔的綫條，昂特萊胡勃里奧夫的古典的明確的繪畫筆調，諾夫哥羅德的公民自由，亞歷山大奈佛斯基和季米特依·唐斯郭依的豐功偉績而驕傲。但我們從來沒有把我們的文化和歐洲的文化分開過。我們和他之間的聯繫並不單單由電纜和鐵道，却是由於我們的血管，和我們腦子的旋動。我們是歐洲的教師同時也是應用上的學生。只有愚蠢的人才會把俄羅斯看待做二百年被文化領域中許納的一個小孩子。古希臘的訓誡，『歐洲思想的搖籃』，不是從羅馬的征服者和法律家，乃是從比薩的哲學家和宗教生活裏的英雄帶給我們的。只須把胡勃里奧夫的繪畫筆調和文藝復興初期的畫家的壁畫法來比較一下——西瑪比哀或希奧朵——就可以證明俄羅斯古代藝術是

怎樣地接近古希臘的思想，他的明確和他的快樂。在十九世紀，俄羅斯以他那種追求理想的思想和他的筆驚動了全世界，這並不是一個新生，乃是一個成熟。誰能夠說使年輕的普式庚最感動的，是拜倫的詩還是他乳母阿依娜的故事呢？過去的世紀，俄羅斯最進步的思想家，勇敢的愛國者，他們參與了歐洲的災難，它的希望、它的痛苦；他們給歐洲思想帶來了俄羅斯人的熱情的性格，它的真正，它的人性。在伯林斯基的『狂暴者』中，在退希尼希佛斯基的英雄的獻身裏，在俄羅斯革命的英雄主義裏，並不單單貫徹了西方的智慧，人道主義和法蘭西革命的遺產，人們也可以感覺到真理的探求是俄羅斯文化的歷史路綫：『上帝的城市』的探求者。這就是爲什麼托爾斯泰，杜斯道也夫斯基，契訶夫，馬耶可夫斯基和莫索格斯這樣地豐富了每個受教育的歐洲人，並且更深刻更發展了歐洲的思想，這就是爲什麼列寧一直是俄羅斯國家的智慧的榜樣，而是站在人類的歐洲的思想頂點。

我們不僅僅懂得法蘭西的痛苦，因爲我們有格日斯克，哈爾科夫，明斯克，並因爲歐洲的文化是被我們無限地珍貴着的。我們永遠不忘記十月暴動者是由於『人權宣言』所引起來的，而格涅夫是法蘭西最偉大作家的朋友和鼓舞者。我們並不是一些簡單的觀眾來參與歐洲的悲劇的。

自從千把日子以來，德國人踐踏着被佔領的土地。我說：千把日子！大陸變化了，在不久之前，他還是充滿着嘻笑顏開的，真是可怖！死亡是單調的。只要看見過沃羅涅茲，威茲馬，依斯特拉，就可以想像歐洲的一大批城市是變成怎樣的了。德國人或他們的造物者，是沒有能力把他們毀壞了的重新建築起來的，所有他們的力量用以向着別種別樣的破壞。如同西班牙葛尼加城，到現在依然是一堆屍灰堆；阿爾巴尼亞充滿了瓦礫。五年的時間，佛朗哥將軍不知道重建巴塞隆納或馬德里、西班牙人

不可能照顧他們的家庭，他們必得成爲德意志的總管家，爲着柏林而死在列寧格勒之前。法蘭西的北部，使人回想起曠野的石頭，在那裏，一個城市的道路，是另一個城市道路的繼續，今天只剩了一堆石頭的荒野。靠近大西洋的城市是破壞了，燒毀了。

可是人民，突然間變成了怎樣了呢？被德國人燒了房子，帶走了她四個小孩的格日斯克的一個婦人對我說：『失掉一個房子還可以修補，但沒有我的孩子是不能生活的……』德國人並不限於毀滅歐洲這些古代的石頭，他們踐踏她的軀體，她的青春，她的孩子。人們最簡單的權利：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也被剝奪了。在法蘭西祕密發行的報紙『北方呼聲』中，讀到基輔大學的教授和哈爾科夫與明斯克的大學生在里爾和伐朗西亞做着苦工。法蘭西的工程師和工人被德國人從巴黎抓去在若北洛基哀的軍火工廠裏做着疲憊的工作。希特勒將人口像奴隸樣輸運。他把波蘭人送到芬蘭的森林中去採伐森林，把斯洛伐克人送到波蘭去做土工。亞爾薩斯人在烏克蘭築路，比利時的花邊技術工人在立陶宛挖土。捕人的網在法蘭西城市的路上組織起來：德國人把所有能够工作的人都抓了去，把這些人運送到東方。每天有一萬囚徒離開法蘭西。像一個迴聲一樣，格日斯克母親們的哭聲響徹在里昂，但這並不是一個迴聲，這是里昂母親們真的哭聲呵！

『我們的時代只能比之中世紀鼠疫傳染的年代』，『日內瓦報』說。亨利第四曾經歡喜說：『我願望我王國裏的農民每個星期天能够有一隻雞放到鍋裏。』格日斯克一帶，在德國人佔領之前有三萬五千隻雞，現在只剩了一百十隻。最近我讀到德國的一個經濟雜誌上有篇關於說明歐洲雞蛋消失的文章。有一位『博士先生』把這個雞蛋問題放在世界貿易市場上，憂愁地下着結論說：『對於丹麥、

法蘭西，被保護國，應當重新找到出口貨。」「出口貨」是全都找到了的：就是奴役的人民！但是當我求解釋歐洲雞蛋的消失時，應該記住這位德國「學者」巧妙地避免了指出最重要原因之一：兵士，雞的貪吃者。

歐洲人現在吃些什麼呢？法蘭西人已經把所有草料蘿蔔統統吃光了，烏鴉，甚至麻雀也都吃盡了，在南方，他們吃着野草，把它叫做：「賴伐爾生菜」。在北方，吃橡子和搗碎的樹皮。在希臘，那些餓慌了的人啃着荆棘。雅典的路上飄蕩着影子，那是學者與工人，藝術家和工匠，因為他們連拿一把小鏟的力氣都沒有，沒有使他們工作。他們求乞着，德國人用腳踢走他們，好像野狗一樣。至於狗，那是不再存在的了，早就統統被吃掉了。

被人販子所留在他們自己國度裏的可怕的疾病，成羣的蔓延着。德國人好像帶鼠疫的耗子，帶來了傳染病。在荷蘭，出產「馮·胡當」巧克力，從前是吃得飽飽的，紅潤的充滿了健康的面頰的國度裏，肺病的生長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步。單單在海牙，統計的數字是，在一九四二年初起的九個月裏就有一七〇〇個急性肺病。照被檢查過的「七天」報的論據：在法蘭西計有一百萬急性肺病人。花柳病的數目增加了十二倍，皮膚病增加了三十倍。沒有肥皂，沒有藥品，沒有麵包。希臘三分之一的居民死於飢餓和傳染病。白喉症從波蘭到捷克走了一圈。沒有疫苗，小孩的死亡率佔到百分之六十。

被德國人從自己國度裏連根拔走的歐洲人的生活更爲悲慘。已有五十萬法蘭西俘虜死在德意志，還有二百萬正等待着死亡。「我們生活在可怕的小屋子裏，糞和虱子之中。他們給我們吃壞洋芋做成的餅，用棍子痛毆我們的背。」一個從德國逃出來的法蘭西人敘述着（一九四三年三月文件）。德國

的報紙『但澤報導』最近記載兩個塞爾維亞人爲了『野蠻的行爲』被關進牢獄，因爲他們吃了但澤市一個居民的貓。

歐洲到處充塞着沒有住處的小孩。德國的『民族新聞』報的通訊員在他的文章裏說到他在法蘭西，碰着『一羣竟到了野蠻地步的小孩，人一走近他們，就發出叫喊逃走了。』在巴黎的沙爾彼脫依哀爾孤老病院裏，收留着二百八十六個九歲到十四歲的患花柳病的女孩。有兩個八歲到十一歲的男孩，被控告爲幾次殺人案的主使者，在馬塞被逮捕了。在塞爾維亞，被拋棄的小孩二十、三十成羣的流浪着。在希臘，從流浪的小孩中找到有些是吃過人肉的。

還需要說文化墮落到了那樣野蠻的地步麼？普通學校和大學或是關閉了，或是被改成迷感無知的希特勒匪徒的養成所。『馬塞人』報描寫一個法蘭西學院的『教授』所作的一篇演講：他長長地說明『一個不端正的額和橢圓形的綫條，證明種族的不純粹』。正是在從前數學家班樂衛，化學家彼項，物理學家朗之萬上過課的教室裏講的。『士魯士快報』担心地指出：『受年終考試的年輕人中揭出一個從所未聞的無知』，捷克圖書館的存書，自從希特勒匪徒『清洗』之後，只剩了百分之七十。正當被德國佔領時，我設法弄到了法蘭西出版的幾本書。我不去講那裏面所包含的思想：就是那些把哲學看待做『新歐洲』裏的禽獸義務誇張的書。我只說一件事，那便是：這些書是未開化的人寫的。從前每個法蘭西小學生都會表達自己的思想，今天在法蘭西，連『作家們』都不會表達他們的思想了。千把日子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在千把日子裏，人們可以學到很多的事物，同樣也可以忘記很多。

人質的制度，死刑和刑罰的場面，使懦弱者的靈魂變態了。孩子們看到了刑具。青年人都懂得：

『假使你交出你的父親，你就能得到一盒罐頭食物和一瓶酒。假使你隱藏你的父親，我們把你帶到蓋斯塔波裏，在那裏你會懂得針刺到指甲裏的滋味。』恐怖使人類變態了，有的變卑劣了，有的變得病態的殘酷。品行的正常性消失了，整個生活的基礎變動了。歐洲是向着傳染病、分解、無政府敞開的。

歐洲不願死亡，血流如注的法蘭西和南斯拉夫的游擊隊戰鬥着，那沒有被感染的腦子還很多。歐洲光榮的過去和多少世紀的遺產抵禦這褐色鼠疫，歐洲是會得救的，但時間緊急了。如果以為這些已經忍受了千把日子的人民還能忍受千把日子那是想的太天真了。那生命與文化的捍衛者們，在所有和法西斯匪徒作着殊死戰的人民面前，在這個春天，威魯的字像火焰一樣：這是時候了！

沒有一個人懷疑反希特勒同盟的最後勝利，斯大林格勒是馳光榮的開始。紅軍和在他後面的國家證明了堅決和思想的力量。我們知道協同了我們的同盟國，我們會給希特勒機構以最後的打擊。但是必須把『林中的睡美人』在她沒有變成『死美人』之前解放出來：我講的是被法西斯主義俘虜的歐洲。單單戰勝是不夠的，還要保存力量使活的人，使葡萄那萊州的種葡萄的農民能重新種他們的葡萄，挪威的漁民重新投下他們的魚籠，歐洲的泥水匠重新建造他們的城市，學者們把那失滅的知識的火焰傳授給新的一代。悲慘的是當勝利到來的時候，法蘭西已不再有醫生，不再有藝術家，不再有種葡萄的農民，不再有電學家了！

我在斯摩稜斯克，奧勒爾，庫爾斯克看到完整未毀的村莊，那是德國人來不及燒掉的，紅軍在破壞中救出了很多的寶藏，他們從死亡裏救出了成百萬肉體和精神。反希特勒的同盟軍能救出歐洲，他

的居民，他的文化，他的思想。所有法西斯主義的敵人有一件共同珍貴着的東西，牛津大學和列寧格勒的學者認識巴黎大學和巴斯德學院。在倫敦，大家歡喜加彼克的戲劇，但是加彼克要是沒有了活生生的布拉格，加彼克也就算不得什麼了。沒有了活生生的自由的法蘭西，美國人再也看不到馬蒂斯或馬爾葛的畫了。不管那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對於歐洲權力的前途是有怎樣的想，這個前途只能建築在文化，生活和人類的尊嚴之上的。石頭可以用來建造多樣的房屋；然而不會在荒野中遇到石頭，荒野中只有砂，砂是不能建築起什麼來的。

春天從未有這麼地使老歐洲萎縮的。一九四三年在歐洲昇起的春天，他不單單標誌一個新季候，一個世界生活的新事物的經過，却是復活的黎明，神聖，堅決的戰鬥的召喚。

（陳學昭譯自一九四三年第六期『國際文學』法文版）

法蘭西人民的血

此文為悼念法國被槍決的一百十六名人質及紀念瓦爾米之役而作。

據九月二十日塔斯社電：『德國駐法佔領軍總指揮部已下令將一百十六名人質處死，實因探悉法國人民於九月二十日，即瓦爾米戰役二百五十週年紀念之日，有舉行羣衆愛國示威遊行之可能。』

一七九二年的九月二十日，這是法國歷史上的一個光榮的日子，這一天在法國東北部的瓦爾米地方，新誕生的法蘭西共

和國擊敗了德國人的進攻，而「瓦爾米」這個名字，就成了勝利的象徵。當譯愛倫堡的這篇文章時，我就想起羅曼羅蘭在「瓦爾米」那個短篇，結尾時所寫的話：「革命的子孫們，你們在今天還能毫無恐慌和心驚地觀看瓦爾米地方大砲的高傲的回聲嗎？」從愛倫堡的這篇文章裏面，我們知道法國的人民——法國大革命的子孫們，已響應這個回聲而在武裝起來了。

——譯者

我記得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可怕的冬天，那時候法國的生活是毫無牽掛地在流動着，那時候無線電的廣播員與高彩烈地在報告着：『前綫戰況毫無變化，』而許多天真的戰略家則這樣互相在慰藉自己：『我們有馬奇諾防綫，我們有殖民地。』當一個德國的駕駛員隨着被擊落下來的飛機而跌死的時候，法國的將軍們還用各種儀式來爲他禮葬。

生活下去，以一切代價生活下去，但決不作任何冒險或是任何犧牲——這就是在大災難來臨前夜的法國人的智慧。當遙遠的砲聲傳到巴黎來的時候，法國的統治者爲過去所發生過的事情嚇得驚慌了，他們這樣重覆地說道：

『必須拯救巴黎！』

『必須拯救法國！』

『必須拯救人民！』

他們不再繼續迎戰了，他們在康邊簽訂了一個卑賤的停戰協定，因爲他們要『拯救法國』。澆了呆和還沒有完全知道這個悲劇的限度的法國人民，是靜默無言了。他們是被解除了武裝，軍火都按照一張仔細製定出來的表格，移交給德國人了。

法國的人民體驗到一種空前未有的苦難。巴黎變成了德國軍隊的總司令部，德國人的『沙龍』（註一），德國人的妓院，德國人的軍火庫。在巴黎，法國人在爲德國人製造坦克車，但他們心裏卻在詛咒着這些坦克誕生的日子。英國皇家空軍在轟炸巴黎，哈沃，盧昂，第厄普和布勒斯特。難道在歡迎着轟炸機來臨的蘭諾和哈姆工廠的工人們，不會成爲這次異乎尋常的悲劇中的英勇人物嗎？

『公民們，武裝起來！』馬賽曲裏面的這段複唱句，已由法國人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現在他們已經知道：把武器交給敵人這是什麼意義。她把熾熱着的眼睛轉向海岸在期望援助她。他們並不是在等着有人會把自由送到他們手裏來，他們是要武裝起來爲了自由而去鬪爭。但是對岸的船隻還是沒有來臨，而法國現在就是這樣去進攻敵人的，她沒有武裝，但她的心是堅決的。這也就是那永恆不朽的法蘭西，那個自由的母親！

在反對德國人及第三帝國行政長官的鬪爭中，法國是最後終於團結起來了。兩年來，這些象徵了——第三共和國的人們被迫無言。但是現在，法國已使得像赫里歐（註二）等許多人也講出這樣勇敢的話來：

『決不能讓自由死在她所誕生的國家裏面。』

貝當和賴伐爾，正按着希特勒的命令在進行絕滅猶太人的工作。在這個發表過『人權宣言』的國度裏面，每天所扮演的都是些使人心痛的情景。賴伐爾負責供給德國以法國的工人。德國人正缺乏勞動力，因此賴伐爾就成了一個招募工人的代理人。他和法國工人們的冗長而固執的談判都證明是無用了。有一個老年的法國旋盤工人在聖愛丹尼方場上叫着：

「我寧可看見我的手臂殘廢掉，我却不去爲德國的主子們工作！」

法國現在正像春天的河流在泛濫着：爾勒地方軍火工廠中的機器被擊毀了，手榴彈在波爾多的一羣德國人中間爆炸了，格蘭諾布爾的熔鐵爐被毀壞了，謝爾堡地方的工人爆發了罷工，摩朗地方的無線電站被破壞了，阿爾任梯爾的德國商店被放火燒掉，德國的火車在勒下都地方出軌衝進河堤；布爾日地方的彈藥庫爆炸得高衝雲霄。法國現在正像一個遭了嚴重打擊之後回復過來的兵士一樣，重又加入了戰鬪。什麼東西使得法國能參加各戰鬪國的行列？

「這是俄國的抗戰。」

法國人不再浪費他們的時間再等待有利的時機了，他們不是有過四次大革命的經驗嗎（註三）？現在要使他們再等待下去那是再也不可能了。他們不願德國人還在堅守着英倫海峽的海岸，他們不願加萊和多佛是被海所隔離着，他們不願亨利先生還是貝當政府駐華盛頓的大使。法國在期待着勝利的來臨是期待得太久了。這種虛偽的智慧帶給他們的，是奴役，是毀滅，是磨難，是孩子們的飢餓與死亡，是人質的槍決。今天法國人這樣說道：

「等待着，這就是死亡！不管有沒有船隻從對岸開來，不管有沒有同盟國，法國是不能再等待下去；最後的時間是已經來臨了。」

九月二十日，是瓦爾米附近之役的一百五十年紀念。這次打勝仗的法國革命，是年青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是法國人民戰勝德國人的一次勝利。這是法國自由的勝利。法國人民決定在今年要紀念這個勝利的紀念日。「瓦爾米」這個字，提高了人民的精神，號召人民去作戰。德國佔領軍駐法的司令官

兼創子手馮·斯士蘭普拉格爾，却槍斃了一百十六個法國的人質來紀念瓦爾米。這位德國的將軍希寧用法國愛國者的血來撲滅這場烈火，但是殉道者的血只有更加煽起了這場烈火：因為血並不是水。

歷史又開始了第二個瓦爾米。法蘭西共和國正前進反對德國人和叛徒們。她帶着戰鬥的呼聲在前進着：『勝利或者就是死亡！』『我們要把在我們土地上的法蘭西的創子手消滅掉！』

我們現在穿過該詛咒的德國的上空，向法國的人民伸出我們的手來。

斯大林格勒保衛者們的手臂，正向着二百十六個人的墳墓致敬。

法國的朋友們！在戰鬥的砲火與烟霧之中，我們在向你們高叫：

『更加勇敢些！』

他們是決不能把法蘭西毀滅掉！

他們是決不能把自由毀滅掉！』

(戈寶權譯，原載一九四二年九月『真理報』。)

(註一) 意譯為客廳。

(註二) 聯軍政府前法警總監議長，當上次大戰時，曾得法國戰時總理克萊孟梭所獎之勳章，最近赫氏特將此勳章收回。雅希政府，因最近又有兩枚此項勳章，係頒給德軍押下在蘇聯作戰之法國軍官兩人。故赫氏特：『余不允法國人之良知，對於此種事件絕難容忍，而吾等之後輩子孫，對此事亦應嚴辭批評。』

(註三) 法國共經過四次大革命，年代為：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八、一八七一。

巴黎

讀者按：這篇文章是發倫堡爲了紀念巴黎淪陷一週年而寫的，我們從這篇文字裏可以看到：那些打壓壓的鬍鬚淫泆的法國西的審判們，叛賣了他們的祖國後，使法國西遭受怎樣的後果，希特勒匪徒怎樣摧毀巴黎，摧毀巴黎人。但是法國西人民始終沒有屈服，事實已成爲愛倫堡「明天」預言的證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已經有兩年了。在巴黎，當我走出我的寓所，看見了德國兵。他們不看他們的四周，前進着，迅速的咀嚼着什麼東西。一個法國女人在我旁邊。當那些德國人走近她時，她將手遮住她小孩的眼睛。這個可悲的徒然的舉動象徵着整個法蘭西：不去看那已經到來了的事，遮住孩子們的眼睛，使得他們將來大了的時候，不至於咒詛他們父親的一代。

在這不幸的日子以前很久，叛賣像一條毒蟲，腐蝕着法蘭西的心。這並不是卑劣的間諜的叛賣，是那些打瞌睡的，驕奢淫佚的，無憂無愁，靠利息收入的，和那些沉溺在他自己的安靜舒服中的人所叛賣的。當然，德國的間諜，在法蘭西不會少，但却是法蘭西自己叛賣，自己放棄了的。

戰前不久，一個法國作家A·貝克萊發表的小說中的人物之一，喊：『我們不願戰爭！要是野蠻人來，我們屈服好了。我們想法養養他們，教育德國人。這比戰爭來得好……。』這些天真的法蘭西

老年人，釣魚和讀回憶錄的欣賞家，相信他們能够把希特勒匪徒養善，並教育法西斯。這是一個難得的滑稽，但這却是政府的政治，一個大而光榮國度的精神。

所有這些軍官，這些泛爾范貝爾（註一）、這些昂斯（註一）、這些法昂斯（註一）在巴黎的路上走着：他們走在被法蘭西人民唱過『*Chantanoie*』的路上；暴動者曾在六月的日子爲了正義在這些路上戰鬥過的；這曾經飲過了特萊格洛斯和董勃洛夫斯基的血的巴黎老石階。這些愚昧的傀儡，穿過城市，他們曾是四次革命的見證人；他們走着，隨聲高唱着醜惡的歌曲，歌唱德國偵探的偉大和人類的虛榮。

他們像飢餓的耗子樣穿過巴黎。在十五天之內，他們把所有的堆棧店舖都吃光了，我却還聽到那德國兵式的飽食的咀嚼聲：『這是「第三德意志」的勝利歌聲。』一個炎熱的日子，在一條小路上我看到一個棕髮的德國軍官吃着從一個小木桶裏取出來的、不融在麵包上的牛油，他急急忙忙的吃着，生怕別個食客跟上來；他吃着被太陽溶化了的牛油。一個在太陽下流着汗的軍官……。

一個食店裏的女主人，哭紅眼睛，從她的店舖裏出來，把巧克力糖放進一個卑劣的狡猾的德國人手中。而她却聲明着說：『應該討好他們……』當然，她沒有讀過小說，但是卑劣者的眼中，她也主張『養善』。正在這時，在波爾多，卑賤的賴伐爾已經預備獻給希特勒，不是一塊巧克力，却是三分之二的法蘭西。

『沒有人會企圖經過殺戮抵抗德國人的侵略』，誰發了這個命令的？一個德國警察麼？不，是一個法國將軍。他叫唐茲。他有兩次光榮：在巴黎門前，他不願流德國人的血；一年之後，在敘利亞，

他流了法國人的血。

在巴黎，食物店女主人和門房們慣常圍割他們的雄貓，爲得不讓牠們在屋頂上跑來跑去找對象。肥胖的，厚脊的貓在屋子裏打瞌睡。德國人來了後，城市變得荒涼了，耗子從空虛的堆棧與地層屋中出來，它們在僅有很少居民的屋子裏角逐着。這些被圍割了的貓在耗子之前逃避；於是食物店的女主人開始夢想那些屋簷上的雄貓。這是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故事。當想到那個投降條約，波爾多政府，和很多法國將軍時，他們可以痛苦地觀察到在和平的往時他們打着瞌睡，但一見了希特勒匪徒，就逃避了。

這些可怕的日子中，巴黎往那裏去了？爲了躲避希特勒，它在路上拖着。希特勒的空軍在高坡上用開花砲轟擊着，死屍的氣息代替了藤蘿和玫瑰花的香味，揚溢到巴黎城郊的居民區、南德乃勒魯的森林裏，馬爾納與洛阿爾河邊。巴黎再不能抵禦，但它不願意忍受，它只好走了。它遮住了眼睛好像那個法國女人給她的小孩所做的。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巴黎的街道是完全空虛的。房屋都關閉了。只有德國人的皮鞋聲在死了的城市裏響着。兩年過去了。德國人佔領了巴黎。他們用德文做課本。他們把所有的貴重物品搶走了，帶來了劊子手，伶人和新聞記者，他們毀掉了服爾德的雕像。他們在博物館和宮殿上置了卍字旗。從這個會被海涅，倍林斯基，迭更斯，屠格涅夫，赫爾琴，赫爾維格，安徒生，斯託林堡，瑪克吐溫，海明威，卡昂齊納，瑪耶可夫斯基用了許多篇幅來讚美的歐洲的古都，德國的佔領者把它做了一個普通的軍營，給希特勒軍官使用的一個咖啡館，一個德意志的兵站基地。德國偵探在錢塔頂上照像；

德國將軍們一個接連一個的站在凱旋門下的『無名英雄之墓』上，這裏有現在沉默着的，從前普魯士人受恥辱的見證人。

大城市的靈魂早已離開了。相反的，臭蟲和小爬蟲從空隙裏出來了：這庸俗無恥的多利歐變成一個『法官』，鬍子頓伐爾雷取了獨裁，新聞記者瑪賽爾·代亞，有了比任何娼妓一夜的代價更便宜的『一個報紙』，却叫做：『法蘭西意識』。但是，因為沒有作家，格阿賽出版者這拐子，變成了巴黎人『嗜好』的維克多·雨果。

巴黎的市徽是一隻船，巴黎航行了。德國人把船上的帆拿掉了，捆起了槳。但巴黎是一隻大船，沒有人能停住它。從前巴黎最大的報紙，『巴黎晚報』，現在是德國人接辦，每天發行四萬份，每個報攤都有，但沒有一個人購買。而在巴黎的祕密報紙的銷行數却是二十萬份。要是捉到了在讀『人道報』，『自由法蘭西』，『戰時義勇兵』，是要被槍斃的，但沒有一個巴黎人不讀它們。卍字像蜘蛛網一樣蓋滿了巴黎的牆，但這醜惡的記號被烈火一樣的字句：『法蘭西活着。德意志人死亡！法蘭西人前進！』所掩沒。

法蘭西沒有可以隱藏游擊隊的森林。在法蘭西只有一個濃密的森林：就是狹隘而曲折的巴黎小路。它們曾經看見『馬賽曲』的產生，它們曾經是勇武的六月和八次人民陣綫浪潮的見證人。現在他們又看見了人民復仇者的勇敢。是在那裏，夜間，愛國者擊斃他們的侵略者和法奸。是在那裏，湧起不可避免的第九次浪潮。婦女和青年呼叫着：『武器！』巴黎的道路也呼叫着：『武器！』結賬的時刻是近了。

芬蘭報『阿脫依柏』的通訊記者最近說到巴黎人對於英機空襲的態度：『我們在路上和在地道車裏過了討厭的一夜，大家都想睡覺。但是到早上六點鐘，英國的偵察機被戰鬥機伴著出現了，它們到處受洋台上和窗口的人拍手歡迎着：這是忘記了他們自己生命也受到了威脅的盲目而憎恨的法蘭西人的拍手。』

不，巴黎人不是盲目的。當他們放德國耗子進巴黎的時候是盲目的。他們準備以死來驅逐他們憎恨的侵略者。今天，他們只能歡迎帶來死亡的英國飛機。明天當第一批運輸艦衝破大西洋綠色的波浪和海霧，盟國的第一支軍隊踏上法蘭西土地的時候，他們將射擊敵人。

巴黎的童子手斯蒂爾撥奈表示担心。還沒有時間來掩埋五月裏所槍斃的人，但又有了新的人質。亨特依赫的殞屍影子時常驚擾斯蒂爾撥奈格將軍。一個月以前，亨特依赫還在巴黎痛飲香檳酒，今天，他已在地下腐爛了。

賴伐爾好像在一個聖水瓶裏的惡魔那樣憂苦。這奸賊，他雖然逃脫了，却爲他的皮戰慄。他在一次訪問中說：『英國和蘇聯的勝利對歐洲將是一個不幸。』這個流氓是一個善於說話的。歐洲和他有什麼關係呢？只有一件事情令他關懷：就是他小小的利益。有一次他承認『思想是危險的，它阻礙人們安靜地生活』。『法蘭西』這一個思想阻礙賴伐爾睡覺。他還沒有拿到他的三十個特尼愛（法國古幣名——譯者）。他休想拿到。『把賴伐爾吊在路燈上！』（註二）一定的，吊死了的賴伐爾當然不會發亮，可是整個法蘭西和歐洲會因此光明一點。

法蘭西愛國者英勇地就死。埃森日報的通訊記者說到他們中間一個人的死：『這是一個工人，一

個有堅決信仰的人。在行刑之前，一個德軍官對他說：「你是我的仇人，但你是個正直的人」。那狂妄的人可是回答：「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是一個德國人，是一個劊子手」。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巴黎抬起了頭。它知道它們的劊子手有很多是在蘇聯的戰場上被殲滅了。這些糟塌了巴黎老建築物的卑劣者；在蒙馬脫的咖啡館裏尋樂，當着法蘭西人歡飲「法蘭西的死亡」的卑劣者；他們在加里寧，在摩舍斯克境界上被打死，被掩埋了。現在從美國運來的軍隊到了。在英國，無數軍隊準備作戰。第二戰場會給巴黎帶來自由。但巴黎不願人家施捨給它的自由。它對於過去的錯誤已沉重的付出了代價。它奔向戰鬪。一九四〇年將被遺忘。一九四二年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回憶裏。有的恥辱只能用血來洗刷，這正是巴黎所以要求希特勒匪徒的血。我們懂得它的苦痛。它的希望也是我們的希望。在這些對於法蘭西是痛苦的紀念日子，但是第一次法蘭西人看見一個希望的光在西邊照耀着，我們衷心 and 巴黎在一起。我們會做了好些事情幫助法蘭西解放；我們殲滅他們的劊子手已有三百五十天了。我們要一直打到最後。蘇維埃聯邦愛巴黎，並且永不忘記它。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

（陳學昭譯自國際文學法文版）

〔註一〕賈通，殺德國人的名字。

〔註二〕法蘭西大革命時，把人吊死在照亮的路燈上，後來，「吊在路燈上」就為一個現成的口號。

他們眼望着東方

從西方吹來的風柔和而又帶着點濕氣。有時他散發着海水底苦鹹的氣味。在這裏面，心靈常常會感到淚水底鹹味；這是陷在德寇魔爪下的我國底姑娘們在哭泣着。風好像給我們帶來了呻吟，叫罵，詛咒和臨終前的殘喘一樣。愁苦的春天降臨在烏克蘭的上空。在基輔底花園中，來來去去的不是我們所心愛的人，而是一些殘忍無人道的傢伙。他們搗毀了秀美的金鳳花，他們摧毀了處女的驕傲。成隊的鶴鳥向北方飛去——牠們是從遙遠的非洲向古老的諾果羅德。鶴鳥並不知道，敵人破壞了故鄉底土地。俄羅斯底大地沉浸在悲哀裏。以前長着穀物的田畝，現在長滿了蘆草。以前是繁華的城市，現在變成了荒涼的廢墟。以前發出少女們歌聲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墓地一樣的死寂。

夜晚，戰士們貪饞地凝望着：那是什麼呀，在西方？在那裏，人們不論在什麼時候期待着什麼人，從沒有像這樣地期待着他們。好像『睡美人』期待着騎士一樣。她被凶惡的魔女底魔法迷惑住了。勇敢的騎士的熱烈的親吻驚醒了夢中的美女，像這一樣的烏克蘭坦克手正在催醒故鄉烏克蘭。像這一樣的俄羅斯砲手，正在催醒奧勒爾和普斯科夫。像這一樣的白俄羅斯步兵，正在催醒頭髮花白的白俄羅斯。

再向前一些，那又是什麼呀？那是野獸底國家，強盜底國家，德國。被奴役的人沿着漫長的筆直

的街道來來往往走着，牢監的看守不斷地吆喝着：『一、二。』烏克蘭底女人哭泣着。半死的法國人接連地倒斃了。垂死的捷克女人詛咒着德國人。灌腸司務（對德國人之卑稱——譯者）計算着自己勝利底數目：『一百四十六次勝利。星期一發下了二百格爾姆酥油。在我們城市裏有二十一萬二千個犧牲者。今天是戰爭的第一千三百九十三天。馮·德萊克先生贖了八萬四千馬克。我底兒子奧托右手失了四個指頭。希特勒萬歲。』

更遠的地方又是什麼呢？痛楚，眼淚。法蘭西底少女正像波爾塔發的少女一樣地哭泣着。貝爾格萊德底主人們正像普斯科夫的主人們一樣正走向死亡的苦難。鹿特丹陷入了明斯克底命運。

我們底眼睛望着西方。他們底眼睛望着東方。從東方吹去的風是清新的，烈辣的。它帶去了晴朗的天空。它帶去了希望。多一個特等射手在卡累利亞發射時，希臘人底心裏會聽到他底槍聲。他們輕語着『打中了』，臉上現出了微笑。當俄羅斯底師團解放斯摩稜斯克底鄉鎮時，比利時底年老的女，在給紅軍向上帝祈禱。

在法國培利地方有個儒利葉納村。這是一個滿佈葡萄園的地方。那裏釀造着上好的紅酒。在酷暑的天氣它可以解渴，在冬天它可以使人發暖。它可以使青年人變得聰慧，可以使老年人變得年輕。村底周圍全是葡萄園。春天它們鮮豔地發出綠色，夏天又變成青色。葡萄樹底低矮的藤莖，像老年人底手一樣滿是褶皺。從五月到十月儒利葉納底農民們一直在葡萄園裏勞作着；有時翻土，有時澆水，有時剪掉一切枝蔓，有時灑一些淡青色的硫磺。十月間把重甸甸的一串串的葡萄剪下，到初寒時，泥罐子裏的新酒就已浮起了泡沫。儒利葉納底房子都是粉得雪白雪白的；每一幢房子底傍邊都有一座菜園，

庭園裏開着薔薇花。房子底下都有一個很大的地窖，那裏面收藏着尊貴的塵封的許多瓶酒：這是給節日準備的——譬如女兒安妮特要出嫁了，或是兒子路易從兵役中回來了……

我在儒利葉納住過，我熟悉那裏的人們，我熟知這村子底已往的快樂和悲哀。德國人來了。坦克踐踏了葡萄園。『佛里茨』們喝光了所有的酒。秋天，德國人燒掉了那幢位於教堂對面廣場上的烈鮑底房子。在這事發生的前幾天，在村子裏我所常去的和門上懸有『醉公雞』的陳舊的滑稽的招牌的酒店裏，打死了一個德國上士。據說他想污辱戴尼茲姑娘。他把她拖到小樹林裏，她又掙脫了。這以後把戴尼茲驅到德國去了，還向她父親判了罰款，但他無力支付。這時德國人就把他們所搜刮的一切，連山羊、被子，甚至連戴尼茲節日穿的衣服統統搶走了。但是這個上士並沒有快活好久。他被殺死在酒店裏了。德國人逮捕了店主，被搞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然後他們燒燬了烈鮑底房舍。這是爲什麼呢？有一些人說是因爲烈鮑在戰前看過工人的報紙，另外一些人都斷定是因爲烈鮑底兒子和戴尼茲過往很密。德國人把全家都捉去了，燒了他們的房子又在第戎公報上登載了這事情。

當我望着西方的時候，我也望到了儒利葉納村。我知道，我們底朋友們都會站在丘崗上眼望東方：他們期待着生活。

我到過極北部的挪威底羅佛敦羣島。那裏住着漁人們。有一個萊士特島。確切一點說，也不是一個島，而是幾百個碎小的小島。走出自己底房子，想到鄰家去，也得游上三、四十米遠：真像『海峽』一樣。到處停泊着小舢舨。孩子們坐着船去上學。坐着船到雜貨店去，運棺材都是從船上運走。萊士特島底漁人們，每年都捕大口魚（即鱈魚——譯者）。這種魚要在四月和五月裏捕。那時還冷，春天剛剛

露頭。在四月和五月裏大口魚緊挨着島游過，要趕緊下手，夜晚，在狂風下，島周圍的叢林的烏黑的海面上佈滿了點點的火光，這是帆船上燈光的閃耀。房子都架在樁上。夜晚躺在床上，你可以聽見地板下面水流的聲音，那是海。夏季、秋季、冬季曬鹹魚，晒乾魚，熬魚膠，熬肥皂，整個海島上都洋溢着大口魚底氣味。枕頭，衣服，甚至牆壁都散發出魚腥味和海水底鹹味。甚至煎出的烏蛋都噴射出一股海水的氣味，這是生活在島上的海鳥底蛋。

我停在老漁人董德銑底家裏。他老婆能煮很可口的咖啡。董德銑當過遠海航行的領航，常用這樣的話嚇老太婆：『你看，我收拾收拾就到新加坡去。』他們有一個像亞薩一樣雪白皮色的女兒瑪麗亞和兩個兒子。不久以前我在報上看到，董德銑老人被德國人以通敵的罪名槍斃了。董德銑底兒子們逃亡到英國去了。美麗的瑪麗亞姑娘的下落呢？德國人一定把她押到德國去了……弟兄們會為妹妹復仇的：萊士特島上的人民是英勇的。從小就習慣於暴風雨中的生活。在德國人面前他們是不會折腰的。

我講出了我熟悉的兩個家庭，我可以講述很多其他的家庭。我有不少的朋友住在巴黎。其中有一些人在力量懸殊的戰鬥中犧牲了。另外一些人還在戰鬥着，還在期待着。這些都是我底朋友。誰能說出我們有多少同盟者？甚至德國人——不管什麼總喜歡計算的德國人，——就是他們也算不出的。我們有和星星、飛鳥一樣多的同盟者。一切被欺凌的土地都在我們這一邊。一切世界上年青的力量都在我們這一邊。春天是我們的，勝利是我們的。

（鍾毅譯自一九四三年五月紅軍戰士雜誌）

新的巴別城

據舊約聖「創世紀」第一章所載，世界上的語言本來都是一樣的，當時的人們住在平原地方建造一層城和一塔塔，直通天庭。後來耶和華變亂了他們的語言，使他們的語言彼此不通，並且將人民分散到全地上去，這座沒有建成功的城，名叫巴別城，「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德國現在世是同樣的情形，在所有的城市相鄰村裏，到處都充滿了來自各國的勝和奴隸，他們講着不同的語言，頗有些類似聖經中的巴別城。愛倫堡這篇文章的題名，即取義於此。——譯者

在北極圈內，在一個名字叫做特羅姆塞的挪威小城裏面，住着些巴伐利亞人，他們在喝着啤酒和高呼『Hoch』（註一）。在歐洲的另一頭，在太陽照耀着的比亞里茨，普魯士人在大街上開步走，和唱着他們自己的歌。誰在克里特島呢？那是些行將餓死了的希臘人和德國人。德國人在拉勃爾（註二），德國人在高加索的叢山中。德國人正像臭蟲一樣在蔓延着。他們在地中海的另一邊——在埃及。

他們的船隻在巴西的海岸邊來往着。但只有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德國人是一天一天地稀少下去了……這就是德國本國。

不久之前，有一個曾經到過德國達爾姆希泰特的瑞典人，他這樣講道：『車站上的腳夫——是浩爾瓦特人（註三），和他們要用手勢講話。爲我擦皮鞋的是個意大利人。咖啡店裏面的侍者，兩個是法

國人，另一個是西班牙人。工人們在修理電車路，當我走近他們的時候，我聽他們所講的是捷克話。在我們住的那所房子裏面，有兩個女傭人：一個是波蘭人，另一個是烏克蘭人。在工廠裏面有很多的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在離開城六公里的地方，是俄國士兵俘虜營，他們在做田裏的工作。在達爾曼希泰特四週的采園裏的工作——是來自奧勒爾和庫爾斯克的俄羅斯婦女。把這一切總括起來，就使我想起了建造巴別城的故事。」

這是一個外國人的記述，他是從一方面來觀察一個德國城市的生活。現在我們看看安娜·季拜爾特從阿爾登希著特寫給他的一位朋友（是個SS團的士兵）瑪克斯·伯因拉爾斯克的話吧：『我們這兒凡是十七歲的少女，都被徵募去參加SS團的訓練。我們女孩子們，現在都正在受訓，不久我們就要派出去了，大概是在俄國吧。上一個禮拜裏面，我們接到了五個俄國女孩子。我們的阿爾登希著特城，一半已經變成爲一個「國際」的城市了。當然，此外還得加上英國人和美國人。』

拜蒂·舒美爾從維也納寫給她的丈夫道：『現在生活真難，在維也納到處都是外國人。在電車裏面，你只聽到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在講話，而維也納的居民差不多是完全看不見了。』

被我們俘虜過來的一個德國兵士華爾特·希威德勒，講起邁塞爾堡的一所名字叫做「萊英拉」的大化學工廠：『他們不放我的妻弟走，因爲他是工作隊中唯一的德國人。其他的，是些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浩爾瓦特人，一句話，是整個的歐洲。他們只能用手勢講話。他們什麼都不願意做。當剛剛才把三個意大利人名集好扣押住他們去工作的時候，你又得去找捷克人；當你剛找好捷克人的時候，

意大利人又不做了，他們無時無刻不是這樣忙着……」

奴隸不了解他們的主人，他們互相也不了解。代替語言的工具，就只有手勢。當意大利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不工作的時候，德國人就得心回過頭來監視他們。監獄是很大的；但是看管監獄的人是不够了。

衛護人種理論的人們所幻想的『純粹日耳曼血統』，現在算是落空了，雖然警察局有各種禁令，但是德國女人還是要和外國人性交，亞利安的生產者還得很——是在戰壕的避難室裏面，而現在靠邊睡着的，則是『低級血統』的奴隸。德國女人並不是難以取悅的。一個名字叫喬登尼·伏里貝的意大利人，從德國的庫甫希泰恩城寫出來的信中說道：『我直率的告訴你——德國女人都掛在我的頸子上。她們簡直發狂了。我們用手勢來講話，因為我根本不懂德國語，昨天是和理髮師的老婆在一起，她的丈夫是在俄國，一句話，最近這個月來，我一共有過十六次的風流事。』上七愛尼赫·谷拜的母親這樣寫給兒子道：『他們送了許多斯洛伐克人來……。勇敢些吧，我的乖乖，希爾還是個不好的老婆。假如她很少寫信給你，這是因為她缺少良心。瑪利亞·萊爾每天寫信給她的丈夫，而在此地，她却絲毫不怕羞的和斯洛伐克挽着手進街……。』德國是變成了一所國際的妓院了。

留在德國很少數的德國人，則強姦外國的女奴隸。『黑衫隊報』寫道：『對待外國女工的態度，應加以特別注意，我們並不準備衛護他們的名譽，可是，假如一個德國男人，像對待德國女人一樣地尊敬外國女人，這就是屈辱了德國人民的尊嚴。……。』因此，強姦是可以的，尊敬則不成。

關於奴隸們在德國生活的情形，我們也可以從兩封信中看出來。

地主恩斯特·威爾加從東普魯士的辟拉城寫給他的兒子道：「我們馬廐裏有一個法國人在工作着，他要說服我，說他是個大學生。你看見這些巴黎的小子——就好像他自己是個克雷蒙梭（註四），我安置了他的工作。他不肯吃我給所有俘虜吃的東西。你想想看，他們吃的是德國糧食呀，這批豬糞！那時候我向他說：『吃青蛙去吧，大家知道，法國人是靠青蛙過日子的。』他逃走了，但我們找到了他——兩條鬍鬚追趕他一直到天亮。這時候我就把他綁在柱子上，並且這樣寫道：『克雷蒙梭——黑奴——吃青蛙的人。』……」

農婦安娜·克勒爾從薩克森邦的新吉爾寧地方寫給她的丈夫道：『當要收割糧食的時候，一個俄國女人上吊死了。這不是人民，而是一種畜生，我給她東西吃，甚至還給她飯巾。起先她亂叫，說她不願意和卡爾一齊住在馬廐裏。我想，這種污貨還講究名譽。後來，她偷了明娜姑姑的麵包乾；當我處罰她的時候，她在馬廐裏上吊了，我這日子已經是神魂不安，而現在此地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這個被迫害的法國青年和這個俄國女受難者的名子，但我們是忘不了威爾加和克勒爾這兩個名子的。

七百萬個外國男奴隸和女奴隸在德國被磨難者。他們講各種不同的語言，但他們是互相了解的。他們都是死命的憎恨德國人。當有一天同盟國的軍隊開近德國的邊境時，這千百萬的囚徒會狂歡的來迎接他們的。那時來審判希特勒匪徒的，不是海牙國際法庭的審判官，而是在達爾姆希泰特，在邁塞爾堡，在阿爾登希泰特，在辟拉，在新吉爾寧，以及所有德國各城市與鄉村中的法國的，捷克的，波

蘭的和烏克蘭的奴隸們。

(註一) 巴伐利亞是德國南部的人，Hochdeutsch：意爲「萬歲！」

(註二) 指北歐、挪威、瑞典、芬蘭及薩摩之最西北部，總名拉勃蘭。

(註三) 即克羅地亞人，在南斯拉夫的一個民族。

(註四) 克羅塞是法國歐戰時的內閣總理，有「老虎」之稱。

(戈寶權譯自紅星報)

綢子和風子

現在，每一個德國的城市裏，走來走去的，都是些哭腫了眼睛的女人們。她們的丈夫在列寧格勒、莫斯科、羅斯多夫都被打死了。誰知道她們在不眠之夜裏想些什麼呢？也許，她們憶起了那些幸福的時光，當她們的丈夫寄來一些報告勝利消息的愉快的明信片，法國香水，和希臘的香料給她們的時候，也許，這些寡婦們正在咒詛那不但毀滅了成百的歐洲城市，而且毀滅了千百萬德國人的家庭的希特勒！

和寡婦們在一起，在每一個德國的城市裏，走來走去的還有一些妻子們，她們的眼睛閃着光芒——這並不是因爲淚水，而是由於飢餓。她們正在等候着從前綫寄來的信件。不但是這件，而且等候

着郵包。她們比等待信件更甚的是引項期待着豬油和香腸。她們也期待着襪子和鞋子。這些人們還什麼都不明白。戰爭對於她們——是一家百貨商店；丈夫是爲了購買物品而去的。她們，這些愛麗慈、愛瑪、格爾特魯德（註一）們，有着貪婪的眼睛。她們憧憬着火腿，灰鼠皮大衣，絲襪子。然而她們又是並不選擇和奢求的。在我們獲得的陣亡了的德國士兵們的最近的信件中，所講述的貧困的事實，使人震驚。

一個家住在尼金漢城的士兵加甫格爾的妻給她丈夫的來信中說：

『……寄來花圍和拖把布（註二）的包裹收到了。花圍很好，看起來，還是在和平時代做的。媽媽比一切都喜歡它，因爲每天它都需要用的，這裏挺缺乏這種東西……』

一個居住在阿漢城附近的格林地方的士兵科爾其爾斯的妻子的來信中說：

『……我對你還有一個要求，如果可能的話，請給我搞一點捆東西的繩子來。這裏沒有這東西……』

從這幾行字句裏，可以看出可怕的，一貧如洗的德意志來。希特勒把德國的人們弄到什麼地步了啊！神聖的進軍是爲了一個拖把。英勇的戰鬥是爲了一條繩子。他們走遍了歐洲，他們把所有的國家都搜括光了。他們焚燒，破壞，大吃，大穿，而現在，這些貧窮的人們，爲了一個花圍而死去……

在這些乞丐裏面，竟還有着空想家。她們至今還沒有明白。她們還在空想：也許一九四〇年——法國的搶劫會再重復一次！『未婚妻』格爾特魯德、戈爾曼寫信給自己的『未婚夫』顧斯塔夫·列金堡說：『請給我寄些做上衣和襯衣用的玫瑰色的綢子吧！這是我很久以來的理想……』

這個愚蠢的德國洋娃娃呵！她的顧斯塔夫已經被打死了。他正長眠在伏爾霍夫的雪堆之旁。在這周圍，沒有賣綢子的商店，沒有棧廈，沒有茅舍。雪——是潔白而無情的，而這位死人顧斯塔夫就臉向下地躺在這雪裏面。

而那些活着的顧斯塔夫已經不再想到郵包了。他們顧不上『未婚妻們』。蟲惑於取暖的他們，正坐在一堆小小的篝火之旁。他們向着火光爬去，正像蚊蟲一樣。他們燒破了自己的劣等的外衣，縮着身子迷信地想像那聖沐節以後的嚴寒。他們在火前癱瘓地跌倒下去，因為他們已經凍得半死了，凍透了的土地，並不收容他們。於是他們將一直躺到春天，好像鮮肉在冷藏室裏一樣。他們和活人並排地在一起，於是活人顫抖着，顫抖着而全身癢起來。他們已經久不洗澡了，已經忘記了最後一次脫過衣服的日子。這裏有一封士兵弗里茨·則白特在死的前一天寫給他妻的信：

『……我不知道我怎樣才能從虱子裏被援救出來。上衣裏有多麼多的虱子和虱卵呀，簡直叫我怕去穿上它。而我們的襪衣上，就是一片血跡。』弗里茨·則白特寫了關於冬天，關於德國聖誕節，給親人們請了安，突然，他開玩笑的寫道：『要不要給你寄一些我們的虱子呢？』

這是關於冬季的德國人的幽默。『請寄給我做襪衣的玫瑰色的綢子吧！』戈爾曼這樣切切細語着。而弗里茨在回答中却粗聲粗氣地說道：『你願意要虱子嗎？』後方還在幻想着拖把。前綫喘息在虱子和糞屎之中。後方還在討論『勝利』，前綫却在大叫：我們冷呵！我們不要再多的『勝利』——我們由於這些『勝利』就要死了，就要爲這『凱旋』而凍死，我們就要安息在雪地裏，好像森林中的餓狼一樣。只有虱子還在吃那些已經凍僵了的憔悴的身體……。

(註一)德國女人的名字。

(註二)鑿地板的抹布。

(譯自愛倫堡通訊集)

當我想到勝利

當我想到勝利，我不僅想到五月九日（德國投降日——編者）而且也想起了六月二十二那個日子；我聽到的不祇是簽署投降書的德國將軍們的筆下嘩嘩聲，而且聽到了由德寇魔掌中逃跑出來的農民們火車的軋軋聲；並且我看到的不僅是慶祝最大勝利的烟火，也看到了第一次戰鬥的火光。我的思想總是把我引回到我們歷史中最艱難的年份——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柏林的命運在蘇聯人民保衛着遠離伏爾加的伏爾加河岸上的一小塊土地的那些月份中便被決定了。他們並不祇是保衛着伏爾加河畔城市的廢墟，他們是在保衛着具有悠久與燦爛的文明的俄國與歐洲。但沒有在它以前所發生的事情——沒有在第一個月裏不平等的關爭中犧牲的無名英雄們，沒有列寧格勒的堅強保衛，沒有保衛莫斯科之戰以及沒有悉瓦斯托波爾的史詩，斯大林格勒史詩也將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在那些可怖的日子裏就已贏得了戰爭，當時某些『朋友們』業已在為我們讚祭文了。我們的和平人民，我們的拖拉機駕駛員與鍊鋼者，我們的伐木工人與農藝學者，我們的電氣工人與泥水匠們使一世記來的征服者，世襲的勝利者們屈膝了。讓那些夢想着另一次『十字軍』的人們去回憶過去——去回憶六月二十二日夜晚

的德國陸軍，德國的附庸國，六箇迫擊砲，虎牌坦克與帝國的將軍們去罷。這豈是可能的麼？這些紳士們竟不懂得無論關於絕密武器的談論以及各式各樣的聯盟，集團與區域都是恐嚇不了我們的。當德國法西斯在轟炸倫敦或毀滅加文特利的時候，英國人表現了偉大的精力，我尊重他這一點。不僅是英吉利海峽拯救了英國，英國人民的堅忍不拔也拯救了她。英國人挽救了他們自己，但坐在他們的孤島上他們是不能夠挽救歐洲的。歐洲的得救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當時第一個蘇聯國境哨兵以其生命的代價摧毀了第一輛德國坦克。就在我們祖國喪失第一寸土地的那天，我們便開始了解放巴黎與雅典，布魯塞爾與華沙。我們單獨對法西斯聯盟作戰有三個年頭。我說單獨，係由於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與庫爾斯克突出地帶大戰面前，非洲的戰事看起來有如無關重要的遠征，當莫斯科大戰方酣之際，在非洲的幾師人正在佔領或放棄杜布魯克。當斯大林格勒之戰已達頂點的時候，阿爾及爾的軍需官正在給各旅分發士兵宿營證。去收買達爾朗海軍上將是要比打垮鮑里斯元帥要容易些的。在庫爾斯克突出地帶大戰開始的時候，西西里還沒有影子……第二戰場之開關不在偉大悲劇的第二幕，却在最後一幕。它是在這時候開關的：當時德國陸軍已不再神氣了，當時德國精銳師團再也不在法國土地上出現了，有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他們已經永遠地埋藏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了。英國與美國的士兵他們進入戰鬥的時候，打得很好。他們勇敢的執行戰略家們與政治家們所給予他們的任務。這些戰略家與政治家均為政略與戰略所箝制。士兵們不能對他們負任何責任。我們那些幸災樂禍者聲稱：第二戰場『拯救了俄國』。我們很知道，在諾曼第的登陸是澤克魯的行動。我們也知道這一登陸不是發生在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而是在一九四四年。可以造成勝利，也可以坐享勝利。人們

可以翻土、播種並進行收割，人們也可以只來打穀。我們在同世界各國共同慶祝勝利日。我們珍視倫敦的婦女與英國的駕駛員以及美國的水手們對共同事業的貢獻。我們知道歐洲最優秀的人民——南斯拉夫的英雄們，法國的民兵，波蘭、阿爾巴尼亞與挪威的游擊隊員，被法西斯俘虜的各國抵抗運動的英雄們——在最艱難的年份裏和我們並肩作戰。我們的節日就是他們的節日，因為他們的悲傷也是我們的悲傷。在這個偉大的日子，歐洲各國人民對那些死難者感到極大的悲痛，對勝利感到極大的喜悅。對於人民來說，勝利是生路。對於商人來說，勝利是有利的便易的利潤豐厚的事業。這些紳士們打算以廉價來收買被國爭與飢饉毀滅了的歐洲。他們在最容易的地方——在那些崇拜賄賂的地方開始。他們宣稱希臘的殺人犯是模範的民主主義者，希特勒的土耳其供給者是極可表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這些海外的商人們現正想道以甚賤價錢來收買法國。法國的反動派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抬起它的頭來，並不是平白無故的。他們想重演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把戲，把工人階級從國家中排斥出去。海外的烏鴉們正在用鼻子嗅着獵獲物。他們想以一塊麵包和一袋子煤來收買修道院的國家，公社的國家。這些烏鴉們的食慾是提高了。他們在反對共同敵人的戰爭中懶於去武裝。現在他們懶於解除武裝。現在他們匆忙地武裝起來。當戰爭結束了，他們却開始談論戰爭。他們帶着貪婪、仇恨與盲目在短勁反黨的十字軍。那些最心急的人公開地這樣講，歐洲各民族在苦難的年份中會夢想着另一次光輝的勝利。在一九四二年誰會相信五年之後商人們會談論第三次世界大戰呢？我絕對相信：那些烏鴉們是徒勞的，牠們的計謀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但是牠們在新墳的呱呱亂叫，乃是對每一個誠實的人的一種侮辱。那些失去了自己兒女的母親們要求和平，那些撫育嬰兒的母親們要求和平。那被砲彈、地雷與炸彈弄成殘

慶的歐洲要求和平。和平也是德國人的墳墓所要求的。我們的時代乃是一個嚴酷的時代。我們一向正視現實的，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們抗拒了現實的可怕的威脅。現在我們也不怕正視它。我們完全看到了未來若干年中的艱難，我們要在廢墟上重建，必須戰勝貧困，必須遏制貪婪。我們追憶戰時的女誼，我們人民的英雄的努力，地堡中手工做的小煤油燈——這乃是我们透過歐洲漆黑之夜的理性與良心的火炬。我們現在慶祝勝利或許不如兩年前那樣快活。少年已成爲有思想的青年，而我們老一輩的人們，而孔上或許已添上了新的皺紋。然而，勝利的面孔不論被什麼陰影遮暗，從它眼睛中射出來的光芒都是比夜之黑暗強烈的。那些把生命獻給自由的人們，不但從昨天的黑暗裏而且也從明天的黑暗裏拯救了我們：他們給我們贏得了享有和平的權利。

（紀堅博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的消息報）

墨水和鮮血

91

美利堅合衆國是一個巨大，獨特和多樣的國家。我在美國住了二個月，當然，要認識美國，這二個月還是嫌短促的。但是它已給了我足夠的時間使我們知道美國對我們了解的那麼少，而我們對美國的了解也那麼不夠。

我的一生中曾作過廣漠的旅行：我已走遍了整個歐洲。可是我來到這裏後，我每走一步便要吃一

驚。這裏每一樣東西都不同：城市，樹木，和風俗都是這樣。我觀察着，我試着要懂得美國。只看見掠眼的東西的旅行者是可憐的；他的眼睛必須知道如何去尋求潛藏在陰暗中的事物。

當你在暮色中站在紐約城的某橋上看紐約時，紐約總得很是宏麗；我在看了摩天樓後又去密上失必河，在那裏我看到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史杜夫人所著『黑奴籲天錄』的原名——譯者註），我並未爲此行感覺遺憾。我會化好幾個有趣味的鐘點，和作家們談話，和有着偉大思想和偉大心臟的人們談話。但我在美國普通城市中和普通美國人的談話也並不顯得不重要，在那邊只有二三座摩天樓隱現在無數樓房的上面；在那邊大批精緻的舒適設備和可怖的偏見並存在一起，在那邊在『大街』（辛克萊·劉易士所著書名——譯者註）上走着的並不是那些已寫和未寫的書籍的作者，而是書中的那些英雄。

我在幾乎還未跨下那越過重洋的飛機時，美國訪員們的問題便大雨似的傾到我身上來了。他們並未向我問起俄國；不，他們只要知道一件事：『你對美國的印象怎樣？』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說那目光炯炯的海關關員麼？說訪員們的盲目無知麼？現在我已看到一些，但是在我能坐下來寫作之前，我必須需要時間來思考。我準備向美國人大事學習，但我不願學那些美國新聞記者的榜樣，他們常在來蘇聯以前便把他們關於蘇聯的書籍寫好了。

我們對美國知道得很少；我們對於她們的優點和失敗的概念是很概括的，在我們的報紙中，關於美國生活的文章並不多。原因並不是我們對它缺少興趣而是缺少着紙張。如果我們的紙張能如美國報界用來描繪好萊塢影星生活的紙張那樣多，我們對美國人民真正的生活將會知道得更多。但在我們的

報界中從沒人會找到反對美國人民的謾謗的；我們知道得很少，但我們所知道的却都是真理。

受讚美的美國書

在戰前，我們印了不少美國作家的短篇故事和小說。我們的讀者很受它們的迷惑，不但因為它們都是好書，也因為我們要知道美國人在如何生活，在如何思想，在如何感覺。雖則在美國有着許多紙張，但蘇聯作家的書籍却很少在這裏被印行。這現象顯出美國讀者對俄國的生活無興趣嗎？我不相信。當然，在目前，我們確沒有托爾斯泰和契珂夫，但我們也有着優秀的作家。只是美國出版商的眼睛並未移向我們。而這裏廣告在一本書的成功上正估着和書的品質一樣重要的地位。

我簡直給美國訪員的問題驚呆了：「俄國人知道美國人會在戰爭中援助他們嗎？莫斯科的市民怎麼懂得證券市場的？你的種子爲什麼愛用鈕釦而不用拉鍊？爲什麼你們只有一個政黨而不是二個？」我相信一般的美國人一定要比他們所讀的報紙更爲優良和有知識；可是，照例的他只會不知不覺地爲報紙，批評和出版商所影響。一般美國人以爲他的興味正左右着出版商，他的意見正左右着編輯人；實際上，一般美國人的興味和意見是常爲編輯和出版商支配着的。

俄國作品的譯本在美國雖不多，但由美國人寫的關於俄國的書籍却不少，他們中有些很誠懇，有些看法很表面，有些是明顯的在歪曲事實。不幸的是偽造多於報導的書籍却很多。謊言製造者的資金週轉是有着高額利潤的，因爲消費者沒有機會來區分謊言和真理。爲劣質香烟做廣告是無利可圖的；吸烟的人是不會受第二次騙。但一般美國讀者又怎會知道某一關於蘇聯生活的敘述是準確的而另一敘

述又是偽造的呢？

美國報界的罪行

如果我們的報紙罪在關於美國的消息太少了，那麼，許多美國報紙罪狀便是刊載了太多的對蘇聯作錯誤報導的消息。目下許多極端認真的美國報紙所進行着的反蘇運動都是拿宣傳性和虛假的消息作根據的。誹謗者知道打擊不必放在社論中，許多人甚至根本不讀社論的，誹謗應放在電報中，可以在封面那頁上用粗號字標題標出來。

對於各種美國報紙的客觀性存在着一個神話。那祕方是這樣的：刊登十篇反蘇的消息，然後登一篇親蘇的，於是讀者便會以為你是公正的，並會因此是為俄國人的陰險而驚恐了。一般的美國人都喜歡和平，我已深深的相信他們真要和俄國人友好相處。他們確信他們不會感受報界的謊言，他們已很成熟，能獨立思考的。但是為了思考，你必須知道你所思考着的題目。

這些美國人說我把報紙的重要性估計得太高。他們用這例子來證明：大部份的報紙是反對羅斯福的，但羅斯福終獲重選了。我願再說一遍：我深信一般美國人並非是笨伯，可以用文章來把他丟開的。一般的美國人親眼看見了羅斯福行爲，此外，羅斯福也能使他的聲音為大家所聽到；可是一般的美國人對報導俄國在伊朗，在中國東北，在巴爾幹的行爲的消息，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查一下呢？即使他想獨立的思考，但他所思考着的往往便都是一堆每天由報紙供應他的謊言。

一般的美國人可以盡心的思考着蘇聯坦克開向德黑蘭的消息；他可能得出他自己『獨立』的結

論，但他不知道的是蘇聯坦克根本從未開向德黑蘭。可是，駁斥總是不能建立和原先那報告一樣的效果的，誹謗的力量便是在於它總會留着痕跡。

德黑蘭離此很遠。現在我已親身在美國了，可是我還是讀到了不少關於我的發明出來的消息。譬如說：消息傳來說我在旅行全美國時始終由一個『蘇聯秘密警察的特務』陪伴着，但事實上是由一個美國國務院的代表在陪伴着。他，根據這些騙人的訪員們的話，便這樣的變成了蘇聯秘密警察的特務了。

『時代』雜誌在說起我在全美國的旅行時，宣稱：『這種採訪自由是蘇聯在莫斯科的記者一直夢想而不知其為何物的。』這些話刊在六月十日的『時代』雜誌中第七十頁上。在這本雜誌的第三十頁上，我讀到了一個叫約翰·菲思邱的美國記者『在烏克蘭作了三個月無限制的……觀察回抵美國』的消息。我不知道菲思邱在俄國時夢想着什麼樣的待遇。可能他因沒人陪伴他作旅行而感遺憾。我私人對國務院的照顧是感激的，尤其是因為陪伴我的納爾遜先生是一個有極大文化修養和機智的人，我們已成為極好的朋友。但我不能不指出『時代』雜誌却利用我的旅行來給俄國投上一個暗影。

如果美國新聞記者由蘇聯外交的代表陪伴着旅行，美國的記者便會大聲尖叫，說他們的自由被剝奪了。如果一個蘇聯新聞記者由一個美國國務院的代表陪伴着，『時代』雜誌便會說美國新聞記者不敢夢想這樣的自由。我實在不懂得這樣的邏輯。或者寧可說，我怕我懂得太清楚了。

當美國人問我拿什麼東西來增進我們相互的關係，我回答道：『同一的尺度』。讀者們不要以為我要介紹米突制或攝氏制而作宣傳了，我並無意於干涉美國的內政：如果他們歡喜說水在三十二度時

結冰，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在對任何行動作估價時，最要緊的是要用同一的尺度。

安全抑或帝國主義

美國人有着二付尺度：一付用來衡量有道德的美國和英國。另一付則用來對付『罪惡』的蘇聯。如果美國人想把冰島作基地那便是『爲了世界安全的保障。』如果蘇聯不欲她的鄰邦被利用作爲侵略蘇聯的基地，那便成了『赤色帝國主義』。如果美國製造原子彈，那是科學家們的奧妙工作，或只是足球似的無害娛樂。如果紅軍人員排成行列走到莫斯科的街道上洗蒸氣浴時那便是『準備作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許多美國報紙用蘇聯來恐嚇他們的讀者，像用荒唐故事中的鬼怪嚇小孩一樣，而許多早已過了兒童時期的讀者仍會發起抖來。

美國人有許多優良道德，但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有着良好的記憶力。他們的心都給日常的事件所佔滿，他們很少想到歷史。一位婦人告訴我：『你不會有興趣讀這本小說的，它已不新鮮了；它是二年前出版的。』在這裏時式迅速的在變，這很好；但這裏概念也在迅速的變，那便不好了。讀者們還能記得他們一年前所讀的東西嗎？

愛因斯坦教授曾告訴過我一個非洲的部落，那邊的人都是拿事物或現象的名字來作姓名的，『鷹隼』，『棕櫚』，『黎明』，『河流』等都可以。當人死後，他們的姓便成了『忌諱』，因此便必須給那些『鷹隼』，『棕櫚』，『黎明』，『河流』等重新取名了。假使不止姓名連人的概念也這樣快

的更換不是好呢？一般美國人的讚美斯大林格勒史詩是離此很久以前的事了嗎？他們屏住呼吸注意着紅軍每一步進展是離此很久以前的事了嗎？

可是在現在，許多美國人在讀了他們的早報和晚報後，便以為紅軍在威脅他們的幸福，並且可能必須在某一天明亮的晴天投一個原子彈到斯大林格勒了。一個美國人擁抱着他剛從歐洲回來的兒子。他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所以仍能活着回來，可能便是因為一個俄國青年已在伏爾加河岸旁跌倒了的原因？

我曾在田納西州和一個農民談話，這農民告訴我美國人難免和俄國人一戰。他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全部興趣都放在他的牛隻上，感謝TVA，他正靠着電力榨乳，這就使他有充分的時間來研讀他本地的報紙。這些報紙每天都在告訴他俄國的新陰謀——在的里雅斯特，在朝鮮，在大不里士。這農民對如何榨牛乳的知識要比對世界地理的知識多得多，他讀了這些報紙，便給這可怕的蘇聯的惡行所攝住了。

他可能已讀到五月十八日那期『諾克斯伐爾』雜誌中某一段中的控訴；那裏邊說莫斯科便是聖經舊約詩篇第一百二十篇第五節中所提到的米設，而舊約『以西結書』中提到的瑪各便是俄羅斯；毀滅這共產主義的瑪各國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按着舊約，米設和瑪各是二支極野蠻的白種人的祖先——譯者註）。所有這些聽來好像荒唐的故事，但却是用白紙黑字印出來的。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向我說：『不要去理那些在我們報紙中的東西，那些全是瘋子寫的。』……我們在俄國也有瘋子，可是他們並未出版報紙。

有一支古的西班牙歌曲說：『有人唱着他們知道的東西，別人知道他們在唱着什麼。』那田納西農民唱着他所知道的東西。而『諾克斯伐爾』雜誌的發行人却知道他事實上是在唱些什麼。

那些想在我們這二民族中付出任何代價來製造糾紛的人們公開的說：他們不愛好蘇聯。我敢大膽的加上一句說：他們也並不愛好美國。他們只想到世界統治，油，原子彈，英美集團……等任何東西，就差沒想到美國的子孫。

美國報紙寫了不少關於『鐵幕』的話，他們說我們便是由它的存在而與世隔絕了。事實上俄國人在美國人面前已被一幅謊言的幕所掩住了，而這一幅幕便是由許多美國報紙所創造的。桐幕可用風吹散了；又有什麼東西可吹散這幅謊言的幕呢？

有些美國記者抱怨他們在俄國不能看到什麼東西，但是說得確切些——他們只沒看到什麼材料可以在美國報上作聾人聽聞的標誌。他們看到的是正常的日常生活，但他們希望却是聾人聽聞的消息；他們看到了許多家庭的重建，但他們却歡喜說俄國正準備奪取德黑蘭，中美的洪都拉斯，甚或天上的月亮。

我可以告訴他們幾十件我們這裏『聾人聽聞』的事。當出產彼得列雅各夫式轟炸機的工廠在製造機車時，我們興奮了。當一個出產坦克的工廠在製造公共汽車和牛奶罐頭時，我們感動了。我們因列寧格勒的人民工作時間之後還能修理住屋而驕傲。我們在夢想重建基輔。我們寫着書，我們在保育戰時的孤兒。我們的孩子們結婚了，我們的姐妹深尋着她們恩愛的死者的墳墓，要用鮮花來向他們致敬。我們要比所有的人都要艱苦奮鬥，並比任何人更重視和平，把侵略計劃歸到我們頭上是低劣而罪

惡的。

沒有一個地方我們的利益會同美國人的利益發生衝突——在世界地圖上是如此，在我們的心中亦是如此。美國是一個大國，俄國也是不小。我們可以在和平生活，我們必須在和平生活。我們不想將我們的興味或思想加在別人的身上，我想我們能在美國人那邊學到很多東西，美國人也可能在我們那邊學到不少，學習時要比作戰好得多。

雖則美國的新聞記者要求我回答爲什麼在俄國只有一個政黨而不是二個，我却並不想問爲什麼在美國只有二個政黨而不是三個或一個。或是爲什麼在南部各州只有一個政黨而不是二個。每一個民族依照着它的願望而生活着，各個不同民族的習尚也應受到尊重，正像隔壁鄰居的生活方式應受尊重一樣。

有角的圓桌

我們這二民族有許多共同點：正直，豪爽，有力，巨大，有着清新的前途。我們兵士當他們在易北河畔遇到了美國兵時說：『我們是朋友。』現在美國人是在赫得遜河或密士失必河，而我們則是在伏爾加河或是鄂畢河，我們爲何必須爭吵呢？外交家們歡喜坐着圓桌開會；圓桌是他們特別愛好的傢私。讓我們老實的說，外交家的圓桌有着太多的尖角。但人民並不是外交家，人民是真可以坐在圓桌周圍談話，而我們這二民族還可以併肩坐在一起；可是團結他們在一起的東西却沒有，除非是謊言和誹謗。

我在美國留下很多朋友，我和他們分別時心是沉重的，因為我在他們的眼睛中看到了恐懼。惡毒的報紙已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已在許多美國人身上注入了可能發生『第三次大戰』的思想。法國有句老話：『大家對聖誕節談得那麼多，以致聖誕節真正的到了。』

新聞記者們關於『第三次大戰』的故事是危險的。因為他們注入人民一種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觀念，但事實上是可以避免且必須避免的。有些人一點也不節省他們的墨水，希望別人因此會濺出他們的鮮血。盟國還未結束他們的連續的戰犯審判，而一部仇視蘇聯的人們却已開始重新走上希特勒的那條滿佈荆棘的道路了。俄國人在奧得河躺下，美國人在萊茵河犧牲，便是爲了這結果嗎？

在所有的國家中，包括美國在內，毒藥的自由售賣是受禁止的，那麼爲什麼美國人肯允許他們最惡劣的公民用可能致死的毒液來餵飼他們的同胞呢？所有的國家中，包括美國在內，誹謗是被法律禁止的，那麼爲什麼美國人又允許對二萬萬蘇聯人民進行誹謗呢？自由是一件偉大的禮物，世界上再也沒比言論自由更使人神往的東西了，但世界上沒比貌似醫生實乃以毒藥害人的事更可怕，也沒比貌似弱者的保護者實乃大流氓的人更可懼的了。

我相信美國人會在他們自身中間找到那種精神力量，概念，和智慧來向準備『第三次大戰』的人說：『够了！我不想爲你的墨水付出我的鮮血。』

（此文爲作者旅行美國兩個月之後所作，發表於『柯里爾』雜誌，萬歌譯。）

黑人在「自由美國」

我常常從紐約市中跑到加爾萊姆——這是黑人的城市，黑人區。那兒相當骯髒，窮苦，那兒很少宏壯的美國技術。但那兒的人們却更快樂些，更純樸些，更人性些！加爾萊姆街道上的人羣好像南歐港口的人羣。黑人住在加爾萊姆，因為別的區域不租給他們房子，而在加爾萊姆的貧民窟比別的區裏近街道的房子租金還要貴，他們每天早晨到「白」區裏工作。他們做清道夫和電梯掌管者，信差和熨爐師，看守人和泥水匠。他們是黑色的，所以做的工作也是黑色的。他們被奪取，被虐待，被嘲弄。

在理論上，紐約是存在着人種平等。不許從飯店裏把黑人攆出去，而對他說：『請您走吧，因為您是黑人。』也可以說：『座滿，』雖然甚至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着的。法律是法律，沒有一家排場的美國飯館是准許黑人進去的。我想邀請兩個黑人朋友——新聞記者和音樂家，來我的住處。我住在旅館的四層樓上，人們預先提醒我，不准黑人上電梯，說是電梯會損壞的。

紐約被認為是美國最進步的城市。我會到過這最進步的城市中一家最進步的雜誌的編輯室：編輯先生想在我面前炫耀其進步，他說：『我們這兒也有黑人在工作，我現在給您看一位。』——於是給我們看一個黑人信差。

我同黑人交起朋友來了。在他們身上不唯有着許多由衷的善良的品質，而且他們是一些具有藝術

才力的人們，這是我所最珍貴的。在美國有無數的奇蹟；這兒有着一切，其中也有藝術——有最豪華的博物館，有最大的交響樂隊，有最大的文藝出版所。但在紐約常常感到寂寞咀嚼着心……我想起安徒生講中國皇帝與夜鶯的美妙的童話。有人獻給皇上一個帶螺絲的玩具——機械夜鶯。它能唱得跟真的一樣，而且它總是馴服的，不是它願意的時候，而是機械上了勁的時候唱歌。但是死神來臨了，她站在這個孤家寡人的頭上面，皇帝想壓息她催死的聲音；他小心翼翼地對機械夜鶯請求道：『你唱吧！』但是機械損壞了。活的夜鶯救了皇帝，它是早被皇帝擲出御園之外的。黑人是美國的活夜鶯；當我渴想藝術時，我便跑到有瘟疫病的加爾萊姆區。黑人是優秀的音樂家，優秀的歌唱家，優秀的舞蹈家，優秀的俳優；他們天賦着高度的節奏的感覺，在他們身上沒有機械性。當他們演奏起來，彷彿一個幻靈從棺裏站了起來。他們的歌曲是憂傷的，像是他們的命運一樣，但突然孩提的嬉笑衝破了悲怨，那麼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會像加爾萊姆貧民窟這兒的這樣愉快，這樣歡樂。

在紐約的市中心有些劇院是有黑人組在那兒演奏的。他們演奏得極好，連白人也樂意向他們喝彩。但如果黑人演員想在隔壁的飯館小吃一下，那麼他便會安安靜靜地被人請出飯館外邊來。紐約還沒有嚐過皇帝的難以消受的孤寂，活的夜鶯仍在放逐中……

在國務院裏問我們想參觀美國哪一部份。作家西蒙諾夫說他對電影有興趣，他願意到好萊塢。一家最大的報館邀請加拉克喬諾夫到芝加哥。當我說出『到美國南部』這句話時，美國人默然了，然後便反對我道：『這太遠啦，而且那兒不夠舒服的。』我回答：『從莫斯科到華盛頓總比從華盛頓到密西什丹遠些，我是一個戰地記者，在過慣土屋和掩蔽部的生活後，不怕缺乏舒適的條件的。我之所以

想看看美國南部的原故，是因爲黑人一開始就投合了我的脾味，又因爲記起了我童年時代所讀的講黑人的不幸的書，又因爲我愛讀專寫美國南部的現代美國作家福克涅爾和斯坦培克的小說。」

一個南方人——海軍大將的兒子，左翼記者吉林摩爾——答應領我去看南美。他有一輛很好的『別克牌』的汽車，而且有幾個星期的空閒時間。我們倆用法語談話。國務院派『美洲』雜誌的編輯奈利生先生陪我們。我同他講俄國話。在途中又有一個紐約最有名的記者西姆·格拉弗坦加入了我們一羣，他想寫幾篇關於蘇聯作家同南美的奴隸主會見的速寫。我同格拉弗坦談話是用德國話。應當加添上英語方才弄明白我們的談話是在講到安理會的會議，這時談話才更順利的進行着。我的同路者照着俄國的風習起了個名字和父稱：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奈利生，達尼艾利·高拉齊耶維奇·吉利摩爾，西姆·諾艾莫維奇·格拉弗坦，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從未來到過南方，他對我們所見的一切的驚訝並不減於我。當西姆·諾艾莫維奇·格拉弗坦進入一間一家三口黑人居着的矮屋裏時，驚叫道：『我料不到竟是這樣的……』當時我告訴他：『山姆大叔終於同湯姆大叔會見了。』（註：歐洲人稱美國人爲山姆大叔，稱黑人爲湯姆大叔。）

火車。舒適的半空的车箱；白種人喝着威士忌，打着盹。滿滿一車箱是黑種人。傾盆大雨，電車站。車輛到了，它是空的，但帶着孩子的黑人婦女仍冒着大雨留在原處；給黑人專備的位置坐滿了。公園門口寫着：『有色人不准進』。鞋店——黑人買皮鞋不准試穿，黑人試穿過的皮鞋便不能賣給白種人了。美國人向我們講了多少他們的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遷移自由！可惜，他們倒忘了一件自由——試穿鞋子的自由……

所以南方各省都存在着『人種區分』的法律。人種的差別待遇在這兒不是風俗習慣，而是國法。黑人沒有權利出席白種人的集會，不敢進有白種人所禱的教堂，自然，更不應當幻想進白種人的劇院和電影院了。

我遍遊了四州：頓尼西州，阿拉巴馬州，密士什比州，路易西亞那州。我看見許多壯麗景象；看見頓尼西狹谷的建築，在這狹谷中起了有着舒適別墅的宏壯的城市，看見新——奧爾列安的古風舊習，看見山，看見大河，看見墨西哥灣的蔚藍。但每走一步我都看見了最可怕的事物：人污辱人。在南美同在北美一樣，——有壯麗的車站。我本想讚美一番這個爲輕鬆工作日的疲勞而作了這麼多的設備的國家，但我不能讚美它；在每個壯麗的車站上我都看見了發臭的，黑暗的，掛着『有色人專用』牌子的小矮屋。一位棉花種植主人邀請我們。他住着很好的房舍，四外都是老樹圍繞着。他有妻子——白晰而盛裝，有子女——盛裝而白晰。流汗的黑人奴隸在四周勞動着。在這位種植家的房舍裏有着美國一切的奇蹟——從強力的收音機，它能收到塔什士，麥利布林和安道爾的廣播，一直到電風扇。我談起黑人的苦難。種植家微笑的答道，不能像對人一樣的對待黑人：『這毋寧說是畜牲』。不論無縫收音機也好，電風扇也好，都沒有絲毫影響這位奴隸主的智力發展。從他那兒走出來時，我對同路者說：『這不是人，毋寧說是畜牲』。

密士什比。三角州是棉花農場。土地是屬於白種人的。他們把它租給黑人。『佃戶』應繳納棉花收穫的半數給地主，其餘一半他們應賣給他，而且棉價由地主規定，而黑人得到的微乎其微的小部份，他們又得在那屬於同一的主人所有的店舖裏換日用品，也許在美國的法律家看來，這是租佃制度，

而實際上這却是奴隸制度。我看見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同時是棉花的收買者，他們同時又是出售鞋子、煤油、食鹽的商人。我想起了曾經貼在紙烟盒上的畫片；手持長鞭的奴隸主和田壟上斑斑駁駁的黑人婦女……這個奴隸主在我面前對老黑人不時的喝道：『哦，約翰，快點！……』

我走進一家貧民窟。二十三口人擠在這窟裏，男女混雜着睡覺。哦，這兒離大名鼎鼎的美國技術，離人工的冷氣和超級的舒服設備倒有多麼遠呀！這兒簡直不能呼吸，只是骯髒和愚臭而已。在最講究衛生的美國裏竟有人過着禽獸的生活。一個黑人婦女對我說，她的姐姐因生孩子而死；丈夫沒法叫醫生，他一年才掙一百八十元，而醫生費就需要六十元。我看見一家七口人一年總共才掙三百元，還有一家四口人一年掙二百元。一個農場所有者被認為是小的農場主。他埋怨去年不走運。我問他去年掙多少錢，他答道：『非常少——一共才兩萬五千元。』

一個路易西亞那州的奴隸主向我解釋：『您不了解黑人；他們像是在天堂中生活着一樣，因為他們並不需要更多的什麼東西。』在農場裏沒有學校，然而都為黑人建築了有着黑人牧師的教堂。由於過度的勞作而快要死去的鬚髮蒼白的黑人老頭們唱着讚美詩。一個黑人對我說：『我相信在彼世也有兩個天堂——白種人的和黑種人的——而且黑種人的天堂並不壞似的……』他不能想像到還有不分人種的天堂。

我的同路者——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奈利生、連尼艾利·高拉齊耶維奇、吉利摩爾、西姆·諾艾莫維奇·格拉弗坦都沉悶地默不作聲。而奴隸主怪不自在的說道：『請吃核桃吧。喝威士忌吧。俄國客人到我們這兒來真太好了。在俄國也有棉花吧……』我望着黃澄澄的河水，望着遼寬廣大的密

士什比州，我知道什麼是人類的不幸。在這條河的岸堤上行走着的全部時間，我找不到一句話來說。我恥於向人們瞻望。

近年來美國南部改觀了，工業的大城市成長起來了。而到溫斯坦或到納柴茲，仍然是家長制度和羅曼諦克的。布爾明甘已經像北方工業中心了，這兒有像曼斯特里特的一樣工廠。華盛頓的人們躊躇。南美是徒然的——舒適的設備在南美是足夠的。

在布爾明甘有巨大的五金工廠，現代化的設備。工人中有許多黑人。在這兒你彷彿如同在棉花農揚裏一樣，美國南部人已經把超現代的軍床與遠古的奴隸混和在一起了。在工廠裏黑人做着最沉重的工作，他們不許有煉鋼師、機械員、電機員，黑人苦工每小時所得到的工資比白種人苦工少十五分錢。

人種主義深入美國工人層中。很多苦工們會用冷卻器，而不會思索。他們說：『讓老闆好好的賺錢吧，這也有我們的份呢……』他們還沒有階級的覺悟。冒險家和被收買的煽惑家領導了許多職工同盟。這幫人對工人說，壞事的不是白種人老闆的貪得無厭，而是飢餓的『敵手』的黑色皮膚。在戰爭的年份，工人缺乏；北美的廠主僱了些黑人，想趁此多賺點錢；黑人價廉。工人不向剝削者白種人出氣，却向苦命的黑人出氣。不久前才組織了聯合白種黑種工人的進步職工會。這種聯合會遠非普遍的。而其他的——人種聯盟——不讓黑人做熟練的工作，因為這會發生過罷工與真正暴亂行爲。

布爾明甘黑人工人過着貧窮而孤獨的生活。城裏的黑人區還是由矮屋形成的。黑人的處境孤苦冷落，這是一羣被摒棄的人們。我曾在一個黑人處坐過。他是進步職工會的主席，一個敢作敢爲而且頭腦的人。在他身上那些苦難和鬭爭的年份所練出來的智慧使我吃驚。他不久前使『黑人』小組加入

了職工會。我問他同白種人同志的關係怎麼樣。他答道：『在工作上是的。』——『您到他們那兒去嗎？』『不。』——『白種人同志到您那兒去嗎？』——『從未去過。』

依照美國的憲法，一切男女公民不分人種都有參加選舉之權。但在美國南部各州黑人剝奪了投票權。在阿拉巴馬州三百萬人口，其中一百一十萬是黑人。在該州的選民中有四十九萬六千人是白種人，四千人是黑種人。在布爾明甘有二十一歲的黑人十三萬人，而在民選名冊中總共才有一千四百個黑人，由十個黑人中允許一個人投票。在密士什比州黑人佔入口的半數，而該州的人口半數便被褫奪了投票權。

南美各州怎樣對付聯邦的憲法呢？方法很多。第一，向投票人徵收捐稅。南美的黑人是一羣赤貧的窮人。幾塊錢在他們看來就富足了。一個黑人求我們把他帶到北方某州，他多年來像幻想天堂似的幻想加爾萊姆，他知道他永遠也不會稱得車票錢。他怎樣交付投票捐稅呢？除了捐稅還有考試：選民應當『懂得而且會解釋憲法。』不用說，人種主義信奉者的『監考官』是要把一切黑人都剔下來的。聽人講，一個黑人教授在『應試』時，人們提出了各種文件叫他『解釋』。最後，『監考官』給他一張中文報紙：『您懂得這兒是寫的什麼嗎？』教授答道：『我懂得。這兒寫的是你們永遠不許黑人走到投票箱跟前。』還有，即使黑人交了稅而『考』取了，那時奴隸頭子會用挺好的小棍兒教訓這個人不速的選民的。不錯，在南美他們知道怎樣『解釋』憲法的！

我想起來了，某些美國報紙對南斯拉夫人是如何的憤慨：人民陣綫政府褫奪了幫助德國佔領者的人們的投票權，——差不多二十萬人從選民名冊上抹掉了，美國的報紙抗議道：『這叫做什麼普選？』

同樣的這些美國人認爲幾百萬美國黑人（他們中有爲美國的自由戰鬪過的）褫奪投票權是極其自然的事。我只好請教請教美國：褫奪黑良心的人的投票權公道呢，還是褫奪黑皮膚的人的投票權公道呢？

人種差別待遇的擁護者說：『不能同黑人講平權，因爲黑人是喪失了文化的。』的確，人種主義者使盡一切手段使黑人喪失受教育的機會。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奈利生在紐約對我說了許多關於人民教育的設施：『凡是到十六歲的美國人一律進學校！』在密士什比州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再不談人民教育了！我們看見了許多不識字的少年人，我們看見了永遠沒看見學校的黑人的孩子，他們自小光知道一件事——苦役似的勞動。

但也不能說奴隸主是白種人的文化的擁護者：他們一般是與其選擇初級讀本而毋寧選擇鞭子的。在密士什比州教員是乞丐；他每年的薪水是六百元。至於說到教黑人的黑皮膚的教員，他們不僅乞食，他們在白種人面前還得卑躬屈膝。白種人監學到了黑人學校，他直呼教員的名字：『喂，比爾！……喂，約翰！……』甚至監學二十五歲，教員五十歲，而教員仍然應當恭敬回答白種人：『我聽從您，史密斯先生』……

就譬如在阿拉巴馬州，批給民衆教育的款項統統發放白種人了。爲了洗清良心，把黑人教授叫了去向他解釋：『預算有限，款子已經支出了，你們只好自己想辦法！』這個黑人回答得很妙：『您是對的——這兒白種人更需要教育。』

我在美國南部遇見許多有教養的黑人——學者、作家、醫生、教師、律師。這些有文化程度的黑人在這有着過多的懷揣學位文憑的白色生番的南美的背景上，就好像燦爛的斑點。我到過黑人的報

館，這兒每分鐘都有受到懲罰威脅的熱心家在堅持着人權。

在私立飛斯克大學有七百個學生，男女黑人。他們是未來的醫生、教師、律師，但他們祇能醫治黑人，祇能教黑人的孩子，祇有當審問『有色人』時才能出庭。黑人教授不准進入公共圖書館。著名化學家布列著教授告訴我，他不能在國立大學試驗室工作。我在飛斯克大學消磨了幾個美妙的鐘頭；我看見了尋求真理的青年。那兒有一個女生，她會說俄國話——一半俄國人；母親是教德薩人，父親是黑人，她白淨而不像黑種女人，但在她的護照上却填寫着『有色人』，這樣便對她關閉了一切大門。

在新，奧爾列安我認識了一位土木工程師，他是一個臉皮紫紅色，有雀斑的人。他看來是一個愉快的談手，他的博聞廣識令我驚倒。我請他到咖啡館坐坐，他拒絕了，沒說明原因。後來朋友向我解釋，城裏頭都知道他是『有色人』，因此他沒有權進咖啡館。

手腕漂亮的辦報人印上幾欄黑人專頁。白種人不向這些欄上撰稿。如果有白種人在街上打開黑人報紙，他便會遭打或者受到污辱。如果白種在美國南部公開聲明黑人也同白人一樣是人的話，他便會遇害。

(劉遵海譯)

自然的法則

歐洲去年冬天是稀有的寒冷和漫長。人們爲春天的到來而歡喜。這是一個並非輕快的春天：現在

歐洲的人民都知道，可怕的戰爭所帶來的創傷是多末的深。兩年前，許多人都相信破壞的城市會像神話似的飛快生長起來，法西斯的幽魂會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幻想是沒有了。經歷了戰爭的歐洲人民沒有歇過乏來，沒有睡醒困，沒有養好身體。在許多國家中，在由戰爭所生出的災禍上，又加上不可抗拒的災禍——旱災，水災，冷災。如果說人們還沒有灰心喪氣的話，那是因為法西斯的冬天畢竟是過去了。

每個勞動者，每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不管是俄國人，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他聽到這新的戰爭的時候，他會發生什麼感想呢？戰死者的墳墓還沒有長滿青草，以前繁華的城市中還堆着廢墟，耳旁還響着俯衝機和六支砲筒的迫擊砲的轟鳴，死者的母親還未曾擦乾眼淚，活者的母親還未曾看够自己的嬌兒，而那些吃麥片粥和猪肉的，本可以過得滿好的人們已經對人肉紅起眼來——昨天吃人肉的野人的光榮在盪惑着他們了。

愛爾先生曾做過賓西利瓦尼亞州長，美國駐士大使，像他這樣的在美國並不乏其人。你瞧這位愛爾先生在眾議院聲明了，說是必需立即進攻蘇聯，如果這爲了某種原因而不可能的話，『那末就埋頭製造各種恐怖的武器並把它們貯藏起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些心地和平的人們對我說，對愛爾先生用不着去注意，因爲他是一個不治的酒精中毒者。但這仍不妨他身居要職，並且不妨他現在在眾議院委員會裏發表演說。他不是單獨的。獎金先生，這位議員，密西士比州奴隸主的代表，兩星期前要求跟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另一位議員，密支甘州的代表克勞福爾德先生不久前發言道：『美國應當向俄國人聲明，讓他們即刻自行解除武裝，不然我們便使用原子彈。』當我在華盛頓的時候，並沒有

人告訴我說上述的議員們是一些不治的酒精中毒者；他們不過常常喝着冰浸汽水和煮沸的牛乳倒是完全可能的。他們的演說不是酒精中毒在作祟。他們的演說，連愛爾先生的演說也算上，是法西斯主義在作祟。

實行所謂清除德國的納粹主義，對美國人是很為難的。如果希特勒的信徒們引證起這般可敬的議員們的演說，那時怎麼辦呢？因為不論愛爾也罷，克勞福爾德也罷，獎金也罷，他們的其集團也罷，都沒有想出什麼新鮮花樣，他們只不過是重述希特勒，戈林，戈貝爾，羅津貝爾所說的話而已。能够把在美國按月或者按期領到津貼的事情當作審判納粹黨徒的罪名嗎？

邱吉爾先生不久前發表了一些滿肚子委屈的文章；他憤慨坐在邊廂的法西斯觀眾們為什麼對一些華盛頓的獨唱家喝彩，却忘了對他在福爾頓的演說喝彩。我不知道在『十字軍』的世界裏是否設有著作權保管處。邱吉爾先生應當向那兒申冤。在美國的反動派之流，他的確是說出『反蘇』的第一人。但在他之前有一個德國上等兵（註一）也曾說過極其類似『反蘇』的話，並且大家都知道，這場『反蘇』落得一個怎樣的下場。

法西斯主義是善於化裝的。它毫不費力地可以從一個國度遷到另一個國度，從一個大陸遷到另一個大陸。它不僅會援引魔鬼，而且也會援引上帝，不僅會引證尼采，而且也會引證聖經。它能變用四十種語言談話，但不論它用那一種言語談話，它都說着同樣的一套。

當我在刊物上遇見『半法西斯』字樣時，我想起了普式庚的諷刺詩：

半閣下，半商人，

半智者，半無知，
半流氓，但尙有希望。

終於成爲一個整的。(註二)

對『半法西斯者』用不着擔心：他們是不受脫胎換骨的威脅的，他們現在就是『整的』法西斯，不過沒有到時候以前他們蓋着半邊身子聊以遮羞而已。

我們的敵人說，凡是我們不歡喜的人，我們都稱他們爲法西斯。這不是真的，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即所有的法西斯都不喜歡我們。他們不唯不喜歡我們，而且他們號召戰爭來反對我們。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便不成其爲法西斯了。

好戰的演說並不是今天的發明。在福爾頓和華盛頓以前曾有過威尼斯的陽台和柏林的競技場。(註三)『反共十字軍』不是文字上的新名詞；這毋寧說是剽竊——如果記憶力沒有騙我們的話，在美國的演說以前曾有過『反第三國際公約』。

數百家美國報紙，一些死硬的保守黨員的機關，一些被外國收買的法國報紙，每天寫着『俄國人是帝國主義者』，『蘇聯渴望擴張政策』，『莫斯科威脅和平』。老法子：小偷一面跑一面喊『捉賊啊！』。試問；誰把手槍擺在桌子上談和平？誰在五大洲建立軍事基地？誰干涉他國內政，宣佈托管人家民族？誰在希臘，在印度尼西亞，在中國，在遠東進行或者暗中鼓勵戰爭？誰的大砲，誰的軍艦，誰的軍事教官和監督現在派到中國和土耳其，派到伊朗和希臘？誰不論對涅阿波爾港的美景，對馬尼刺的雪茄，對阿爾及爾的無線電台，對上海的貧民窟，對亞速爾羣島，對伊朗的石油，對尼泊爾的

寶藏都不嫌棄？（註四）誰公開地干涉他國內政，聲明『他不能容忍共產黨』？誰偽善的批評一些民主國家——如南斯拉夫或者保加利亞——的選舉，而在自己國內却褻奪了數百萬所謂『有色』公民的投票權？（註五）誰爲了拯救蔡爾達里斯（註六）而詛咒傑斐遜（註七）？引據自由大憲章是爲的幫助薩拉扎爾（註八）？贊揚塞萬提斯的天才（註九）是爲的支持佛朗哥？誰把一切絞刑手，一切亡命之徒，一切劊子手——今天他們在大砲工廠裏工作，明天就變成肉彈——收集到身邊？他們關於『流亡他鄉的人士』——這些新的十字軍——的話說得太多了。說流亡他鄉的法西斯不是更好些嗎？

他們急切於掠取某個國家時便不拘距離遠近。『門羅主義』是反對歐洲人干涉美洲事情的。但美國帝國主義者決定派遣軍事專家到韃靼尼爾海峽和到愛琴海地方去的時候，却恬然宣佈這是『門羅主義的發展』。他們想禁止歐洲人干預歐洲事情。或者他們也許這樣說，阿克羅波利位於米蘇里河岸上！如果燕那亞人在一四九二年發現了美洲，那末爲什麼芝加哥人不能在一九四七年發現阿提加？……

不久前戴高樂將軍發表反對法蘭西共和國的演說。海外大叔這回不鬧脾氣了，侄兒也不記仇了。一九四二年戴高樂將軍代表法蘭西民族的時候，美國人寧願選擇維希水中的海軍大將達爾朗來替代他。現在將軍代表法國的反動派了，布立特先生便歡迎他。

美國的惡徒們喜歡用瑰麗的語句掩飾卑劣的行爲。當在密西士比州或者在佐爾幾亞州人們用燃料澆到黑人身上燃燒的時候，一些兇手們在吶喊助威，另一些人在祈禱，又有一些人在宣讀公正審判的儀式，在這件事上不惜一加侖汽油的老資格的人種論者的女兒演唱着感傷的小調子。在比基尼島上試

驗原子彈之後，美國的偽善家募集了大把錢來給炸死的山羊立紀念碑。是的，這些先生們一個腰包裏裝的是原子彈，另一個腰包裏裝的是復舊節的紅雞蛋。關於『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民主事業』，他們倒發表了和正在發表多少動聽的演說啊！甚至對一切都習慣了的李普曼先生對於這種麵糊糊飯飯都吃膩了。他寫道：『美國的強大是在海中和空中。爲了戰勝紅軍，我們應當佔有距離蘇聯生命所繫的中心不太遠的基地；唯一的戰略孔道是從黑海到烏克蘭和高加索。地中海東部，愛琴海和韃靼海峽——這是到黑海的前進地……不需要把一些跟所採取的決定的實質毫不相干的解釋壓在自己身上。並沒有人強迫我們講『援助』。也用不着講『民主』，因爲大家都明白，現在的希臘政府是一個極其可憐的民主模型，有着完全可敬的政府的土耳其不能稱作民主。白宮和國務院認爲美國人民還不够格來理解戰略的創意，他們認爲正確的決定應當加鹽加醋，用水沖淡，添上甜頭，爲的安定民心。依我看，他們在這一點上是錯誤了。』

難道這些大人先生們都不明白，我們在希特勒的大軍面前訖然不動，那末我們在成打的雷鳴演說面前，在數百篇窳息人的文章面前就會發抖嗎？我知道中等美國人對美國以外正在發生的或者已經發生的事物是多末無知啊。讓他們溫習溫習法西斯的老前輩於一九一九年向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進軍的歷史吧。蘇聯那時弱小並且沒有武裝，醉心軍事勝利的列強向我們撞上來。讓中等美國人知道知道，這些列強們在敖德塞，在阿爾罕格利斯克，海參崴等地落得怎樣的下場。我們當時是弱小並且沒有武裝，我們把搶掠者趕了出去，但我們未能因爲他們使我們人民受苦受難而懲罰他們。營業家終於信服了，反對蘇聯人民的戰爭是一宗無利可圖的企業：他們沒有分得紅利，倒弄得焦頭爛額，四分之

一世糾纏去了，瘋狂的德國上等兵愚弄了自己的人民，重復了大規模的干涉者的幻當。讓中等美國人思量思量這是怎樣收場的：我們不僅趕走了搶劫者，而且我們懲罰了他們。幻想在我們這兒實行自己制度的法西斯們起先在頸項上得到的是『騎士十字勳章』，而後是一條普通的繩子。讓中等美國人眼申望着新出爐的『十字章』，心中想着德國墳墓上的十字架吧。斯大林格勒的人民是嚇唬不倒的。

我們在爲自由而鬪爭中流了許多血。我們用自己的血取得了勝利的代價：救了自己同時救了世界。不久前在美國出版了一本美國駐蘇軍事代表團首席代表丁尼少將的著作。這本書題名爲『奇怪的同盟』。是的，兩個民族的戰鬪同盟現在在這位奇怪的將軍看來是『奇怪的』。當我們站在窩爾加河岸上的時候，當我們把德國人從窩爾加趕到德聶波爾的時候，當美國人同英國人利用那紅軍的鬪爭給予他們的安靜的時刻，在兩年之間把最後的一顆扣子釘到嶄新的軍大衣上的時候，那時蘇聯的同盟在丁尼將軍看來是完全當然的。他覺得奇怪的不是我們拚死求生，他覺得奇怪的是我們勝利了，——這一個倒沒有算進他的計劃之中。

爲什麼他們失去了內心的平衡，邏輯，常識？有一首爲大家所熟悉的球德柴夫的詩：

『冬天並非無緣無故地猖狂，
它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了——』

春天來叩打窗戶

並且把冬天從院子趕了出去。

……惡魔瘋狂起來了，

臨逃時，
捲起狂雪，
向美麗的孩童投過去……

春天並不悲哀：

在雪中洗滌過，

迎著勁敵，

更顯得豔美好了。」

我立刻在這兒補充一句：在『紐約時報』，『每日郵電報』，或者『新紀元報』的文章裏面洗滌是不可能的。但球德柴夫把惡魔却寫得極其確切：惡魔是因爲它的好時光已經過去才瘋狂的。

我們不是孤單的，同我們一道的有歐洲所有的人民。他們知道在跟萬惡的法西斯鬪爭中俄國人倒底流了多少血。我在『到歐洲的路上』一書中會提到紅軍幫助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解放。這可惹怒了傑爾衛茲先生，他在『紐約時報』上責難我道：『我沒有看到關於數千萬美元，租借法案之運用……怎樣向這些半商人，半閣下解釋呢！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收支賬簿，一頁記載着血河，另一頁却記載着數千萬美元。在數百座歐洲的城市中現在都有着『斯大林格勒街』。我沒有看見一個地方是有『租借法案街』的……』

我們不是孤單的：跟我們一道的有全世界的人民。反對我們的是那些反對美國人民的美國人。反對我們的是那些反對英國人民的英國人。反對我們的是那些反對法國人民的法國人。所有的人民都同

我們一道，因為我們保衛和平。我們在戰爭的年份表現出我們善於打仗：這並不是說我們喜好打仗。我們堅決地相信，母親生兒子不是爲了『十字軍征討』，人民建築房屋不是爲了炸彈，人民贏得了可怕的反法西斯戰爭不是爲了使轉移陣地的法西斯在數年後從事更可怕的屠殺。

李普曼先生議論美國人民在那一方面够格，在那一方面不够格。中等美國人的政治眼光是有局限的。並且中等美國人在了解李普曼先生，以及其他的『戰略』愛好家一天三次地騙人上尚不够格。但中等美國人在常識方面是够格的。這就是爲什麼美國帝國主義者企圖在其非人性的陰謀上加顯加醋，用水沖淡和加上甜頭』的原因。這就是爲什麼李普曼先生說需要安定民心的原因。愛爾先生公然承認『現在進攻蘇聯是不可能的，因爲美國人民太天真。』是的，中等美國人還太天真，既然他們竟相信那些在客觀報導的幌子下把捏造的『紅色帝國主義』的謠言送到他們面前的報紙。是的，中等美國人還很天真，既然他們竟不把愛爾先生從國務委員會送到精神病治療所。但中等美國人究竟還沒有天真到爲瘋狂的石油工業家，武器製造家和原子彈製造家的紅利而去送死的程度。有頭腦，有善良的心，有人性的美國人還是有的。他們現在對未來，對行將到來的危機，對企業家的貪得無厭，對物價的高漲和反動派的高漲都表示焦慮不安。他們不是了不起了不起的政治家，而是中等美國人，但他們是活的人。他們願意生活，工作，娛樂。想把他們趕回軍事運輸艦上去是辦不到的。

就讓以後還有霜寒，還有憂患吧——人類的冬天是不會回來的了。倫敦人經受了一個殘酷轟炸的冬天，現在勝利後經歷了一個黑暗的寒冷的，貧困的冬天，不是爲了回到『紳士協定』，回到『干涉政策』和張伯倫朝代的可恥時日。英國人民經歷得太多了，充當一名跑龍套的去參加新的『十字軍

討伐」對他們並不感到興味。英國的礦工，冶金工人，紡織工人沒有在福爾頓發表演說。他們既不負某些獨唱演說的責，也不負合唱演說的責。

誰強迫法國人民忘記黑暗的佔領年代？反抗英雄，地下工作者，游擊隊死去難道就是爲了波利·雷諾或者其他法國挖墓人把華爾街譯成法文『追住它』嗎？南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各國人民受難和戰鬥難道就是爲了流亡的國王，將軍，憲兵再向他們國內搬回來，爲了自主的國家變爲歐洲的菲律賓，再來一個在那兒美國的軍事監督替代英國的監督的希臘嗎？

十年前我曾在西班牙過五一節。西班牙上人民堅毅地打退了法西斯的進攻。德國和義國扶持着佛子手佛朗哥。現在那兒換了班了，扶持佛朗哥倒子手的則是英國和美國了。但西班牙人民爲自由而進行的戰爭正在繼續着，並且人民在這戰爭中一定會得到勝利的。

只有大詩人才能描述希臘人民的悲劇。這個人民英勇地向法西斯搶劫者戰鬥過。但當他們戰勝時，却由他們身上奪去了自由，派一些帶有慈善機槍的慈善保姆來看管他們。就像德寇佔領時一樣，每天都有希臘的愛國者受着酷刑，走向刑場。但希臘人民爲自由而進行的戰爭正在繼續着，並且人民在這戰爭中一定會勝利的。

嚴竣的五月，但這仍然是五月。我們的人民以偉大的緊張力來治療戰爭年代的創傷。我們現在在關心未來的收穫，關心磚瓦和森林，關心我們的孤兒。當然，不久前還裝着是我們朋友的人們污辱我們是令人可憐的。但我們的敵人越是叫得厲害，我們的朋友越多。跟我們一道的有昨天的盟軍士兵——同法西斯作戰的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跟我們一道的有反抗的英雄——南斯拉夫，法國，

波蘭的游擊隊，挪威，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的愛國者。跟我們一道的有已經犧牲了的朋友——哈布雷利·彼里和伏契克。跟我們一道的有活的，不朽的人民，跟我們一道的有那些在五·一節時充滿了孔到爾德廣場，充滿了海德公園，充滿了瓦茲拉夫斯克廣場，充滿了彼爾格勒的人行道的世界青年。去年五·一節我在紐約，我曾看見沿寬闊的馬路行走着美國的勞動者。周圍都是摩天樓，但在這一天它們並不使人感覺壓得慌——帶着和善的微笑和喊着友愛的語言的人們顯得比平常的一切都高一些。是的，同我們一道的也有美國的人民。在每個國家中都有不少我們的敵人，在一個國家裏有幾百，在另一個國家裏有幾萬。但在每一個國家中我們有一個朋友——人民。當我們慶祝春天戰勝冬天，友愛戰勝自私自利和怨恨的一天，在這充滿希望的一天我們對朋友們說：鼓起勇氣吧，——現在的時光是艱難的。冬天企圖反攻。但宇宙間却有着各式各樣的超級國會所討論的法案都無能為力予以改變的自熱法則：春天已經在冬天之後來到了。五月一定勝利。——原文載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真理報——

(註一) 指希特勒。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一個上等兵。

(註二) 此詩為普式庚諷刺克里米亞總督昆朗曹夫所作。當時大詩人曾式預放逐該總督在他桌下作事。瑪氏因作此詩刺他的詩而被逐放到政詩人故鄉不哈格夫斯克。

(註三) 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曾在這兩處歇斯底里地狂吼過反共演說。

(註四) 美國紳士的指授：用威風凜凜的詞彙粉飾他們卑劣的行爲。大家總記得他們把美國軍隊以山海關設防，去「保護」，說是在此項行動「不容有所干涉」。這是所說的也正是這樣。

(註五) 美國有數百萬黑人沒有選舉權。

(註六) 現任希羅總理。

(註七) T. 傑曼遜 (一七四三—一八二六) 美國第三屆大總統，獨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曾起草著名的「獨立宣言」。

(註八) 現任葡萄牙總理。

(註九) 塞萬提斯 (一五四七—一六一六) 西班牙偉大作家，即「唐·吉珂德」的作者。

在波蘭

人們常說詩人的種族已絕，祇剩下了幾個零星的標本。J. 杜味姆名列真正的詩人之林；他是一個詩的與日常生活的詩人，一個富有創造靈感及不可避免的放浪不羈的詩人。他具有一個小鳥底側影，而從他唇間吐露出來的波蘭語言，其輕柔有若鴿鳩之喙喙，其雄健則如蒼鷹之厲鳴。我們並肩而行，在我們四周是華沙的廢墟。我們想起二十年前有一天我們會一塊走過這些同一大街，而常時向我訂梢的偵探之一會企圖參加我們對詩的討論。現在我們大聲笑着，並且又在談着詩。現在我們周圍沒有偵探了，只有廢墟和月亮。而杜味姆突然叫道：「還有比這更美麗的城市嗎？」他是對的。被破毀或甚至被斬碎的華沙，在她的悲劇中是美麗的。在世紀末期建築的普通房屋現在幾近於古羅馬的廢墟。這個城並未死亡。它是人烟很稠密的。這兒的人們在工作與建設；他們在拉磚石並購買花兒；他們在大笑與嘆息。我在戰前所認識的華沙，並不會特別美麗。華沙並不是克拉科（在波蘭南部——位於維斯杜拉河畔——譯者）。她不會有過華非爾。但華沙有一種她自己的特殊的殼籠，一種

輕盈的魅力，多少帶着點憂鬱。華沙是一位自己微笑人家亦向之微笑的女人，她平常的面貌被一種遠非平常的微笑所美化。而今天她變得真正美麗了，具有着一種偉大而悲劇性的美。

這個城是怎樣的改變了呵！全波蘭是怎樣的改變了呵！自然，人們在今天甚至還可能碰到過去。人們可以憑着一幅舊的城市圖遊於廢墟叢中。人們可以聽到熟習的聲音，或者碰到被奇妙地保留下來的老朋友。舊的波蘭仍然在這裏。那所被毀的教堂沒有屋頂，門窗洞開的立在那兒，但在聖母的祭壇旁邊有着蠟燭與鮮花，兩個女人跪在那兒祈禱。一所被毀的房子，在第一層上有一家醬菜店好夕殘存下來了，沒有受破壞。人很擁擠。貧困但却更加文雅的先們挽着華沙高傲的少婦於吃中飯一小時前來到這裏喝咖啡。這些乃是以前的全部景象中的斷片殘章。它們也進入今日華沙的偉大風景中，與戰前的城是這樣的相似——不，更確切些說，是這樣的相似，但却不同。這已不是和以前一樣的一的城市，同一的人民。我不是講華沙底犧牲者與英雄們，猶太居民區底受難者與暴動者，也不是華沙以前的居民大部分毀滅了的事實。在我心目中的乃是那劫後餘生者。他們並不和以前一樣。他們保持了他們底輕快的嫺雅與生氣；但他們却變得更強壯與更嚴肅了。在街道上的入羣底外觀已經改變了。耶路撒冷林蔭大馬路已不再似上面有着令人目眩的穿華服的軍人的小歌劇舞台。今天的軍人是更加嚴肅，更少華麗；因為他們打過仗。其次，秘密偵探已不見了，這裏比從前更少舊式現留着鬍子的紳士，也更有討飯的。

我們一向知道波蘭人是懂得怎樣打仗的。在前世紀，全歐洲都聽傳着他們底勇敢的故事。我們一向知道波蘭人是天賦很高的人民。他們把像米基維茲，斯洛瓦基，蕭邦這樣的人物給予了世界。今天

我們看到波蘭人在一種新的景象中：在工作。嚴肅堅決的勞動改變了被毀的華沙底面貌，對轟轟隆隆與輾轉聲，給磚堆水泥堆與石灰堆加上了一種新的意義。祇有那些到過波蘭的人才解得波蘭人是怎樣愛他們底首都及其戲劇性的歷史。希特勒匪徒們把華沙判了死刑，並執行了死刑。還輯宣稱華沙已經死亡。但華沙是活着的，被波蘭的愛與華沙人民底勞作所復活了。每天都有些新的建築物誕生，清除新的街道上的瓦礫，劃出新的廣場。橫越維斯杜拉河的新大橋似乎是跨過由死至生的深淵，由過去的火災跨到未來的波蘭之歡樂的燈火。

工作並不限於建築者。人人都在工作。而勞動底韻律與速度對波蘭是一個完全新的東西。這不是過去底緩慢的速度，也不是運送器底機械的速度。這是羅曼斯，喜躍，一種復活的熱情。對於德國法西斯，波爾乃是可憐的奴隸與毀滅營的國度。祇有我們，蘇維埃國家底人民能够理解法西斯們對波爾幹了些什麼。這兒引人注目的並不是廢墟，而是那些由於某種奇蹟未被破壞的少數建築物。然而這半被毀滅的波爾要比受破壞較輕的法蘭西更快的在恢復着。要責備法國人懶惰那是可笑的。但法國人民缺少波爾今天的團結，缺乏使波爾人在其毀滅中不屈服的那種對未來的深沉的信念。就拿這個女人來說罷，她和她的孩子們住在沒有一所完整建築物的舊城某處。她們由於清除了一個小地下室裏的碎石而得到了安身所，並在門邊栽上了花。在一條荒涼的街道上的黑夜。一堆一堆的亂石頭，一個小孩子低着頭在看着一本教科書。這個女人在想什麼呢？第三次大戰嗎？或者是原子炸彈？都不是。在她的荒涼的地下室裏，她比那些住在芝加哥或華盛頓的人們有着更多的心靈上的平靜。她在想着她底兒子長大了幹什麼——做一個醫生，或是做一個工程師。我記得二十年前華沙的無數狂熱的夜當時每晚報上天

天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來嚇唬讀者。今天華沙——全波蘭——底未來是和平的。而這就是爲什麼羅茲城（在華沙西南——譯者）比亞里斯多克城（在卡遜綫東——譯者）波斯南城（在華沙正西——譯者）各工廠以全力在工作着。這就是爲什麼在成千上萬的商店底貨架上堆滿着貨物。這就是爲什麼青年男女擁進了大學。自古以來，不是以劍就是以豎琴來象徵波蘭。以新時代的鐵錘來象徵她會更適合些。

烏洛克勞（德文是布累斯勞）（波蘭西部大城——根據波茨坦會議決定歸還波蘭之領土內——譯者）是地球上這樣的地方之一，在這個地方人們必定特別有力地感到他對人類的信念之正義性。差不多三個月的事使這個城市被毀，並顯然是荒涼了。今天它活了。它不止是活着，它在吐露着波蘭底意志之精英。烏洛克勞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僥倖地，若千古老建築物——市政廳，大禮拜堂和某些教堂——並未完全被毀。保留下很多東西：佈着羅馬式彫刻的美麗圓柱，和文藝復興的天使。一位我認識的在巴黎住過許多年的畫家有一次對我說：烏洛克勞底天空與色調使他想起塞納河畔（巴黎城北的大河——譯者）。我講着繪畫，不僅由於我想到舊烏洛克勞與藝術有不可分的聯繫，也由於鼓舞此城一切新居民——學生，磚瓦匠或技師們底真正的創造精神。舊布累斯勞底廢墟產生了一個新的烏洛克勞——一個奇蹟，一個定會被未來的詩人與編年史家不時歌頌的奇蹟。

我說：『舊布累斯勞』，這當然不完全正確；因爲此城底最偉大的建築美創始於布累斯勞還是烏洛克勞的時期。但我並無意在這裏探討政治考古學或考古政治學。當我想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正在進行着的反英艱苦鬥爭時，我並未想及大衛王或馬克伯。我只關懷當代男女們底勞動與血汗，這些人已

在沙漠中間創造了繁盛的村莊。對於我，烏洛克勞是一個波蘭的城市不祇是由於它擁有勇敢的波列斯拉夫或波列斯拉夫·克爾基烏斯蒂時代的石碑。它是一個波蘭的城市，由於二十五萬波蘭拓荒者已給這些被火燒焦與破碎的石頭賦了新的生命。

『華盛頓郵報』最近告訴它的讀者說烏洛克勞已歷在波蘭人的身上，波蘭人因其任務而勞果不堪。這顯示，好心腸的美國人急切要解除波蘭人底烏洛克勞負擔！這一聲明並非出之於一條帶褶新聞，而是出之於社論。在倫敦會議時馬歇爾與貝文也曾表示他們將不反對救濟西部地區（波茨坦會議劃歸波蘭之前德國佔地地區——譯者）的可憐波蘭人。美英報紙轉載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慨嘆德國『人口過多』、『從前有文化的德國領土已退化成了荒野』，有『修改邊界』的必要等類文章。傑倖的是，華盛頓郵報底慈悲的計劃或馬歇爾底憤怒都不能影響烏洛克勞底命運。無論如何，波蘭人現在知道誰是他們的朋友。

德國法西斯們底殘暴給波蘭以浩大的破壞與損失。我祇舉一個例子。當德國法西斯們佔領了華沙博物館的時候，他們把所有非波蘭藝術家底繪畫運到德國去；但他們把古波蘭巨匠們底繪畫則悉數擄毀。我想，有良心的德國人在與新波蘭爭吵之前應該好好想一想。在英佔區出版的一家德國報紙最近宣稱失去布累斯勞與斯德丁（均在波蘭收回之西部領土上——譯者）意味着喪失了德國的獨立。很難說這一聲明是包含無知多些還是偽善多些。舒瑪赫（德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底領袖，工人階級和德國人底死敵——譯者）分子們不甘心烏洛克勞（即布累斯勞）的喪失。但他們却十分甘心情願把西，南，中部德國變成叫做『兩區』的東西，這種『兩區』頂多能期望獲得一種夏威夷或危地馬拉式的『

獨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及其英美保護者們沒有理由爭辯：沒有西里西亞德國就不能生存。所有戰前時期研究德國東部領土問題的作者們，都以吃驚的口吻講到所謂「*Ostfeldern*」或「*山東方逃難*」——換句話說就是大批德國人由西里西亞遷到西部。對於德國，東部領土只不過是一種附屬品，與其說是爲了經濟上的需要，無寧說是爲了傳統的驕傲。對於波蘭，新獲得的西部領土乃是麵包、煤炭、海港——生命。

烏洛克勞底以前居民除了德寇來不及殺死的幾千波蘭人外，什麼人都不剩了。現在人口底大多數是新來戶，是由烏克蘭西部，被德寇毀滅的中波蘭各城鎮或者法國來的波蘭人。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兩百人的一羣來到一座有很多人居住的城鎮，或許會覺得他們是可憐的難民。但是二十五萬拓荒者到達一座被夷爲平地的城裏，他們却視自己爲建設者。過去都說波蘭人缺乏謹慎與紀律。但波蘭人有一樣東西甚至他們的敵人從來都不能否認：那就是他們的愛國主義。就是這一被壓迫與被蹂躪的國家底歷史在每個波蘭人底心裏喚起這種情感。我在法國北部遇到波蘭的礦工。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曾經不能獲得食住。他們雖然住在法國，但他們依然是波蘭人，而今天我在新的西波蘭遇到他們，我毫不驚異。他們在這兒接續其民族底古老歷史並開闢西里西亞底新歷史。烏洛克勞底拓荒者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驚人的速度重建這個城底巨大火車皮製造廠。在這個工廠裏，我看到了山布格河（在波蘭稍北部——譯者）北面，立陶宛，法國來的波蘭人。對他們來說，這個工廠不僅是一個工廠，也不祇是一種職業，一種用它工作並得到工資的機器。它是一種很重大的與他們在生活中所選擇的道路血肉相聯的東西。這是對波蘭民族古老的夢想之回答，這也是對陷於歷史底巨大風暴中的個

人命運之回答。

我同烏洛克勞附近許多柯莊裏的農民談過話。他們帶着牲畜和傢傢常常由羅夫和沃爾辛尼亞來到這兒。起初他們住在德國人底房子裏很不舒服，這房子在外觀上是這樣不堅固而且全然不習慣。但土地是好的。移民們分得了大塊土地。有農業機器來幫助他們。而不久他們就很習慣了。在這些村莊裏，人們業已感到在城市裏如此難得的舒適感，但農民們帶着這種舒適感就像他們帶着泥土與汗底氣味一樣。看起來他們已不再像新來的移民了。生活已安頓下來，好像是已經這樣子好幾代了。無論是在『華盛頓郵報』上寫文章的記者或是殘忍的馬歇爾先生都不能把這些農民趕走。一位老人講到倫敦會議時對我說：『他們在喋喋不休地幹什麼呢？我們已在這兒種了兩樣地了。像我這樣的老年人習慣於這兒的事物或許不是怎樣容易的。但我不是游牧民族。我是一個農民，誰都不能把我從這兒趕走。』

英美人唱和着舒瑪赫底怨言。布累斯勞已退化到什麼樣子了！——這就是他們的叫聲。實際上烏洛克勞已成了一處大的文化中心，有一所大學，一所工藝學院，一個建築學校，一個美術學校，一處堂堂的戲院，一家印刷所，一座音樂廳，若干展覽會。我不知道那一個是更可怕些：是因德國工兵在具有系統地對街道逐條破壞中所造成的破房子；還是由戈培爾、羅森堡、斯特雷赫所造成的沒有學校沒有書籍的五年法西斯佔領。五年的時光在一代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缺口。敵人的佔領在青年人底心靈中留下了一種廣闊的真空。而這一真空業已被填上——一種比這座城市山廢墟中復生還偉大的奇蹟。烏洛克勞大學底建築物所受的破壞尙未完全恢復；但大學已開學，而看到那些在周圍有着建築架

的大廳中聽課的青年人底那種專心注意時是令人驚異的。主要包括來自羅夫的波蘭大學的教授們之教授團現在覺得他們底生命並非白費，他們有他們的後繼者接受他們的知識，他們探討中的問題和信仰。這能叫做『退化』嗎？從前只限於上演巴爾杜·馮·施拉契底門徒們底說教性的傳奇劇的劇院，現在上演莎士比亞的悲劇，果戈里的『欽差大臣』，與普列斯特雷（英國劇作家——譯者）底喜劇。也許這是『退化』吧？在這同一個劇院裏，有一個畫室住着兩個青年畫家。他們不以假古典派風格畫着特勒底肖像。他們畫優美的風景畫和靜物畫。不錯，這又是悲慘的『退化』！而在從前德國廣播電台使用過的——由其中放送過希特勒咆哮的大廳中由布拉格樂餘樂隊演出的音樂會，那自然是『退化』底另一種標誌了。我想起羅亞爾河（流經法國中部的的大河——譯者）上的鄉鎮。那兒的法國人任在其父親和祖父住過的房子裏。在倫敦或華盛頓沒有人辯論是否把他們趕出去或允許他們仍留在那裏。但是他們並不恢復被毀的建築物。他們不修築新的橋樑。他們因對明天缺乏信心而受阻了。人們會以為他們是坐在戰爭底兩個旋渦中間的凳子邊上。但在烏洛克勞的波蘭人知道他們是要在那兒住下去的。

在戰前我屢次遊歷波蘭時，我常常感到一種恐慌和真正的恐怖氣氛。暴風雨的雲正在西方匯集，但彼當時報紙與幾世紀來的傳統所欺騙的人們却恐懼地凝視着東方。波蘭當局在波蘭與蘇聯之間豎起了一堵不透光的高牆。波蘭當局稱自己為西方文化底哨兵。實際上它不過是資產階級野蠻主義底工資微薄的看門人，一會兒由凡爾賽（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和約——譯者）的調停人那裏，一會兒

由元首（指希特勒——譯者）那裏得到幾個小錢。波蘭的統治者們力圖嚇唬其人民，拿布爾塞維主義嚇唬這些人，拿古老的莫斯科人嚇唬另外一些人。

重提過去的爭吵是不必要的。俄波關係底歷史有許多悲慘的史頁。二十年前一位波蘭作家曾對我說：『我們永遠不會成爲朋友。請看看過去吧。每當幸福之神寵愛波蘭人時，她就拋棄了俄羅斯人，寵愛俄羅斯人時便拋棄了波蘭人。』

這一預言在過去幾年中被推翻了。我們成了朋友。這產生於這樣的時期，當時德寇佔領了全波蘭並深入俄羅斯。那時幸福之神對我們誰也不寵愛。而我們拉起手來並宣誓說我們要征服幸福之神，爲我們兩大民族而征服她。我們的友誼不是建立於外交底圓桌上。它誕生於戰場裏。

我用不着在這兒申說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這是人所共知的。如果在西里西亞和波美蘭尼亞（波蘭新收回的西部地區內的兩個省——譯者）底男女們能够毫無恐懼地播種、建築與學習，那是由於除了舒瑪赫的可憐的願望與馬歇爾先生的如簧之舌以外，還有蘇聯軍隊。然而確定波蘭對蘇聯的新態度的並不祇是利益上的考慮。這個變化是一個影響根本感情的深刻的變化。在追悼死者的日子，波蘭的婦女們在成千的蘇聯戰士的墳頭上點起了紀念燈。而這些在十一月的黑夜中閃耀着的小小燈光，乃是一種極端衷心之愛與感激底表示。

在過去，波蘭人與俄羅斯人在精神上都趨於一種互相排斥，誇大各種分歧與爭論。波蘭知識分子喜歡強調他們與西方尤其是與法國在精神上的交誼。所有法國與波蘭的知識分子都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雨果和法萊不見了，P·莫蘭與彭加利代替了他們。但公式依然如故。我記得一位波蘭作家底辛

辣評論：『一整套的幻想體系把波蘭的知識分子和現實生活隔離開來。』謂波蘭文化具有法國性質，這種錯誤觀念無疑的是那種『幻想體系』中的要素之一。我並無意否認波蘭與西方各民族文化的聯繫。人們只要看一看克拉科就會了解這些聯繫底力量及其最初來源；因為信天主教的波蘭從前是以拉丁文與意大利和法國交談的。但這些與意大利建築或法國繪畫的聯繫，並不會把波蘭變為僅僅是西方底一種副本。在修飾華非爾時，意人，法人與德人都參加了這個工作。俄羅斯人也在那兒。但華非爾不是佛羅倫薩（意中部大城市），不是紐倫堡（德巴伐利亞中部大城市），也不是諾沃哥洛德（蘇聯西部城市）。華非爾是波蘭的。

人們可以深刻了解波蘭人對蘇維埃文化所表示的興趣。二十五年來，波蘭被一堵疏遠的高牆與我國隔開了。但就在這些暗淡的年份中，許多波蘭人都對俄國文學與蘇維埃思想感到熱烈的興趣。今天，波蘭已達到這樣的幸福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家底利益與文化底利益是吻合的。對西方的大門並沒有關閉。波蘭人可以像以前一樣，追隨美國的文學及法國的繪畫。但對東方的大門也已打開，而新鮮的蘇維埃氣流將會幫助波蘭人更好地了解西方及其本國文化底賜與。

一種包括兩世紀的俄羅斯詩選剛剛在波蘭出版。翻譯是由波蘭一些最優秀的詩人担任的，其中許多譯詩如J·杜味姆譯的普式庚是非常有力的。這個選集是精心編選與出版的。在我們國外，我還沒有看見在任何其他國家內有這種對該國詩的紀念碑。我不想講這個或那個俄國詩人對這個或那個波蘭詩人的影響。我並不對這種關於影響的談論抱多大信心，因為一個作家底發展是一種極複雜的過程，而且是一種極為多樣的過程。我在這裏想要指出的是由波蘭與蘇聯作家間的友誼中所產生的巨大好

處，而這種友誼底基礎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中由波蘭文學底這樣的卓越代表如J·杜味姆與Z·納爾科夫斯卡等所奠定的。

波蘭今天生活在創造底狂熱裏，許多新書出版了；雜誌上登載着有趣的辯論與討論；波蘭畫家們正製作許多新的優秀的作品，新劇院正在開幕。稱此為全盛時期，或許尚嫌過早。我們寧可稱其為黎明而不稱其為燦爛的中午。但波蘭已顯然在文化方面找到了她的道路，回顧過去，波蘭人現在了解到他們舊的木刻，早期的繪畫與民間藝術底趣味和純粹的民族性。我不提他們已被普遍承認的詩與音樂。波蘭的浪漫主義並不意味祇是一個久成過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藝術底興起是與民族歷史中慘重的打擊同時發生的。浪漫主義在許多方面乃是波蘭靈魂底一個要素。而今天，由硬化了的和囚襲的表現形式中解放出來並與人民生活底現實，人民底歷史及勞動相結合的這一浪漫主義，似乎是波蘭的天才中一個不可分的要素。

在我訪問波蘭的時候，所有國外的報紙都因米柯拉茲科的逃亡而對該國喋喋不休。必須承認：這一事件在哈得遜及太晤士河畔（美英首都所在地——譯者）所引起的轟動要比在維斯杜拉河畔（華沙所在地——譯者）大得多。赫爾琴從前會責備地寫過他的波蘭朋友們：『他們在期待着他們的死者復活，而我們却渴望儘快地把我們的死者埋葬。』舊的波蘭是死了，而波蘭人已經懂得去埋葬他們的死者。把以米柯拉茲科為名的活屍由波蘭運到美國，對於華沙的建設工作或西里西亞新移民的耕作並沒有任何影響。波蘭人說，讓馬歇爾先生寵愛他吧，如果這可以使這位國務卿快樂的話。而當馬歇爾先

生與貝文先生寵愛了米柯拉茲科之後並妄談波蘭西部邊界的時候，波蘭人祇付之以冷笑。烏洛克勞不是米柯拉茲科。烏洛克勞不能裝在一架飛機上運走。

（紀堅博譯自『新時代』第一期——一九四八·一·一）

和平之星

——為紅軍三十週年而作

美國國務院所公佈的納粹秘密文件，在報紙的廣告上大大渲染了一番。如果李賓特洛甫（前納粹外長——譯者）不是被絞死的話，他會從稿費中發一筆財——他的備忘錄是一九三八年暢銷書。我不想在這裏討論對被絞死或尚未絞死的罪犯們的故事應否置信——我也許有偏狹之嫌，因為我從未掩藏我對希特勒匪徒的感情。我現在正浮起另一個思想：倘若國務院有意發表有關那些鋪平了二·二·世界大戰道路的紳士們的文件，那將會怎麼樣呢？在美國能找出足夠的紙來印刷這些東西嗎？

我能得到這些千百卷的材料：美國牒報局與國務院的檔案，邱吉爾的祕密日記，艾登與首相（指莫索里尼——譯者）在歐洲兩端的通信，美孚油、通用電氣及其他尊貴的托拉斯的每年報告書，奧斯汀·張伯倫的箴言和尼維爾·張伯倫的旅行記（二人都曾在英國首相，均為著名的反動派——譯者），華爾街內室的祕密，從勞倫斯上校（英國著名的間諜——譯者）到布立特（現正在蔣管區積極活動的美國間諜——譯者）各式各樣的遊俠騎士的英勇冒險，胡佛、杜勒斯、福萊斯特爾（美國防部長

——譯者）的堅實著作凱道錫（巴黎塞納河岸一埠頭，法國外交部在此——譯者）英雄們輕浮的做作，從高爾查克（勾結帝國主義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白俄將軍——譯者），畢爾蘇斯基（前波蘭獨裁者——譯者）到佛朗哥和陶爾弗斯（德奧合併前之奧國獨裁者——譯者）這些久經考驗而值得信賴的『民主保衛者』的報告，德特汀（荷蘭大資本家——譯者）的支票簿，兇猛的英國警察襲擊蘇聯大使館，和魏剛師團攫取巴庫的計劃，教皇的特別赦罪，芝加哥土匪和德國強盜間的議定書，以及許多其他等等。研究這些汗牛充棟的紙張，也許畢生都搞不完。但是歷史家們用不着驚慌：國務院知道如何發表——它寧取聳人聽聞的故事而不要真實的歷史。

當然，歷史不是算學，但是任何解釋都不能改變它所解釋的事物。

蘇聯軍隊即將慶祝其三十年誕辰，因此這是回顧過去，看看那些一直以和平締造者自命的紳士們種種活動的最好時機。他們有些人已經終其天年，留下了後代和繼承者。但是這些莫海干（北美土人中一種好戰的種族——譯者）們有些仍然活着，當我仔細地看一看時，我必須承認他們是依然如舊。邱吉爾是巴爾扎克派小說家適宜的題材：他是一個完整的人物；雖然他被迫走了許多路，但他從未改變他的方向，他頑固地堅持從血洗走向血洗。現在一如三十年前，他腦子裏仍在盤算一件事：衰老的英國獅將得到一份什麼，與摧毀社會主義。

讓我們回憶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以和平而結束，而是造成了反對蘇俄的運動。幾乎彼卡的（法國北部的一省——譯者）和馬其頓的槍聲還未息，英國人已經把他們的大砲拉上了亞爾幹日爾（蘇聯北部要港——譯者），法國人趕到了敖德薩。受了騙的『白黨』，塞內加爾（在西部非洲，為法

國殖民地——譯者）人和波羅的海諸國的人是砲灰。法國將軍們是軍事顧問。倫敦則負責破壞工作與間諜工作。至於美國人呢，他們捲起袖子忙於簽支票。

洋克們（即美國人——譯者）也是依然如故：今天一如三十年前，他們有一個神聖的信念，即結合起他們的金元與旁人的鮮血就能造成奇蹟。

那曾經是一個光榮的業蹟：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日為戰爭所蹂躪，大革命動搖了它的基礎，交通破壞了，沒有燃料，武器和麵包，並且還是一個不屈不撓地呼籲全世界和平的國家——在外國強盜看來，這是一個多麼容易攫取的獵物呀！『唯心主義者』們在做夢：他們將佔領俄國，並繼之消滅西歐的共產主義。而『唯物主義者』們已經在瓜分我們的錢、煤和石油。

他們對於作戰的成功深信不疑，但是他們忽視了時代的最大事件：蘇維埃軍隊的誕生。這是外交家斯凱文紐斯向十人委員會所做的報告：『紅軍的核心是由外國人——拉脫維亞人，匈牙利人，德國人和中國人——組成的。』美英報紙曾經蔑地報導『以無可命名的式樣的步槍武裝着的艦隊之徒』。紅軍雖然年輕而無經驗，服裝奇缺武器廢劣，但是會幾何時把那散想做綏靖者，守衛者和竊盜的傢伙們悉數逐出蘇俄。

遠古的人會經常說，神想要毀滅某人先使他發瘋。儘管有梵蒂岡在，神顯然堅決要消滅好戰的紳士們。帝國主義者不能懂得他們爲什麼吃了頭一次的敗仗，並開始準備新的反蘇運動。在走獸中是羊咩咩而獅怒吼。這些紳士們相信人類中亦復如是：他們錯把蘇聯的和平渴望當做軟弱無能。他們會創造了關於『泥足的巨人』這類神話，如撒謊者所常常發生的，他們竟相信了自己愚蠢的發

明。

在科學、藝術和生活中，那些守舊的人是難以察察新的事物。蘇維埃軍隊對好戰的紳士們說來，曾經是而且仍然是一個神祕，正因為它是一種新型的軍隊。

瓦爾米（註）是歐洲歷史上一個簡短的插曲，但是拿破崙戰爭的熱心研究家傾向於忘記革命軍對君主派聯盟的勝利。法國士兵常常是以勇敢而聞名；但是一九四〇年的悲劇則說明了：一個軍隊是如何的能被背叛，因循，和愚鈍——這都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衰老病——所腐蝕。

希特勒曾經創造了世界上前所未見的最強大的匪盜軍隊；德國的軍國主義傳統，兵營紀律的教育，狂妄的民族感情，強大的重工業，高度發展的技術，和堪稱模範的命令都幫助了它。然而這個軍隊的不可戰勝性曾經是一個神話；在它勝利的日子裏我們就預見了它不可避免的失敗。它的弱點是衆所週知的：它軍官的階級精神，它硬化了的理論和規章，缺乏個人的主動，敗壞風紀的殘暴，以個人利益的允諾代替崇高的理想。納粹的辯護者聲稱，德國軍隊是一個人民的軍隊；但是沒有比這再不合乎事實的了，它是世界上最不孚人望的軍隊。

至於英、美軍隊，他們是建立來攫取殖民地和鎮壓不服從的主人的。這些軍隊，在戰時結合着國內千百萬的羣衆會過度地擴張了，但是它們從未變成真正的人民軍隊。一條鴻溝分開了正規軍與動員而來的人民，並且沒有共同的維繫思想。美國軍隊尤其是如此。任何在歐洲遇到美國兵的人都能看出：這些俄克拉何馬或得克薩斯的愉快的孩子們，不懂得他們為何被徵來解放比利時人或制服巴伐利亞人。當德國空軍襲擊時，我確曾讚佩過倫敦人的剛毅堅忍。但是此事過後，同樣的倫敦人被召入伍

並變成老兵混子之後，他們依照英國統治者的意志，就酷似滑稽歌舞劇「瓦姆普卡」中的角色，口裏唱着「我們就來，我們就來」，可是一寸也不動。

紅軍對我們的敵人和盟國都是一個難解之謎，是不足為奇的。無論是美國商人、英國的殖民領主、法國投降者、或德國屠夫都不能了解一個真正的人民軍隊之力量源泉。

在戰爭爆發不久以前，一位法國將軍聽到紅軍戰士研究文學名著時喊叫道：「那樣的士兵也許開會時不錯，但是我可不願意在戰場上指揮他們。」

德國人輕易地，幾乎毫不在意地開入巴黎，但是他們從未能開入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研究文學的紅軍戰士比起甘末林和魏剛（二人是法國投降時的最高指揮官——譯者）來是更好的士兵。

自從這次戰爭以後，好戰的紳士們分成兩派。

一派繼續相信蘇聯軍隊是泥足的巨人，僅僅因為偶然的原因在一九四一年沒有崩潰，並且又同樣無然的坐着美國車子開入柏林。這派紳士們喜歡宣稱我們的國家嚴重地為戰爭所蹂躪，並且很容易擊敗，特別是容易為那些廣島和比基尼（兩地均為投原子彈之處——譯者）的英雄們所擊敗。

另一派正相反，他們斷言蘇聯軍隊是極端強大，它是一支征服者的隊伍，而一年年地變得更加可怕，所以要對蘇聯進行一個預防戰爭。

我們看到雖然他們的論點有所不同，可是兩派的結論却只有一個，那就是蘇聯是野蠻而危險的，並且必須用戰爭加以鎮壓。神沒有恢復這些先生們神志的清醒。詛咒我們的人很少瞭解蘇聯軍隊力量的源泉，仍如三十年前一樣。他們不看他們所不願意看的事物——我們勇敢但是酷愛和平的人民和紅

軍是有機的整體。

決定美國政策的紳士們在盡全力煽起世界戰爭的餘燼。

在中國他們在國民黨幫助下企圖鎮壓人民，那兒千百萬的人在戰場上，僅僅去年一年至少有二十萬人毀於戰爭。戰火在希臘是愈燃愈烈，那裏美英的飛機和砲隊在對民主軍作戰。英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在煽動民族和宗教衝突。旁遮普十五萬人的死亡，如同濺滿吉地巴勒斯坦的鮮血一樣，同是工黨政府的政策結果。無怪邱吉爾不時地肯降低身份來拍一拍貝文的脊背。

由於教會——社會黨的聯盟現在統治着法國，越南和馬達加斯加的人民成千成萬的在毀滅。在德國坦克而前逃跑的可恥的將軍們，決定從越南人身上報仇雪恨（順便說一下，還是藉着編入外國軍團的納粹們的幫助）。據『解放報』所載，僅在一九四七年一年中，由於戰爭行動而死亡的人就有四十萬，這比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四年的傷亡還要多些。

法國的智者稱一九三九年的戰爭為『假的戰爭』（因雙方尚沒有大規模的作戰——譯者）。由美國主義者舉行揭幕式的和平可稱之為『假的和平』。對於好戰的紳士們來說，希臘與中國不過是一段插曲；他們所夢想的是另一次世界戰爭。

人民知道，如果在一九四八這一年沒有和平的話，那是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它的外交家、空軍、海軍和軍需工業。人民也知道，如果在一九四八年沒有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那是因為蘇聯軍隊，它能以冷卻杜勒斯、福萊斯特爾、和哈里曼之流的軍事狂熱。

美國人在十多個國家內作威作福；他們的基地遍佈全世界；他們在東地中海還有一支艦隊。可是

他們却反覆申述他們害怕。他們發明了『蘇維埃帝國主義』的神話，從而又相信了他們自己的謊言。每天每日美國人都讀到『赤禍』，並且驚恐得莫可名狀。他讀到『二十個蘇聯師正在巴庫集中』（評論家皮爾森這樣斷言），『二十萬蘇聯陸軍開入羅馬尼亞』（記者馮魏剛發誓說這是真的），以及蘇聯『在二天內能佔整個西歐』（編輯司徒渥爾特這樣宣稱）。

爲什麼美國主義者繼續在彈『蘇聯威脅』的調子呢？因爲他們在切望一次新的戰爭。當着公衆，他們譁民主和這一類高貴的事物。在他們自己中間他們就率直的多了。紐約時報領頭的作家是一個職業的僞善者，但是他的同僚，經濟版的編輯（他是敢於坦白的）則說：我們有興趣的是拉布刺達（在加拿大東部——譯者）的礦苗，委內瑞拉（南美小國——譯者）的石油，新喀里多尼亞（南太平洋的法屬島嶼——譯者）的鉛與鋁，摩洛哥的鉛和馬達加斯加的雲母。此外，我們發生重大興趣的有羅得島（在地中海屬土耳其——譯者）的銅，加拿大的鋁，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

這些紳士們在大力準備新的戰爭。杜勒斯會與戴高樂會談締結軍事同盟。『世界報』和『國際新聞社』已提供了一些詳情：該同盟既是防禦的又是進攻的，而美國將要供給五十個法國師的武裝。

這些紳士們竟這樣的一成不變，的確是可悲的：他們已經在尋找砲灰，信守着他們傳統的原則——我們的金元、旁人的鮮血。

於是這些紳士們開始嚇唬全世界。美聯社報導了細菌戰、毒物戰的準備，其中包括了能用飛機或定向飛彈散佈的病菌：如脾熱、鸚鵡熱、黃熱病和鼠疫。陸軍發言人在談論致命的超聲波。信不着原子彈，紳士們寄熱望於法國陸軍，信不着法國陸軍，他們又將希望寄託於鼠疫。但是在他們蓄意恫

嚇世界當中，他們却把驚恐的細菌傳染了他們自己的同胞。

這種誇張與懦弱，殘暴與愚蠢的混合物，對我們說來既不新鮮也不聾聽。希特勒也曾經有過豐富的多種民族的砲灰，他的科學家也曾經試驗過散佈病菌。他也曾經要征服世界，並且曾經到達過埃及。他同樣也曾經叫喊過『西方文明受到布爾塞維克的威脅』。

蘇聯軍隊已經證明了沒有任何武器，也沒有任何大幫的匪軍能以粉碎它。對那些知道蘇聯人民及其力量與英雄主義源泉的人們，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已經清楚地看出：早晚我們的軍隊要佔領柏林。難道這些哈佛或其他美國大學的畢業生，竟低能到連二次世界大戰中這點簡單的教訓都不懂嗎？

弱小者沒有什麼害怕蘇軍的地方；相反地，它却是他們的盾牌與希望。轟炸希臘鄉村的不是我們。扶持佛朗哥的不是我們。煽動阿拉伯人反對猶太人，煽動印度教徒反對回教徒的不是我們。在巴拉圭發動法西斯政變的不是我們。要求法國人爲了一片粗麵包而出賣他們生存權的不是我們。巴黎的工人，西西里的農民，挪威的漁夫，以及印度、伊拉克、或無論遠近的其他國家的居民，沒有害怕蘇聯軍隊的。只有好戰的紳士們害怕它；因爲如果是美國的獄卒在看守着努倫堡（國際戰犯法庭所在地——譯者）的納粹惡棍的話，那是蘇聯士兵把他們帶到被告席上去的。在審判時說話是容易的，但是在這之前却必須進行並贏得斯大林格勒之戰。

不久以前，這些好戰的紳士中的一位在英國下議院宣稱：『因爲亞細亞伸展到了易北河（在德國中部——譯者）』，地球上就不會有和平。我不屑於指出這位不知道撤開俄國就很難想像歐洲文化的

紳士的無知，因為撒開托爾斯泰，杜思托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可夫就很難想像歐洲文學。但是也許這位紳士所指的『亞細亞』的含義是共產主義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亞細亞』已經遠遠地深入到易北河以外了——舉例來說，它已到了塞納河（在法國北部——譯者）、羅尼河（在法國南部——譯者）、波河（在意大利北部——譯者）和台伯河（在意大利中部——譯者），在這些地方美國製造商的催淚瓦斯已不能壓制宏偉的人民的高潮了。恐怕我不得不做一個很不愉快的預測，來使我們尊貴的紳士痛心：如果他的『亞細亞』指的真正是共產主義觀念的話，那末，這些觀念同樣在泰晤士河畔勝利的日子也將要過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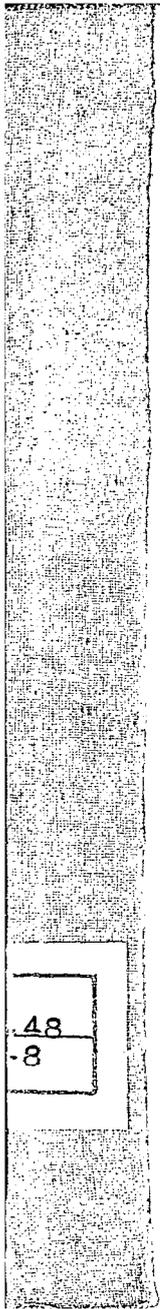
並且這不是因為所謂的蘇聯軍隊的侵略性，而是因為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前進：不可能相信，像英國這樣一個有天資的民族，早晚不會擁護人類新世紀的這些觀念。尤有進者，好戰紳士們的狂怒毫無節制，則共產主義觀念不僅到達泰晤士，而且到達哈得孫（美國的大河——譯者）的日子將來得更快，反動再不能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展；由於它的盲目、貪婪、和殘暴，它只能加速共產主義的擴展。蘇聯紅軍不準備以刺刀給任何人帶來自由，它將如以前一樣，僅僅繼續保護我們人民的自由。如果共產主義在世界各處正在得勢的話，那是因為在南斯拉夫的示威者不像在意大利那樣的被槍擊；因為阿爾巴尼亞人不像希臘人那樣被迫躲到山裏去，因為在新波蘭沒有波蘭雷諾（法國反動頭子——譯者）的位置；因為我們在建設，而共產主義的敵人在破壞；因為我們的生活是基於團結的思想，而不是基於資本主義的豺狼法律或種族仇恨；因為我們的人民將他們的命運寄於田裏的小麥和園中的水果之生長，而不寄於交易所中的股票之漲落；因為在我們國內沒有杜勒斯，沒有華爾街，沒有奴隸主。

蘇聯紅軍正在慶祝其三十週年的誕辰。對一個人來說，這個年齡標誌着成熟；對歷史來說，這只是一瞬間；對一個新制度來說，這是它永続的保證。我們的軍隊之星閃爍給世界的人民去瞻望。它不是古人的戰神（俄文，英文戰神與火星是同一個字——譯者），它不威脅任何人。並且，如三十年前一樣，它光耀的使命是：和平，遍及世界的和平。那末，各國人民選擇了它做爲自己的指路星，誰又能奇怪呢？

（程之平譯自新時代第八期——一九四八，二，十二。）

（註）法國革命推翻帝制後，原攝政王路易十六出而干涉，一七九二年曾與蘭軍侵入法境，但年青的革命軍終於在瓦爾米大敗蘭軍，將敵人逐出法境。——《馬克思傳》的革命——譯者





48

8